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遇合・對話・貶謫——張九齡文、賦的仕宦書寫



指導教授：許東海 教授

研究生：曾詩蘋 撰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摘要

歷來關注張九齡的學人與研究者，多從其政治經歷或詩歌擅場劃界析論。前者以歷史、文獻學的考證對於張九齡的生平、家世及詩文作品，進行繫年與評述，而後者則從文學藝術聚焦於研析張九齡的詩歌表現所形塑之審美觀照，以印證其經世治國的儒雅襟懷。本文在立足於前人的學術研究成果之上，聚焦於張九齡仕於玄宗朝期間的散文及賦作書寫展開論題。論題亟欲探究，在張九齡仕宦生涯的文、賦書寫裡，如何在潛藏著士遇的焦慮下應對、居處世變的困境，並且此焦慮與困境，在張九齡遇合唐玄宗的仕宦書寫裡，其諫諍意識又經由君臣如何對話的表述裡地遽而開。

本文之研究範圍，以張九齡於唐玄宗先天元年對策高第，以文學晉左拾遺起，迄於開元 28 年謫貶荊州長史卒於韶州曲江私宅，歷時 28 年之仕宦生涯為研究視角與研究取材的時間界限。在張九齡仕於玄宗朝內 28 年的宦遊仕途裡，文本取材主要是以熊飛先生所校注的《張九齡集校注》作為研讀的底本。而論題所欲開展的各章節主題，則輔以顧建國與熊飛二位學者所編錄的張九齡年譜，作為研讀文本、考察張九齡事蹟的線索，再由此分門別類出可作為本文論題研究之文本群。

而本論題準擬由張九齡仕宦生涯期間所書寫的詔告敕書、表狀、序文、賦作為主要考察對象。據此，文本將再與所融涉之歷時與共時之史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冊府元龜》、《唐會要》、《通典》、《唐大詔令集》、《大唐新語》，進行史實與張九齡文、賦的對讀，總此構築為張九齡仕宦書寫的時空場域，作為本文論述的依據和考察視角。職是之故，透過考察張九齡在文、賦書寫中，在不同士遇階段內，其仕宦書寫所呈現出的文學形製、寫作筆法、仕宦思想和文學審美等面向有何差異，最後歸結出張九齡文、賦仕宦書寫所承載的面向。

關鍵詞：士不遇、世變、君臣對話、諫諍意識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4
一、古籍專書.....	5
二、年譜及文集.....	6
三、學位論文.....	7
四、期刊論文.....	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23
一、研究範圍.....	24
二、研究方法.....	29
第二章 士不遇的詔告書寫.....	31
第一節 詔敕輔政，股肱盛唐.....	31
一、致君堯舜：諫諍時弊，勸君郊祀.....	32
二、言事議政：循名責實，經術濟世.....	39
三、時濟實用：要言不煩，宏博典實.....	48
第二節 代擬王言，識見邊功.....	51
一、謀戰遣兵：以文兼史，補史之闕.....	52
二、王霸異邦：解訟息爭，分君之憂.....	56
三、走章馳檄：樸實簡練，義正詞達.....	61
第三章 美刺君王的表狀書寫.....	64
第一節 君臣相偕，御批優答.....	64
一、論事請勸：勇陳先見，美聖君王.....	65
二、辭謝慶賀：移孝為忠，忠誠謀國.....	75
三、詞顯情性：遣語精確，情真意篤.....	90

第二節 君臣相猜，犯顏勸諷.....	94
一、諫私公器：滅私盡忠，公私分明.....	95
二、諫阻奸佞：防萌杜漸，公忠體國.....	97
三、謇諤直言：義無反顧，諫諍如流.....	106
第四章 宦遊宮闕的序文書寫.....	108
第一節 宴游送別.....	109
第二節 紀事題贊.....	117
第三節 清新淡雅，文采雍容.....	123
第五章 詠物寫志的賦作書寫.....	125
第一節 鋪寫南嶺之珍.....	126
第二節 辭寄篋筍弱羽.....	131
第三節 睹物興情，情以物興.....	136
第六章 張九齡仕宦書寫的主題.....	138
第一節 士不遇的諫諍意識.....	138
一、士伸知己，仕君報恩.....	138
二、人之所遇，孰能辯乎.....	146
第二節 美刺書寫的審美觀照.....	148
一、雅正沖淡，體合風騷.....	149
二、運散於駢，典麗雅正.....	155
第七章 結論.....	163
參考書目.....	17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張九齡(678-740)，字子壽，一名博物。開元以後，世稱曲江公。生於唐高宗儀鳳3年，卒於唐玄宗開元28年，年63。他一生躬逢武曌移國垂統之用心，遂行文詞科考取才之制，使他得以嶺南邊鄙之出身，於武周長安2年進士及第，年25。時隔五年，於唐中宗景龍元年，授祕書省校書郎。此後，張九齡遇玄宗治世，歷官拜相，至於貶卒。由此可說，他仕宦生涯裡的高峰與低谷，同玄宗朝之任事，密切相關。

而初唐之際，張九齡能以嶺南邊鄙之寒門，平步魏闕，大展一己之文才武略，名垂青史，成為有唐一世的良相名宰，實肇因當世施行的文詞科舉，乃欲破除上承魏晉迄於隋世，仕宦爵位為世族門第所壟斷的政治變革。

張九齡躬逢其盛，因才取士，卓才見用，於是躋身朝廷。而後遇玄宗即位，勵精圖治，舉天下文藻之士，張九齡對策高第，復以文學晉左拾遺，此後，他的仕宦之路可謂順遂，更於開元21年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直抵皇權統治的核心。儘管授命為相，直抵皇權統治的核心，步履仕宦生涯高峰的張九齡，卻遇玄宗年事漸高，荒怠朝政之際，於是，朝廷奸佞如李林甫者輩出，朝政日漸旁落，為其輩所把持。

尤其李林甫自無學術，素忌張九齡文雅為帝知，嘗以牛仙客一事進讒玄宗，排擠張九齡。開元25年，直言敢諫的張九齡遭李林甫讒言所危，又坐引周子諒事，從尚書右丞相貶為荊州長史，三年後，張九齡卒於韶州私宅。

歷來論斷唐祚由盛轉衰的關鍵，多聚焦於玄宗開元治世。玄宗即位前，先是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開創大唐氣象，以貞觀之治奠定盛世根基，旋因武氏竊奪李唐政權，三十餘年間，國家政治亂象叢生，而後復位的中宗、睿宗二朝，仍無力扭轉朝政頹勢，直至玄宗誅滅太平公主集團後，李唐政權始得中興穩固。

因此玄宗鑒於唐朝前期的政治亂象，乃擢才進用，重視宰相人選，於是賢相姚崇、宋璟相繼任事，奠定開元之治的基礎，即使到了開元中期，浮現朝政人事糾紛，但憑玄宗治理得宜，國勢尚猶強盛。

然當張九齡拜相之時，玄宗即位歷二十三年，春秋日高，逐漸沉迷於開元治世的繁華太平，懈弛朝政。張九齡於開元 21 年至 24 年任相，任相不出三年，即為李林甫所構陷而遭玄宗罷相，謫貶荊州以卒。於是，開元末期，忠臣、奸佞並列於朝，即使如此，張九齡依然侃侃諤諤，竭誠事君，盡忠輔國。

張九齡為相雖僅二載餘，然而通觀他任於玄宗朝二十八年間，自授門下省左拾遺起，迄於罷相謫貶荊州長史，建言獻策，識見邊功，洞察奸佞，皆見他殫智竭慮，運籌帷幄，固諫力爭，力挽開元末期國勢頹波，卻絕意於玄宗無意國事，而殊寵邊功的柄政偏廢裡。

於是，善養君欲的李林甫，著力邊功，執此周旋在玄宗與張九齡逐步貌合神離的君臣關係裡，搬弄君相柄政理念相左的矛盾。李林甫以為張九齡既是人臣，其柄政用心當不忤君意，而李林甫即以此用心寵盛玄宗，終於離析玄宗對張九齡長此以往的倚重，進而在開元 24 年接替張九齡的中書令一職，獨攬朝綱。

然則，當張九齡罷相，改任右丞相職，中書令一職由李林甫接替始，開元末

期之玄宗朝，更加快速地奔向過盛必衰之途，以朝綱盡為諂佞所把持，已無敢言骨鯁如張九齡者，「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¹於此，亦已間接折射出唐治世由興盛轉向衰頹的世變分際：

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²

李唐中葉之憲宗朝有宰相崔群，以說言正論聞於當時，他經常向憲宗進諫，批評時政。一回憲宗垂詢：「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而崔群正是借鑒玄宗朝之用人得失以答憲宗，尤據「存亡繫所任」進一步說道：

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明。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³

世來論斷唐祚盛衰二分之由肇因玄宗朝之安祿山叛亂，然而，崔群獨以為開元 24 年玄宗罷相張九齡，專任李林甫，如此「遠正士，昵小人」是理亂之所分的關鍵。親賢遠佞得治，以佞易賢則亂，崔群以張九齡罷相一事殷鑑不遠，藉此盼唐憲宗「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實言朝綱得人乃治，親賢而存的重要。

是以，張九齡的罷相遭貶，既是其個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亦是唐代治亂之所分的轉捩點。職此，本文的目的，乃欲透過張九齡的文、賦作品，關注他任官於玄宗朝期間，由士遇到士不遇的仕宦書寫。

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9。

² 同上註，頁 5081。

³ 同上註，頁 5081。

先是探討張九齡遇合於玄宗時的柄政舉措，如何透過詔告敕書的書寫，輔佐玄宗續寫「開元之治」，此其一。而張九齡以文藻對策見用於玄宗，是開元文壇繼張說之後的領袖人物，在他終身「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的用心裡，如何以其「多得王言之體」的手筆展開君臣對話，股肱盛唐，力挽開元頹波，此其二。然當仕途偃蹇，在言事議政的詔告文書之外，張九齡以賦寫志，又吐露出何種貶謫宦遊下的生命情志，展現士遇到士不遇的仕宦書寫，此其三。最後，透過任官玄宗朝時期的文、賦書寫，張九齡如何展現其諫諍精神。

張九齡因才見用於唐玄宗，其仕於玄宗朝期間的文學書寫，絕大多數為詔告、表狀的公文，此外，亦有因幾回官場頓挫、躓踣，遂發感遇、憤懣的序、賦書寫數篇。無論何者，此皆在在吐露著諫諍與美刺君王，潤色鴻業與體國經野的心跡，雖然其最終仍難逃罷相貶謫際遇。因此，研究張九齡文的仕宦書寫，對於把握玄宗開元、天寶治世如何任賢用才以及理解初、盛唐儒士侍君的態度，息息相關。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唐代是各類文學崢嶸的輝煌盛世，鑄鑄了有唐一世的文治武功與社會經濟。綜觀唐代詩賦詞章的普及與流行，可推自武后移國，大崇文章，以進士之科拔擢人才始，詩歌遂成為舉國仕進者競采紛呈之鵠的。

因此，唐代文學不僅在灌注了歷史長河的涵養下持續地推進和發展，呈現萬千姿態，更在政治權力大力地干預與濡染下，成就一批批維護統治政權的新興階級，即憑藉文詞躋身朝列的士大夫。於是，詩賦取士成為文人致身宦達的途徑，

⁴亦以鬆動了六朝以來貴族專擅仕宦的本位結構，迨至唐玄宗之世，傳統的「關中團體」已遭破壞無遺。

張九齡憑藉文詞躋身仕宦，即以文學之材進用，逐步履登廟堂，輔弼玄宗。因而，歷來關注張九齡的學人與研究者，便從其政治經歷或詩歌擅場劃界析論。前者以歷史、文獻學的考證對於張九齡的生平、家世及詩文作品，進行繫年與評述，而後者則從文學藝術聚焦於研析張九齡的詩歌表現所形塑之審美觀照，以印證其經世治國的儒雅襟懷。

一、古籍專書

近代以來的古典詩學論及張九齡者，有明之高棅所著《唐詩品匯》，其言：「張曲江〈感遇〉等作，雅正沖淡，體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⁵於清世則有沈德潛的《唐詩別裁》說道：「〈感遇〉詩，正字古奧，曲江蘊藉，本源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別，所以千古」。⁶其後，劉熙載《藝概》：「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為李、杜開先。人文所筆，豈天運使然耶」？⁷劉氏又說，「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綿超曠，各有獨至」。⁸

⁴ 「詩賦取士」實乃一統涉概括之詞。根據李浩的研究指出：「詩賦取士的說法實源於唐人自己的概括。……但揆之以史料，則發現並非如此。」而其說援引《大唐六典》卷四：「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需義理愜當者為通。」可得印證。此外，又據陳飛的研究指出：「唐代科舉作為一個考試選材的制度體系，其試項並不限於『文學』，更不限於詩，詩甚至不是長期穩定實行的主要試項。在唐代科舉考試諸試項中，試策才是最重要的試項。……，因此，與其說唐代科舉是『以詩取士』，倒不如說是『以策取士』，更符合實際情況」。因此，張九齡以文學見用於玄宗，實因對策高第。參見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00-202。

⁵（明）高棅：《唐詩品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706。

⁶（清）沈德潛：《唐詩別裁》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8。

⁷ 同上註，頁 57。

⁸（清）劉熙載：《藝概》（台北：華正書局，1985）。頁 57。

高棅、沈德潛及劉熙載三者皆援據張九齡之詩作，盱衡其藝術內涵，以重新審視張九齡於唐詩史的地位與影響。其中又以《藝概》此語：「學騷與風有難易。風出於性靈者為多，故雖婦人女子無不可與；騷則重以脩能，嫻於辭令，非學士大夫不能為也。」⁹可謂深得曲江蘊藉。

二、年譜及文集

對於張九齡史料上的考證與評述，自 20 世紀以降，首要專注於曲江公年譜的校訂。¹⁰臺灣大學楊承祖，於 1964 年發表《張九齡年譜附論五種》，該年譜之特色在於歷時性的聯繫了張九齡的詩文創作以達詩史互證。¹¹

大陸學者顧建國，2005 年出版了《張九齡年譜》，該年譜繫年詳實，尤其對張九齡宦遊、詩文所及之人事，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察，其中更進一步釐清了張九齡的人際交往情況，亦言及唐開元中後期所施行的對內、對外政策。¹²

此外，另一研究張九齡的如椽大筆熊飛，亦在 2005 年發表了《張九齡年譜

⁹ 同上註，頁 102。

¹⁰ 吳宏哲在其碩士論文之〈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裡，歷時性的探討了關於張九齡年譜的編撰。其言：「今知最早者有元代張樞所撰一卷，但此書已佚，因此，自清代學者溫汝適編《張九齡年譜》以來，二十世紀以論文或專著發表的張氏年譜共有三部。第一部是何格恩於西元一九三五年到西元一九四〇年在《嶺南學報》、《廣東文物》等期刊先後發表了〈張九齡年譜〉、〈曲江年譜拾遺〉及〈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等系列論文，可以說為二十世紀的張九齡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吳宏哲所關注探討的三部年譜，即是何格恩、楊承祖及李世亮三者。參見吳宏哲：《論君相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張九齡罷相為例》（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2-3。

¹¹ 楊承祖：《張九齡年譜附論五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64）。

¹² 該年譜於〈序例〉中明言：「張九齡年譜的編撰，始於元代。而見存之譜文，則為清嘉慶丁丑年間溫汝適《曲江集考證》中所附之簡譜（簡稱《溫譜》）；繼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何格恩先生的《張九齡年譜》、《曲江年譜拾遺》、《張九齡年譜補正》（以上三種簡稱《何譜》）及《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簡稱《何考》）；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又有臺灣楊承祖的《唐張子壽先生九齡年譜》（簡稱《楊譜》）、李世亮的《張九齡年譜》（簡稱《李譜》）和劉斯翰校注《曲江集》所附之簡譜（合稱「劉著」），……。拙譜之作，即承以上諸譜而來」。參見顧建國：《張九齡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1-2。

新編》，其充分利用自身多年從事唐代文史研究和整理《曲江集》的資源，在何格恩《張九齡年譜》與《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基礎上編成此譜。

熊氏此譜之特色在於，先是糾正了《何譜》及《何考》等張九齡研究領域的明顯錯誤，再者理清了張九齡生平仕歷中的一些失落的環節，三是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唐代政治歷史研究資料，末則梳理了張九齡交遊中的人事關係。¹³

總此而言，楊承祖、顧建國及熊飛三位學者編錄的年譜，各有所長，但皆為 20 世紀以來的張九齡研究，提供了後出轉精，詳實豐富的考證資料。以是立足於張九齡年譜的考證之上，張九齡的文集得而重新受到注視與完善的整理。

熊飛先是於 2005 年完成了《張九齡年譜新編》，奠定其校注全部張九齡集的基礎，再於 2008 年刊出了《張九齡集校注》的全校本，為張九齡全部的詩文做了詳盡的注解，且此文集所收錄的詔敕類文章，熊氏亦根據《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文苑英華》等總集輯錄為完整的文本。職此可說，熊氏的《張九齡集校注》，為一部現行研究曲江公之詩文完備的注本。¹⁴

三、學位論文

緣於史料整理而為學位論文者，有大陸張寧從文獻學的角度，探究了張九齡家世生平中頗有爭議性的問題，對《曲江集》中的詩文進行校勘後，再衡其詩文

¹³ 熊飛撰著之《張九齡年譜新編》，先是於 2005 年由香港教育出版社出版，而後再於 2012 年由臺北的花木蘭文化出版。

¹⁴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上、中、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

的史料價值給予分析和論證，撰著為《張九齡《曲江集》考論》。¹⁵

在史料的考證之外，吳宏哲以《論君相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張九齡罷相為例》於 2005 年取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碩士學位。該論文嚴尊史學方法，以分析、比較而歸納的論證對張九齡作全面性的探討，包含張九齡在柄政期間所主張的施政理念與措施，以及他在開元盛世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著重於析論張九齡與玄宗互動的情況，是此論文所討論的重點。¹⁶

至於出史入文的張九齡學術研究，更是蔚為可觀。1980 年，徐華中以《張九齡詩研究》取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該論文透過對詩作的箋釋，續以尋繹年月，細探史蹟史事，再就其作品出現之創作素材及意象，多方探討張九齡的創作意識與內在情志。¹⁷

1994 年，陳乃宙以《曲江詩「儒境」研究》為題，揭露以「感遇詩」為主要創作主題的張九齡詩作，其整體而言的基本意義之所在。他在論文中，提出一個「儒境」的觀念，作為透視張九齡詩作的基礎。而該詞語，以為心靈之伸展所到處為「境」，認為「境」或「境界」，對於作品而言，乃是一個本體性的所從出之處。而此心靈之伸展，當以儒者的心性為其伸展之中軸時，其所到者，即為「儒境」。要言之，陳氏的研究視角乃在於，張九齡謫貶荊州後所作的感遇組詩，如何成為詩人心性投射的審美觀照。¹⁸

2015 年，戚家源以《張九齡交往詩研究》為題，將張九齡的交往詩作為主題，先敘述其生平及時代背景，再從交往詩的對象、題材內容及藝術形式等方面

¹⁵ 張寧：《張九齡《曲江集》考論》（山東：山東師範大學，2009）。

¹⁶ 吳宏哲：《論君相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張九齡罷相為例》（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5）。

¹⁷ 徐華中：《張九齡詩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¹⁸ 陳乃宙：《曲江詩「儒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分類探討，以呈現張九齡交往詩的特色。¹⁹

自吳宏哲、徐華中、陳乃宙及戚家源之後，臺灣迄今無有直接深入研究張九齡形成學術專論者，然而張九齡的研究卻未因此消退終止，轉由大陸學者接續深求探研。先是顧建國以《張九齡研究》於2006年取得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該論文凡分五章，綜論張九齡家世、生平、仕宦、交遊及詩文藝術，尤其在第五章，獨立專論張九齡文的體式特徵和時代意義，對本文之研究，深具啟發。²⁰

至於專門探討張九齡詩歌的學位專著，則有牛海蓉《走進盛唐——論張九齡的詩歌創作》，²¹張玉娟《張九齡與初盛唐之交的詩文風尚》，²²劉雪峰的《張九齡與盛唐詩歌》，²³吳元嘉的《張九齡及其詩研究》，²⁴王湖清的《宰相詩人張九齡的文學創作及其影響》，²⁵金豔的《張說、張九齡山水詩比較研究》等，²⁶李谷喬《張九齡詩歌論稿》，²⁷此皆從張九齡的詩歌之作，探討張九齡的詩作題材和藝術手法，如何與盛唐開元治世的外緣政治環境互相融涉，發而為詩人張九齡自身藝術精神的審美觀照。

至於，將盛唐文壇大手筆的張說與張九齡合而論之的，則有柏雙《論張說、張九齡為盛唐文學的繁榮所做的準備》，²⁸柏雙認為，張說與張九齡同為唐玄宗統治前期的賢相，兩人共同扶植後進文人，為盛唐文學的繁榮儲備了人才和轉化審

¹⁹ 戚家源：《張九齡交往詩研究》，（屏東：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

²⁰ 該論文後由中華書局出版為專書。參見顧建國：《張九齡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及顧建國：《張九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²¹ 牛海蓉：《走進盛唐——論張九齡的詩歌創作》，（河南：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1）。

²² 張玉娟：《張九齡與初盛唐之交的詩文風尚》，（曲阜：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²³ 劉雪峰：《張九齡與盛唐詩歌》（內蒙古：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08）。

²⁴ 吳元嘉：《張九齡及其詩研究》（臺北：麗文文化事業，2009）。

²⁵ 王湖清：《宰相詩人張九齡的文學創作及其影響》（武漢：中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9）。

²⁶ 金豔：《張說、張九齡山水詩比較研究》（陝西：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²⁷ 李谷喬：《張九齡詩歌論稿》，（吉林：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5）。

²⁸ 柏雙：《論張說、張九齡為盛唐文學的繁榮所做的準備》，（哈爾濱：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2004）。

美觀念，作出重要貢獻；在詩歌方面，二人繼承初唐四傑，對於陳子昂的成就有所開拓，黜斥六朝浮華的詩風，也吸取了它的長處，崇尚典重，將氣勢與風雅觀引入寫作，而在散文寫作上，注重思想與內容，為古文運動的到來做了鋪墊。兩人有著當朝宰相與文壇盟主的雙重身分，在文學方面的主張與貢獻也呈現出延續性，他們成為由初入盛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座橋梁。

另外，吳元嘉以《張九齡及其詩研究》取得廣東珠海大學碩士學位，他於2007至2009年之間，陸續發表了圍繞著自身學位論文主題的四篇專文，分從〈張九齡贈答詩與興、觀、群、怨之詩教〉、〈張九齡詠懷詩中的自我形象〉、〈「九齡風度」與張九齡詩之風格〉和〈行旅人筆下的山水——張九齡行旅詩中的情、景關係〉探討曲江公的詩歌藝術與詩人情志。²⁹

四、期刊論文

經由張九齡年譜及《曲江集》陸續考證臻於完善的文獻資料之修訂與出版，近20年來大陸學者研究張九齡的風氣迤邐而開。學者顧建國於2000年以〈張九齡研究百年綜論〉為題撰文，揭示了20世紀以來文史學者之所關注張九齡，並將其視為初、盛唐文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的三個面向，分別是：張九齡生平事蹟的研究，思想生平的研究及詩文創作的研究。³⁰

關於張九齡生平事蹟的研究，2001年李芳民以〈張九齡「不協時宰」、「拂

²⁹ 吳元嘉此四篇文章，於2007至2009年間陸續發表，前三篇〈張九齡贈答詩與興、觀、群、怨之詩教〉、〈張九齡詠懷詩中的自我形象〉和〈「九齡風度」與張九齡詩之風格〉，分別發表於《吳鳳學報》，2007、2008和2009年12月。〈行旅人筆下的山水——張九齡行旅詩中的情、景關係〉，則刊登於《臺中教育大學學報》，2009年12月。

³⁰ 顧建國：〈張九齡研究百年綜論〉，《淮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期(2000年)，頁104-109。

衣告歸」考〉，探討了張九齡在開元初曾有一次南歸的舊事。此事在新、舊《唐書》本傳未載，然而李氏根據中唐徐浩所撰《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確載此事，此外，在《全唐文》卷 291《開大庾嶺路記》亦載此事。李芳民認為張九齡「拂衣告歸」在開元初，事當無疑。但是張九齡此次南歸出於「不協時宰」，而「不協時宰」中的時宰為誰？「拂衣告歸」究在何年？又在何時返京？

一般認為「時宰」當指姚崇，「拂衣告歸」時在開元 3 年秋，不過李氏根據《冊府元龜》、《通鑑》、〈上姚令公書〉等文獻史料判讀，認為此結論仍有可議處，因而為文論述。他最後於研究結論指出，時宰應為盧懷慎，而返京時間應當在開元 6 年春。³¹

張九齡於唐開元 4 年主持開鑿大庾嶺新路，學者王若楓及肖紅共同撰文〈張九齡開鑿大庾嶺新路的政治文化意義〉，從地理價值與文化傳播向度指出張九齡開鑿這條新路，意義是多方面的。尤其，嶺南在秦代以前是南越族人聚居的地方，史稱「荒服」，而大庾嶺的開通，在嶺南促進了民族大融合，使得唐宋以後，嶺南地區對中央的向心力日益增強，加強了嶺南與中原的聯繫，對嶺南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³²

在〈王維與宰相張說、張九齡交游考〉一文，熊飛援據史料參照王維的詩文，探討王維之能受到提拔，是否僅止於上書任宰輔時期的張九齡一人？經由該篇論文之考證，熊飛認為王維不只曾上書張九齡，亦曾上書張說，接著進一步指出，在研讀張九齡與王維往來的書信後，可知兩人交游密切，王維因而得為張九齡所提拔，此外，文中亦以大篇幅討論王維是否曾與張說交游，得而受到張說的提拔，

³¹ 李芳民：〈張九齡「不協時宰」、「拂衣告歸」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1 期(2001 年 2 月)，頁 129-133。

³² 王若楓、肖紅：〈張九齡開鑿大庾嶺新路的政治文化意義〉，《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30 卷第 10 期(2009 年 10 月)，頁 10-13。

熊飛針對此一假設歸結出，史料文獻雖未曾明言王維與張說交游，然亦不可否認此之可能。³³

此外，熊飛潛心研究張九齡多年，可以〈張九齡研究相關史料甄辨〉一文為代表。熊氏從史料對張九齡的生平、籍貫及主試等問題深入探討，尤其辨明了學術界長年來對張九齡籍貫爭辯未果的疑義，即是張九齡的祖籍當為始興縣。³⁴

至於張九齡思想生平及詩文創作的研究，一直以來受到文學研究者的關注與探討。在研究張九齡思想生平的期刊中，多數研究者將張九齡的仕宦歷程作為參照其人生出處進退的時間軸，並藉以釐析張九齡在士遇與士隱之間所追尋的精神寄託與人生價值。

2008年，胡燕撰文將張九齡的人生理想模式概括為「恩了身退」。而「恩了身退」在諸多方面不同於「功成身退」的普泛人生模式，因為前者把士人的出與處，外在的社會責任與內在的自由渴望理想化地融為一體。胡燕認為，張九齡既渴望完成儒家賦予士人的社會責任，又渴求自由自適，所以把報答君恩、為國盡力視作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另一方面又把自由逍遙作為他的終極追求。

所以，胡燕認為，「恩了身退」能把張九齡在追尋儒、道兩家的人生價值觀統一起來，把出與處、外在的社會責任與內在的本能渴望理想融合，互補其闕，從而超越了單純儒家或單純道家的生命境界。而胡燕以此認為，張九齡是出身寒族而躋身上層的寒族士人心態的典型代表。³⁵

³³ 熊飛：〈王維與宰相張說、張九齡交游考〉，《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31卷第4期(2010年4月)，頁5-8。

³⁴ 熊飛：〈張九齡研究相關史料甄辨〉，《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1期(2014年)，頁7-12。

³⁵ 胡燕：〈「恩了身退」：張九齡的人生理想模式論——兼論唐代寒族士人心態〉，《社科縱橫》第23卷第9期(2008年9月)，頁78-79。

同年，胡燕以〈張九齡隱逸思想探微〉為題，討論張九齡仕與隱的問題。論文認為，張九齡一直以來為仕與隱困擾著，即「仕中戀隱，隱中求仕」，在為官時思慕山林，居山林時存魏闕。若依張九齡仕進中的隱逸情懷，可概分為三期：入仕初期(約 707-716 年)，此際的張九齡因懷才不遇，久處下僚，不協時宰，於是憤而辭官歸隱。其後於開元 6 年(約 718 年)再度入京為官，以及出為洪州吏時期，此期間張九齡大致表現為「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亦官亦隱但略有不同。至於謫遷荊州長史時期，已然心灰意冷，不得已委順於天地之間，可說張九齡隱逸思想的轉變與其仕途沉浮息息相關。³⁶

順此研究視角與脈絡同胡燕者，有孟修祥以〈張九齡在荊州及其與莊屈文化精神之關係〉為文關注。他認為，張九齡晚年被貶荊州，既是其人生的一個轉折處，亦為其創作的轉捩點，曲江公雖言「惟文史自娛」，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與之詩酒唱和，但畢竟為放逐之臣，且因謫貶而身歷楚境，直接感受到荊楚文化氛圍，孟氏以此認為張九齡深受屈原的影響乃屬必然。不過，綜觀張九齡的作品，其中充滿了達觀、超然的精神，實與他少年聰慧，潛心學問，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又不無關係。因此，孟修祥認為，「九齡風度」是「並莊屈之以為心」的必然結果。³⁷

再來，從「士」論張九齡為仕者，有仲紅衛開篇援引錢穆先生論「士」說：「中國文化有與並世其他民族其他社會絕對相異之一點，即為中國社會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會無之」。³⁸仲紅衛著眼於「士」此一身分位階存在於中國社會裡的文化特殊性，分由儒行楷模、學優則仕、與胥吏集團之衝突、政治理想之內在矛盾及理想破滅和以文史自娛五面向來解讀張九齡的政治困境。

³⁶ 胡燕：〈張九齡隱逸思想探微〉，《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8 年)，頁 26-34。

³⁷ 孟修祥：〈張九齡在荊州及其與莊屈文化精神之關係〉，《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4 期(2008 年 8 月)，頁 20-23。

³⁸ 仲紅衛：〈從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脫——以張九齡罷相為中心〉，《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51。

仲氏認為，以張九齡論，當其初入仕途之時，不畏艱險，惟道是從，故有上疏指陳朝政得失，有勸阻張說勿假公以濟私，其剛正鯁直者如此。當張九齡身居中樞，而君政稍怠之時，又以弘道安民為己任，故有極言得失，忤逆帝意，力阻唐玄宗用李林甫、牛仙客、張守珪為相事。此後又有力保太子及勸殺安祿山事，有天長節獨進《金鏡錄》事，其忠信耿直者又如此。凡曲江公此之種種，《新唐書》稱之「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故仲紅衛以為張九齡乃真士人，然而，當張九齡仕途偃蹇，其胸中仍然存在放跡林泉、隱逸自保之意。

因此，該篇論文從張九齡罷相事件表述，以「王者師」的身分弘揚和實踐「道」的理想，恰恰是導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對於一部分既無法實現政治理想又不願退出官場的士人而言，應對困境的策略，即是以「心隱」的方式保持個人內在人格的相對完整。³⁹

再來，論述張九齡思想與仕途沉浮相關者，有于展東關注了張九齡貶謫洪州期間的心路歷程。其說，在盛唐前期，張九齡是時人所景仰的時哲和文宗，而開元 15 年，因坐連張說罷相之事，張九齡遭貶為洪州都督，於是，張九齡在洪州期間，思緒複雜，鬱悶消沉、寡落不平，並且對仕途險惡有了更深切的體悟與感受。而由於入世漸深，理想敗挫，他開始嚮往歸田退隱與世外的人生境界，其間濃郁的思鄉之作，也飽含著詩人對家園美好的眷戀和歸田退隱的思想。⁴⁰

《新唐書·張九齡傳》有言：「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⁴¹於是，「九齡風度」成為唐玄宗拔舉人才的標準和當世官吏的楷模，亦以為曲江公揚名後世的儒雅襟懷。然而「九齡風度」究指為何？

³⁹ 同上註，頁 51-57。

⁴⁰ 于展東：〈論張九齡貶謫洪州期間的心路歷程〉，《殷都學刊》第 1 期(2011 年)，頁 65-68。

⁴¹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9。

程宇昂從唐代選舉官員的一般標準和張九齡作為官吏楷模兩個方面解讀了九齡風度，而在此之前，程氏先由《後漢書》及魏晉南北朝、唐宋史料中，釋析了「風度」一詞，在他的闡明裡，他認為九齡風度契合了魏晉風度，皆強調了包括體貌在內的士的綜合稟賦的外現，與三代以下韜光養晦、注重內修，以禮為圭臬的道德人格有著明顯的分野。所以，程氏認為，九齡風度是在身、言、書、判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個性風采，也是躬行直道、堪為王佐、胸懷萬類的道德人格，故九齡風度是前、後二者合鑄而成的完人符號。⁴²

承此「九齡風度」而來的論述，可說張九齡不僅因為盛唐良相而名留史冊，其詩文成就更與其仕宦功業並舉烜赫。一方面，張九齡秉持儒家的直諫之風，知人善任，與佞臣論爭，成就了君王所謂的九齡風度，一方面他在山水詩內，著力於追求儒、道兼濟的情懷，如薛正昌即認為，「九齡風度」的人格魅力可與其詩文所顯現的「清澹」並舉，更由於張九齡當時的政治地位與唐朝詩賦取士的交互作用下，更可說張九齡是促成了自然清澹的一代詩宗。⁴³

就在上述研究者將視角傾力關注於張九齡的仕宦生涯，如何與其文學思想相互濡染的論辯中，劉占召卻從宏觀的角度，別開蹊徑。劉氏站在歷史思潮遞嬗的節點上考察張九齡的儒學思想內涵，經由〈張九齡對盛唐儒學的承繼與超越〉進行論述，其要義在於張九齡對深化、轉變唐代儒學有何重要的意義。

劉氏觀察到，唐代儒學處於漢代經學和宋明理學之間的過渡階段，張九齡的儒學思想體現出過渡階段的特徵。他認為，張九齡一方面與張說宣揚符命祥瑞，通過制禮作樂來潤色王業，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揮著漢代儒學的精義，另一方面又

⁴² 程宇昂：〈九齡風度：個性風采與道德人格的合鑄〉，《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32卷第7期(2011年7月)，頁9-13。

⁴³ 薛正昌：〈九齡風度與清淡詩宗——相業與詩文並舉的一代名臣張九齡〉，《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9年)，頁77-81。

自覺踐履著儒家的德行操守。此二特徵反映出張九齡儒學思想內涵的內、外本質，即在於，從制禮作樂以緣飾盛世到探討德行修養以挽救世道人心。

承此，身居中樞高位加以柄政賢良，張九齡誠以自身的政治風範，影響了當世文儒，劉占召認為，其政治風範致使盛、中唐儒學出現了由外向內的轉變，體現出漢、宋儒學發展的趨勢。而張九齡的儒學觀不僅開啟了儒學發展的新命題，而且以此樹立儒家的人格典範，對唐代士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⁴⁴

至於論題闡揚張九齡詩文藝術者，相較於史料與思想研究，更可謂靡然從風。而切乎本文論題者，有陳建森取材《曲江集》敕書，以開元 22 至 24 年間突騎施蘇祿侵犯四鎮為個案，探究張九齡敕書的文史價值。

陳氏的研究指出，張九齡代唐玄宗所擬的敕書，較正史為詳細地記載了開元 22 年至 24 年，唐與突騎施蘇祿之間戰爭的史實，和唐王朝針對突騎施蘇祿犯邊而展開遠交近攻的謀略，以此敕書所載，可補兩《唐書》和《資治通鑒》記載之闕，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另一方面，從唐代散文發展史的角度審視，《曲江集》敕書繼承上古散文「尚用」和「辭達」的傳統，以意遣詞，思路精密，文辭樸實簡練，可謂引領了盛唐開元中、後期朝廷下行公文的文風，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因此，《曲江集》敕書值得治唐代文史者重視。⁴⁵

北京大學陳先明，認為談論張九齡詩文藝術者多，然論及張九齡文學思想者

⁴⁴ 劉占召：〈張九齡對盛唐儒學的承繼與超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 1 期(2014 年 1 月)，頁 126-130。

⁴⁵ 陳建森：〈張九齡《曲江集》敕書的文史價值——開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突騎施蘇祿侵犯四鎮個案探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7 年 6 月)，頁 61-62。

少，雖然張九齡未在《曲江集》內專章明言自成體系的文學思想，然而透過細讀張九齡有關文獻可知，他確實有著明確和成熟的文學思想。在陳先明的研究裡，他析理出張九齡的文學思想要點有三：其一為，強調有感而發和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其二為注重樸實的文風詩風；其三則是，以倡導雅頌之聲為核心的系統看法。陳氏又認為，第三點至為明朗、最為重要，在於它包含了三個相互緊密聯繫的實現途徑，即是博覽群籍、高談王霸和浩瀚為文。⁴⁶

承上所論，2010年趙彩花以〈張九齡的文學感興觀與言象表現觀〉為題探究張九齡的文學創作觀，其認為，張九齡雖沒有專門的文學批評篇章，但在他的文學創作和評價他人生平的文章中，時時凸顯出自身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想。

文中提及，「興象」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批評概念肇始於唐代，因此，趙彩花經由分析張九齡詩作中出現的「感」、「興」、「情」和「言」、「象」、「意」等詞彙，來梳理張九齡文學作品的感興觀和言象觀。研究發現其「感」、「興」的內容包括自然和社會、人生與歷史，且主張表達情之「和」，而「象」則包括物「象」、喻「象」和無形之「象」，同時，張九齡對「言」、「象」、「意」的關係有自己獨到的認識與闡述。⁴⁷

翌年，趙氏再以〈張九齡與唐代儒家文論的佛道特色〉為文，繼續探究張九齡文學創作的思想及內涵。該論文分從，張九齡文學思想中的「群有」概念及內涵、「明道」概念及內涵和三教歸一的時代思潮對張九齡「群有」、「明道」主張的影響三方面逐步析論。

⁴⁶ 陳先明：〈張九齡文學思想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9卷第2期(2008年2月)，頁14-17。

⁴⁷ 趙彩花：〈張九齡的文學感興觀與言象表現觀〉，《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9月)，頁121-124。

該論文指出，張九齡認為文學要反映「群有」，而「群有」內涵包括自然、社會人生各方面，尤其「群有」一詞，源出於道家，而在他運用「群有」一詞的作品裡，一以表達了從國家到個人、歷史到現實亦或自然到人類社會等的從外在到內心、從物「表」到物「理」的領悟。

此外，趙彩花亦觀察出張九齡文集中「道」字使用頻繁，大約有 231 個左右，尤其張九齡所謂的「道」充滿多元而豐富的詞義，值得加以釐析。例如，當張九齡的「文以明道」內涵指向社會政治時，其「道」指儒家之道，然當指向個人心靈安頓時，其「道」則兼括佛、道二家思想。

準此，該論文歸結出，張九齡「群有」、「明道」論的內涵典型反映了唐玄宗時代三教融合的影響，也體現了唐代儒家文論外顯為儒家之道，而內修則兼有佛、道思想的典型特色。⁴⁸

除了從張九齡的思想層面考察曲江公的文學觀之外，薛新萍則卓有見地的將張說、張九齡的文章以「大手筆」為研究視角，將二人之文章風格與文壇地位並舉而論。該論文指出，此二人先後任於玄宗朝，且登宰輔之高位，乃初唐漸盛時期的兩位關鍵人物，二者文章皆顯示出雄渾闊達的盛世氣象，並開啟了駢散兼具的一代文風，尤其張說更以「大手筆」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美名。

承此，薛新萍基於學界歷來認為張說文勝於詩，張九齡詩勝於文，因而對張九齡文質兼勝、情景交融的詩歌研究居多，對其文則關注較少，所以，透過考論「大手筆」之稱的淵源及內涵，梳理了二張之文在內容意涵、創作體式、情感生發及藝術魅力等方面的相似之處。其考察由二張文章體式析以四面向而論，分別

⁴⁸ 趙彩花：〈張九齡與唐代儒家文論的佛道特色〉，《理論縱橫》第 2 期(2011 年)，頁 23-26。

為：實濟時用、潤色王道的敕書、頌贊，此其一；反映政治思想和主張的章疏、狀表，此其二；再者論情感貫注、獨具體式的碑誌、祭文，末則為典雅雋永、清新逸氣的小序、賦文。

該文章在詳細說明張說之所以博得「大手筆」之盛名，亦同時明確指出，張九齡文繼張說，風格相似，情詞兼美，博大閑雅。此外，還能不拘體式，不落套典用語，可說，張說的「大手筆」由張九齡承襲開拓，以典雅富贍的風貌、雄渾暢達的境界、清新超拔的氣格，呈現了盛唐恢弘氣象，並藉此影響了盛唐文學家的寫作風格及技巧，為唐文發展開闢新路，並推動其走向振興。⁴⁹

再來，2012年戴紅梅連續撰文，分別從散文體式的流變發展及文章風格的藝術審美來肯定張九齡於文學史的關鍵地位。由於學界歷來認為張九齡散文大多是文學性不強的公文，所以占《曲江集》四分之三的張九齡散文，相較於其詩歌之作的研究，非常薄弱。

但是戴紅梅認為，張九齡的各類散文其實深具文學價值。其就體制面向考察，張九齡的文章順應初唐文風，把散文引入駢文，使其文章含有散文的精神氣勢，具有駢散相間、典雅自然的審美特徵，大大加速了唐代開元年間文章駢散結合的趨勢。除此之外，張九齡各類散文在遵循典範的同時，又不同程度地突破特有規範的束縛，戴氏認為，張九齡相對於「燕許」等人而言，他更頻繁的把散文引入駢文，大量使用奇句單行文字，法中求活，活中見美，呈現出駢散相間而能典雅自然的藝術特徵，使張九齡無愧於「文場大元帥」的尊稱。⁵⁰

⁴⁹ 薛新萍：〈張說、張九齡「大手筆」考論〉，《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第28卷第2期(2012年4月)，頁10-12。

⁵⁰ 戴紅梅：〈駢散相間·典雅自然——論張九齡散文的審美特徵〉，《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2期(2012年4月)，頁71-75。

而戴氏又在〈體兼雅頌·浩瀚為文——論張九齡散文之氣盛〉一文裡，延伸前篇論文中對張九齡散文藝術的觀察與論述，戴氏認為，張九齡的各類散文不同程度地呈現出體兼雅頌而浩瀚為文的氣盛之勢，而此文氣具體地體現在宣導雅頌時高談王霸，或是美化王政而鋪張揚厲，抑或主文直諫所秉持著的正氣浩然。

所以，該篇論文歸結出，因由此種「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及「至大至剛」的正氣，使得張九齡散文不僅具有鋪張揚厲的外在之勢，更有一股內在之氣恣意流動，予人氣盛之美。⁵¹

綜上所述，20世紀以來關注張九齡生平事蹟，思想生平及詩文創作的研究論文，堪稱巧思漸豐，面目一新，為本論題提供了研究思辨與文獻參照的細讀線索。不過，縱觀張九齡的仕宦生涯，衡諸其文學體貌，欲掌握本文所企圖探究的命題核心，不僅止於爬梳曲江公生平年譜、作品繫年與文學藝術可致，唯必須釐清其任官於玄宗朝時期的政治空間和時代氛圍，才能更確切的把握張九齡仕宦書寫的藝術精神與歷史價值。

若提到「開元之治」，可說與玄宗任用姚崇、宋璟、韓休、張說及張九齡等賢相密切相關。但是這些名相是在什麼條件下出現的？玄宗任用賢良的考量有什麼特色？「開元之治」時期的宰相政治中又存在什麼問題，接著玄宗主要採取什麼策略對治這種問題？

胡如雷在〈唐「開元之治」時期宰相政治探微〉一文裡針對上述問題展開討論，尤其著力於玄宗在「開元之治」時期內所任用宰相人選的政治策略，並且在文中，對玄宗罷九齡用牛仙客及李林甫為相一事，從經濟財政的角度多所著墨，

⁵¹ 戴紅梅：〈體兼雅頌·浩瀚為文——論張九齡散文之氣盛〉，《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0卷第7期(2012年7月)，頁65-68。

對本文論述深有啟發。⁵²

承接胡如雷所研究的議題，李鴻賓亦從開元、天寶的治世時期釐析玄宗朝，如何由鼎盛走向衰落的轉折所在。其由觀察玄宗朝中樞政局的人事組成、布局和政局演變作出分析，再指出玄宗朝治世由盛而衰的轉折，不單指向玄宗用人謀略的失衡，更包含著君王自身的耽溺逸樂，玄宗治世日久所衍伸的政治及社會問題等，唐朝實因此等重重累積才致使安祿山乘機發難，傾頽國勢。⁵³

在討論唐玄宗如何任人用賢，以及張九齡躋身相位後遭謫貶的歷史進程裡，張說、李林甫和高力士等人物與張九齡的仕宦生涯發展密切相關，不容忽視。首先，張九齡雖因才鑒受到吏部試萃拔擢，然而能受到重用進遷，可說和時任宰相張說的親重，與通譜系有關。

姜朝暉在〈張說與初盛唐政治文化關係考述〉中，表述了張說在盛唐的政治地位。姜氏提到，在盛唐文化的舉措上，張說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起初，張說出身門第寒微，卻能在初、盛唐社會文化的轉型時期，以其傑出才能，成為「近代新門」。任相後又輔佐玄宗，君相共同營造了崇尚文學的社會氛圍，為迎接盛唐文學、良才的到來，做好了準備。而文末認為，張說以一代文宗的身分實為盛唐文學的開路人，肯定了張說的政治貢獻。⁵⁴

士遇或士不遇，往往不是單一人物或事件的推致，即使如此，亦常潛伏著禍福相倚的肇端。就張說對於張九齡而言，先是成為張九齡初履官場的重要推手，卻也於玄宗開元 13 年封泰山一事裡，因偏私所親，濫用名爵公器，使張九齡坐

⁵² 胡如雷：〈唐「開元之治」時期宰相政治探微〉，《歷史研究》第 1 期(1994 年)，頁 66-74。

⁵³ 李鴻賓：〈唐玄宗擇相與開元天寶年間中樞政局〉，《文獻》第 3 期(1995 年 12 月)，頁 70-82。

⁵⁴ 姜朝暉：〈張說與初盛唐政治文化關係考述〉，《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58-62。

連其事遭貶。之後，張九齡依憑個人才識又為玄宗進用為相，然當其為相之時，玄宗已漸疏朝政，最終因君相理念失和及李林甫居中離析而罷相。

承此而言，有些學者認為玄宗罷九齡以李林甫為相是盛唐治亂的分水嶺，而此觀點，尤以新、舊《唐書》與史學界的討論為代表，然而，此觀點衡諸於歷史的發展是否客觀公允？

宋社洪撰文〈相李林甫是唐治亂之分嗎〉，從開元、天寶間，考察了唐王朝政治、經濟環境及邊境形勢後，他認為實是開元、天寶間，唐王朝政經環境的變化導致了李林甫上臺任相專斷朝政。此外，當時的邊境形勢及戰爭需要，又使唐王朝作出了重用胡帥鎮邊的抉擇，對於河北地區的戰略考量和東北、西北邊疆防衛的互動形勢，又導致了重用安祿山，使其稱雄東北的結果。

所有種種都是當時客觀形勢的產物，此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演變過程，並非單由李林甫輩一二人的意志就可以轉移。因此，宋社洪認為，以相李林甫作為唐治亂之分的界標有欠公允。⁵⁵

以宋氏觀點，可堪為唐玄宗相李林甫的考量，以及李林甫為相時期的政策作一持平之論。而該文對於本文所欲論述的視角，提供了不同視域且可供參照的觀點及線索，因此，本論題將據此進一步解讀，張九齡與李林甫同登玄宗朝任事時期，君相三者互動的關係，和張、李二人同朝為官共事議政的態度。

高力士，作為唐玄宗最信賴的得力助手，以其特殊的身分地位，在君相的溝通中起了調和的關鍵作用。他隨侍君側，卻多能從時勢大局出發，積極協調唐玄

⁵⁵ 宋社洪：〈相李林甫是唐治亂之分嗎〉，《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5卷第1期(2004年2月)，頁62-65。

宗與朝臣尤其是與宰相的關係，促進了君相之間的通力合作。舉凡姚崇、張說及張九齡對高力士敬重有加的態度可知，尤其在張九齡與李林甫的「文學與吏幹之才」的政爭裡，高力士保持了清醒的客觀立場向玄宗進言，其言雖未得玄宗察納，然而不可否認，高力士直達聖聽的地位及居中一以旁觀、一以斡旋的立場，對開元、天寶盛世的局面有著重要的影響。

龔靜在〈淺論高力士在溝通君相關係中的作用〉指出，高力士因為在玄宗登基為帝之前，偕同遭遇政爭而能隨侍在側，深獲玄宗君心寵信，又以其才幹所展現的手腕、身段折服玄宗及朝臣，其雖因過度參與玄宗朝政，於後世有宦官專擅之諷，然高力士在關鍵時刻敢於直言進諫，維護唐玄宗，為李唐天下竭忠盡心，是值得肯定的。⁵⁶

職是之故，衡諸前輩學者出文入史的研究成果，一代良相張九齡的歷史地位與文學貢獻，逐步隨著年譜的編輯、文集的校注、文學思想及文學藝術審美等面向的探究，得到了詳瞻的梳理及嶄新的審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在立足於前人的學術研究成果之上，聚焦於張九齡仕於玄宗朝期間的應用文體及賦作書寫展開論題。論題亟欲探究，在張九齡仕宦生涯的文、賦書寫裡，如何在潛藏著士遇的焦慮下應對、居處世變的困境，並且此焦慮與困境，在張九齡遇合唐玄宗的仕宦書寫裡，其美刺君王的諫諍意識，又經由君臣如何對話的表述裡，迤邐而開，以股肱盛唐。

⁵⁶ 龔靜：〈淺論高力士在溝通君相關係中的作用〉，《安康學院學報》第20卷第3期（2008年6月），頁78-80。

是以本文論題為〈遇合·對話·貶謫——張九齡文、賦的仕宦書寫〉，即在於關注視角及研究取材與前輩學者分從生平史料的考據、生平思想的窺探及文學理論與藝術的探察等單一面向有所不同。

一、研究範圍

本文之研究範圍，以張九齡於唐玄宗先天元年對策高第，以文學晉左拾遺起，迄於開元 28 年謫貶荊州長史卒於韶州曲江私宅，歷時 28 年之仕宦生涯為研究視角與研究取材的時間界限。

在張九齡仕於玄宗朝內 28 年的宦遊仕途裡，以《張九齡年譜》與《張九齡文集》橫向繫年，擇取出符合本論題研究的文本，至於文本取材，主要是以熊飛所校注的《張九齡集校注》作為研讀的底本。而論題所欲開展的各章節主題，主要由詔告敕書 125 篇、表狀 16 篇、序文 12 篇及賦 2 篇作為論題陳述的依據，再輔以顧建國與熊飛二位學者所編錄的張九齡年譜，作為研讀文本、考察張九齡事蹟的線索，再由此分門別類出可作為本文論題研究之文本群，如下列各表所示：

(一)詔告敕書：

篇序	篇目	頁次
1	南郊敕書	423-426
2	東封敕書	432-436
3	后土敕書	442-446
4	籍田敕書	451-456
5	敕皇太子納妃	463-464
6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467-468
7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470-471
8	敕處分朝集使	474-475

9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477-478
10	敕歲初處分	480-481
11	敕令禮部掌貢人	484
12	敕幸西京	486
13	敕置十道(採訪)使	488
14	敕授十道(採訪)使	490
15	敕停官寄贈太子	493
16	敕處分縣令	494-495
17	敕處分縣令	497
18	敕處分選人	498
19	敕議放私鑄錢	499-500
20	敕處分宴朔方將士	501-502
21	敕宴幽州老人	504
22	敕慮囚	505
23	斥擇日告廟	507
24	籍田之制	509
25	諸王實封制	511
26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513-514
27	廢王皇后制	516
28	廷燕國(公張說)中書令制	517-518
29	敕處分舉人	519
30	敕薛泰書	521
31	敕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書	523
32	敕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525
33	敕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526
34	敕(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527
35	敕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529
36	敕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書	530-531
37	敕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以下)書	532
38	敕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書	533
39	敕新羅王金興光書	534-535
40	敕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537-538
41	敕翰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下)書	540-541
42	敕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書	541-542
43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543-544
44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等)書	545-546
45	敕劍南節度(副大)使王昱書	547

46	敕(新來)投降奚等書	549
47	敕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等書	550-551
48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553
49	敕(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書	555-556
50	敕契丹都督涅禮書	557-558
51	敕奚都督李歸國書	560
52	敕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書	562
53	敕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書	563
54	赤松漠都督涅禮書	564-565
55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566
56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567
57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569
58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570-571
59	敕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572-573
60	敕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書	574
61	敕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書	575-576
62	敕新羅王金興光書	577
63	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	579
64	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	582
65	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	583
66	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	584-585
67	敕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書	586
68	敕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書	588
69	敕當州別駕董懲運書	591
70	敕當息(柘靜維翼諸州)羌首領(百姓等)書	593-594
71	敕嵩州都督許齊物書	595
72	敕隴右節度(使)陰承本書	597
73	敕安西節度副大使王斛斯及將士等書	599
74	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等)書	601
75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等書	602-603
76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等書	604
77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及將士已下書	606
78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等書	607-608
79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等書	609-610
80	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611
81	敕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612-613
82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及將士已下書	614-615

83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書	616
84	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書	617-618
85	敕(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619-620
86	敕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書	621
87	敕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623-624
88	敕突厥苾伽可汗書	625-626
89	敕突厥(登利)可汗書	627
90	敕金城公主書	629
91	敕劍南節度(副大使)王昱書	630
92	敕突厥登利可汗書	631
93	敕突厥可汗書	633-634
94	敕突厥施毗可汗書	635-637
95	敕突厥可汗書	641
96	敕突厥可汗書	643
97	敕吐蕃贊普書	647-648
98	敕磧西支度(營田)等使章仇兼瓊書	650-651
99	敕吐蕃贊普書	652-653
100	敕吐蕃贊普書	654-656
101	敕吐蕃贊普書	659
102	敕吐蕃贊普書	661
103	敕金城公主書	663
104	敕吐蕃贊普書	664-665
105	敕金城公主書	666-667
106	敕吐蕃贊普書	667-668
107	敕(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書	669-670
108	敕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671
109	敕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書	673
110	敕護密國王(真檀)書	674
111	敕護密國王(真檀)書	676
112	敕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書	677-678
113	敕勃律國王(蘇·沒謹忙)書	679
114	敕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681
115	敕罽賓國王書	682-683
116	敕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書	684
117	敕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書	686-687
118	敕柘靜(等)州(部落)首領書	688
119	敕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689-690

120	敕蠻首領鐸羅望書	691-692
121	敕安南首領(歸州刺使)爨仁哲(等)書	693
122	上封事書	846-850
123	上姚令公書	854-856
124	答嚴給事書	860-862
125	與李讓侍御書	866-868

(二)表、狀

篇序	篇目	頁次
1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并御批)	697-698
2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700-701
3	荊州謝上表	702-703
4	賀赦表	705
5	慶冊皇太子表	706-707
6	洪州進白鹿表	708-709
7	為兵部尚書王暎謝平章事表	710-711
8	為信安(郡)王獻聖真圖表	714-715
9	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719
10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784

(三)諫書

篇序	篇目	頁次
1	諫張說勿私公器	1112
2	請諸安祿山疏	1114-1115
3	諫官牛仙客尚書及賜實封	1116-1117
4	諫廢三子	1119-1120
5	諫相張守珪	1122
6	諫相李林甫	1123

(四)序文

篇序	篇名	頁次
1	集賢殿書院奉敕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872
2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875
3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878
4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883
5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	886
6	開鑿大庾嶺路序	890

7	饒宋司馬序	895
8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898
9	韋司馬別業集序	900
10	別韋侍御使蜀序	903
11	獅子贊序	906
12	鷹鷂圖贊序	910

(五)賦

篇序	篇名	頁次
1	白羽扇賦并序	413
2	荔枝賦并序	415-417

而本論題準擬由張九齡仕宦生涯期間所書寫的詔告敕書、表狀、序文、賦此四者文學體式(如上表所示)作為主要考察對象。據此,文本將再與所融涉之歷時與共時之史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冊府元龜》、《唐會要》、《通典》、《唐大詔令集》、《大唐新語》,進行史實與張九齡文的對讀,總此構築為張九齡仕宦書寫的時空場域,作為本文論述的依據和考察視角。

二、研究方法

將張九齡仕宦於玄宗朝 28 年期間,從《張九齡集校注》取材之詔告敕書 125 篇、表狀 16 篇、序文 12 篇及賦 2 篇作為論題陳述的依據,此外,熊飛於其校注之張九齡制敕等文中,附錄唐玄宗之御批甚多,本論題認為這些文字,更可以細緻地解讀出張九齡仕於玄宗朝時,君臣柄政的理念以及君臣如何對話的面向,因此將附註御批納入文本內一同論述。

接著,透過張九齡文、賦仕宦書寫的歷史背景探究,達致文、賦與史對讀的方式,再分從第二章〈士不遇的詔告書寫〉、第三章〈美刺君王的表、狀書寫〉、

第四章〈宦遊宮闕的序文書寫〉及第五章〈詠物寫志的賦作書寫〉進行論述，經由整理與歸納後，透過第六章〈張九齡仕宦書寫的主題〉綜合探究張九齡文、賦仕宦書寫的審美觀照、諫諍精神及其仕宦書寫的意義，即是，張九齡在士遇與世變下，如何經由文學書寫，次第向後世折射出文士、良相與騷人多重身影的曲江蘊藉，甚且在不同士遇階段內，其仕宦書寫所呈現出的文學形製、寫作筆法、仕宦思想和文學審美等面向有何差異，最後歸結出張九齡文、賦仕宦書寫所承載的面向與展現的風貌。



第二章 士不遇的詔告書寫

本章擬從張九齡於唐玄宗先天元年對策高第，以文學晉左拾遺起，任事玄宗朝所書寫的詔告敕書論述張九齡仕宦書寫所承載的面向，尤在於探討張九齡遇合於玄宗時的柄政舉措，如何輔佐玄宗續寫「開元之治」。

第一節 詔敕輔政，股肱盛唐

《史記·佞幸傳》開篇有言：「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¹可謂，對於致身官達之人而言，努力固是必然，然而機運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唐朝開元良相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新唐書·張九齡傳》述其：「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²張九齡自幼聰敏，善屬文，於是年未志學，即以文采見賞。而張九齡出身嶺南，雖非貴胄，然生逢武曌移國垂統之用心，遂行文詞科考取才之制，使他得以嶺南邊鄙之出身，於武周長安 2 年進士及第，年 25。³時隔五年，於唐中宗景龍元年，授祕書省校書郎。此後，張九齡遇玄宗治世，歷官拜相，至於貶卒。可說，文采與機運相倚，成就

¹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2010），頁 1332。

²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4。

³ 張九齡究竟是否於長安 2 年進士及第？針對此，熊飛在〈張九齡研究相關史料甄辨〉一文，有所縝密地討論。熊飛先是考察了《舊唐書》、《新唐書》及〈九齡碑〉所載，認為〈九齡碑〉所言「鄉試進士」與新、舊《唐書》的「登進士第」或「擢進士」並非一事。根據《撫言》，「弱冠鄉試進士」實應為「貢士」，對於唐世時人而言，「貢士」指獲得進士考試的資格，此與進士及第截然不同。至於「長安 2 年進士及第」一事，則確為中了進士舉，然而熊飛先生認為此「進士及第」，經由考察《唐會要》、《文獻通考》及新、舊《唐書》所書，應當可再甄辨處為，是進士科的「重試」還是「材堪經邦科」，不過，由於《舊唐書》及《新唐書》只各載一事，因而張九齡進士及第究竟為何科，則不得而知。參見熊飛：〈張九齡研究相關史料甄辨〉，《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1 期(2014 年)，頁 8-9。

了張九齡履登盛唐的相位，而縱觀他仕宦生涯裡的高峰與低谷，實與玄宗朝之任事，密切相關。

一、致君堯舜：諫諍時弊，勸君郊祀

盛唐詩人杜甫於唐玄宗天寶七年，寫下〈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中言及：「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⁴詩人透過詩句一以陳述了自己的才能和抱負，另一面亦傾吐了任途失意、生活潦倒的苦況。杜甫既以此詩抒憤，更在於抨擊天寶年間人才未能見用之現實的黑暗。

張九齡與杜甫，二人年紀相距 30 有 4，其一生卻先後蹈履玄宗治世之熒煌，而此二人皆懷「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入世抱負，唯其不同之處在於，張九齡因時乘運，得以輔佐玄宗續寫「開元之治」，而有別於杜甫所身處的天寶年間，盛唐氣象如強弩之末，遭遇仕宦艱難的沉鬱頓挫。

然則，士遇與否，看似可以機運一語籠統概括，倘從張九齡與杜甫分處的開元、天寶治世來細察玄宗朝的政治環境，實則士人的仕宦際遇誠與其所身處的君權柄政理念與統治舉措密切相關。

（一）諫諍時弊

開元三年，張九齡時任左拾遺，以職守諷諫呈〈上封事書〉，⁵向玄宗陳述一

⁴ (清)彭定求等奉敕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2252。

⁵ 中唐白居易亦曾任左拾遺，其有言：「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

己擢才用人的意見。其書言：

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眾，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⁶

張九齡認為，君上「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須由重視鄉里州郡的地方人事著手，並且明言首在縣令、刺史之選任。他以「東海殺孝婦」之說引喻，唯有「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才可免除天道速還之理。⁷而張九齡為何從地方人事的擇才任用來上書玄宗？他已然注意到，士人任官，以中央京職為首選，泰半輕於縣令、刺史此等州縣官職，更何況不少京官出為州縣刺史、縣令者，多在於己身有過，心態近類斥逐。

又如錢穆先生在〈唐代地方政府〉所論及者：「唐代中央政府組織似較漢代進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論，則唐似不如漢。唐代已漸漸進到中央集權的地步，逐漸內重外輕。中央大臣，比較漢朝要更像樣些，但地方長官則較漢為差」。⁸所以，朝廷卿士為了留任京闕，往往「私為之計，人情附會」，在張九齡看來，「人情進取，豈忘於私」，因而〈上封事書〉，其內有言：

蓋氓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

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又說：「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參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66《白居易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 4341。

⁶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46。

⁷ 同上註，頁 846。

⁸ 錢穆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2011)，頁 50-51。

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⁹

如是，如何鞏固國家之本務，為君王、氓庶謀國家之利，張九齡認為莫若「智慧之人」，而此智慧之人，又繫於刺史、縣令。所以，他說道：

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¹⁰

可說，張九齡有意改革以往朝廷用才「重視中央，輕忽地方」的舊習，並且嘗試藉由重視刺史、縣令的地方人事任命，來擬定一套「鞏固地方以強化中央」的人事任命政策。

又從其內容來說，由刺史、縣令分別作為士人未來能否升遷為侍郎、列卿或臺、郎、給、舍的門檻，亦即基層的實際經驗為先，再考其德政、聲威，經過吏部考核，逐步提拔。此外，任命官吏還要採取輪調制度，京官與外官要定期輪換，如此「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¹¹

再來，簡拔賢能之才的權責隸屬吏部，而賢良幹才能否受到舉薦晉用，此又關乎吏部考核官員本身的操守是否持正，所以說：

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

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47。

¹⁰ 同上註，頁 847。

¹¹ 同上註，頁 848。

委，豈復不能知人？¹²

同時，在簡擇官吏人選時，應層層把關，選上合格之人再向上一級推舉。其言：

今若刺史、縣令精核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眾，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¹³

張九齡於〈上封事書〉直言，一個政權的興旺，繫於人治。而〈上封事書〉起筆即把當時黎庶遭逢的水旱之災，結合朝廷「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的角度，向玄宗析論開元之世的任官制度，並大膽地提出改革方法，引起人君的關注。尤其此改革方法，極言革除時弊，簡拔賢能，務請將智能之才適度、適時的由中央遍置於地方，如此國家政務才能忠實而有效地推展施行。

而張九齡上書後，是否果真聳動人主，影響了朝廷官員的銓敘？此事可以《資治通鑑》所載參佐：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于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願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從願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¹⁴

¹² 同上註，頁 848。

¹³ 同上註，頁 849。

¹⁴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122，(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00。

上述之事，載於《資治通鑒》開元四年五月，文未署名奏請者誰，因而不知是否為張九齡，但從《資治通鑒》載此事所述來看，實與張九齡〈上封事書〉的內容及主張一致，又張九齡時任左拾遺，謹守言官職責，或可推測張九齡於開元三年進呈〈上封事書〉，其以近臣之位的奏請之言已然影響了玄宗任用官吏的舉措。¹⁵

(二)勸君郊祀

李唐王朝在武周政權結束後，由玄宗李隆基手上，恢復隆盛，他於先天二年改年號為開元，開啟盛唐治世。而開元 11 年至 23 年間，張九齡奉撰《南郊赦書》、《東封赦書》、《后土赦書》、《籍田赦書》四道詔書。其先在於，玄宗即位卻未行郊祀之禮，張九齡曾上疏建言，而此四道奉撰赦書可見張九齡勤於王事的用心。《舊唐書》言：「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伏以天才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¹⁶而《新唐書》也載：「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¹⁷可說，張九齡力陳君主行親郊之禮，在於親郊之禮是確立君主受命於天的重要儀式，而天子的身分則藉此體現。所以，在〈南郊赦書〉裡有言：

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
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

¹⁵ 賴瑞和在《唐代中層文官》指出：「拾遺和補闕是唐代兩種職務相同的官職，都屬諫諍之官和皇帝侍臣。主要分別在官品：拾遺從八品上，補闕從七品上。這兩種官都屬京官，分隸於中書省和門下省。在中書省的稱為右拾遺和右補闕，在門下省的則稱為左拾遺和左補闕。兩官的品秩都不高，但卻都屬於尊貴的『供奉官』，須參加早朝，和一般七、八品的官很不一樣」。此外，「遺、補不但『掌供奉諷諫』，並且還『扈從乘輿』，確實是皇帝的近臣」。參見賴瑞和著：《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112-114。

¹⁶（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3097。

¹⁷（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4。

下。¹⁸

君主行郊禮，福澤廣被在於大赦天下，不過「其十惡死罪、造偽頭首、劫賊殺財主，在不赦例」。¹⁹此外，〈南郊赦書〉除了赦免種種刑罰罪犯之外，亦分從內外文武官員、親王公主及各級宮人依其等第賜勳獎賞，即如「緣大禮有執掌，及京兆府百姓，緣南郊祇應者，各免其家一年雜科差」。²⁰書末言：

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群公舊勳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²¹

玄宗行南郊禮兩年後，開元 13 年東封泰山，在張九齡所擬詔〈東封赦書〉內明言東封泰山之由：

今九有大寧，群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大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悟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初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

²²

百姓安居樂業，戎狄不犯，國朝內外安泰，顯現著玄宗朝的開元治世，足以東封泰山的國力與必然。在〈東封赦書〉裡，提及開元治世因有「非常之惠澤」而東封泰山，也由於此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而此回大赦內容較之〈南郊赦書〉，對於諸藩侯王酋長的賞賜多所著墨：

¹⁸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23-424。

¹⁹ 同上註，頁 424。

²⁰ 同上註，頁 424。

²¹ 同上註，頁 425。

²² 同上註，頁 433。

諸蕃侯王酋長來會禮者，各加一官。至都節級，并與賜物；其入朝留在邊軍人，亦準此。……。突厥可汗小殺等諸國王，守護塞垣，歲月朝貢，并宜賜物，付使將往。²³

至於《后土赦書》，則可見承繼著《南郊赦書》和《東封赦書》循以春秋大義而行祀禮的王道敘述裡，以其大赦封賞，勝乎前昔，大展玄宗朝開元之世臻於鼎盛的雄壯，尤其此番封賞，不僅上至朝廷重臣裴光庭、蕭嵩，下及州、郡、縣等基層官員，亦延及唐高祖李淵世之功臣子孫等，諸如邊將、武勇、幕士和戰亡人家皆有所賞。

張九齡於開元 20 年奉撰《后土赦書》，〈徐碑〉記此事：

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對御為文，凡十三紙，初無稿草。上曰：「比以卿為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²⁴

玄宗讚張九齡有「王佐之才」，「當以經術濟朕」，在〈籍田赦書〉裡，張九齡以農事將起，勸課農桑為旨，從務農所需之人力募取、資金籌募、蠶麥贖納等皆有所留心用意，較之先前郊祀、封禪赦書的大行封賞，〈籍田赦書〉力主不誤農時，以固國之本，可謂多得王言之體：

今嗣歲初吉，農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粢盛。是所嚴祇，敢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謂敦本之為大，可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偏于行惠。……。農桑是時，不得妨奪，

²³ 同上註，頁 435。

²⁴ 顧建國著：《張九齡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184。

州縣長官，倍加勸課。²⁵

總此可見，玄宗行郊祀、封禪和籍田之禮，不僅止於向廣大臣民體現君主的「天子」身分，在一回回循以春秋大義而施行的典禮中，從詔書所赦免刑罰與獎優撫卹的內容來看，不啻為李隆基即位為唐玄宗後，經由舉行大禮，再將儀式塑造為一個向國家展現君主威儀、塑造國家秩序的權力舞臺。朱溢說道：

到了唐宋時期，皇帝親郊在這一功能之外，還用來調整人與人的關係，更多的世俗因素融入近來，使其成為塑造國家秩序的重要舞臺。中央與地方、君主與臣民的權力秩序。²⁶

再說，皇帝郊祀親祭，是國家盛事，而在禮儀的籌辦過程裡，牽涉著廣大的人力部署與物資調度，國家若非隆盛之世，是無法負擔如此耗資巨大的開銷。因而，張九齡上疏勸君行郊祀、封禪之禮，無非懷著「致君堯舜」的抱負，期使玄宗堪當一代聖主明君。

二、言事議政：循名責實，經術濟世

敕書是張九齡在詩歌創作之外，數量最多的文學書寫。所謂敕書，是皇帝用以諭告慰勉公卿、警戒約束眾臣的文書。它既是文學書寫，卻非純然按照主筆者意識的文學創作，而是代擬王言者在揣摩上意的政治語境內所作的詮釋與書寫，在《文心雕龍·詔策》即言：「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宸，而響盈四表，

²⁵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52-453。

²⁶ 朱溢：〈唐至北宋時期的皇帝親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4期，(2010年11月)，頁18。

其唯詔策乎」！而「敕者，正也」，²⁷可知，「敕書」即是「王言之體」，而此「王言之體」用以發揮君權柄政的功能在於：

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普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²⁸

因此，從〈詔策〉所述，敕書的代擬者，要能出納帝命，除應具備較高的知識素養和援筆立成的文采外，還必須充分領會皇帝旨意，熟悉治國理政方略的本領。而張九齡為何堪當王言之體的代擬者？

先是他在玄宗朝自任左拾遺起，先後擔任了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知制誥，專門負責起草詔令的官職，並且參與朝廷機要，成為了玄宗身邊的秘書長達5年，此後他又擔任了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和中書令，如此貼近君王柄政的機要地位，又以文采見賞而成為玄宗的文翰，²⁹在《開元天寶遺事·文帥》有載，唐玄宗常謂侍臣言：「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足證。³⁰

²⁷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371。

²⁸ 同上註，頁372-373。

²⁹ 根據賴瑞和的研究指出，在唐世能勝任遺、補官者，在於文翰詞采。賴氏說道：「《唐六典》、《通典》和兩《舊唐》職官志都沒有提到遺、補任官的條件。不過，我們在列傳等材料中爬梳，可以發現哪一些人最有可能出任遺、補，以及哪一些人不適合出任遺、補。最有可能出任遺、補者，是那些『文詞優美者』。……這就是為甚麼唐代三十五位主要詩人當中，有好幾位曾經出任過拾遺：陳子昂、張九齡、王維、杜甫、元稹、白居易；也有好幾位充當過補闕：張說、張九齡、王維、岑參、杜牧和韋莊」。參見賴瑞和著：《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127。

³⁰ 王仁裕撰：《開元天寶遺事·文帥》卷下(臺灣：藝文印書館，1966)，頁11。

在《張九齡集校注》裡，所收錄之敕書有 121 篇。³¹此 121 篇敕書從內容索察可粗分為治國內政與理疆邊務二類，又從敕書完成的時間集中在開元 12 年至 22 年之間，可說關注敕書的內容與敘述形式，既能窺探出唐玄宗開元朝的治國理政方略亦可觀察張九齡公文書寫的藝術特徵。

(一)循名責實

張九齡於開元 12 年任中書舍人迄至開元 22 年為宰輔間，寫就了 29 篇基於治國內政需求的敕書，其中〈敕處分十道朝集使〉即有四篇。第一篇寫於開元 12 年，該篇首言：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與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³²

文章從君主勵精圖治的用心良苦立意，提出群臣當今為政之要，其後從「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強調為官者身當力行的重要。文中頗值得關注之語在於：

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³³

³¹ 顧建國於其博士論文《張九齡研究》述及張九齡文之篇目與分類：「張九齡的各類文章，現存 261 篇。從功能特徵上看，可分為公文(書詔文誥等)和其他類散文兩大類。公文 213 篇，其中，敕書 126 篇，表狀 70 篇，策書、疏奏 12 篇，駁議 1 篇，頌讚并序 4 篇。其他類散文 48 篇，其中，序文 15 篇，書信 2 篇，賦并序 2 篇，祭文 9 篇，墓志、碑銘 20 篇」。由於顧建國之研究所本為《曲江集》，且與溫校本互參，而本文則取材自熊飛校注的《張九齡集校注》，因而敕書篇目數有所差異。參見顧建國著：《張九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52。

³²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67。

³³ 同上註，頁 467。

若將此段文字與開元 3 年的〈上封事書〉對讀，³⁴可知張九齡及早地便意識到，治國理政的弊端與改革首在於地方官員的人事任用與考核，如此在開元 12 年的〈敕處分十道朝集使〉內文裡，亦顯見此一脈絡。

緣此撰文脈絡之所關注者，在於州郡官吏是否盡其牧民本分，確實執行君主治國的方略，而中央柄政者則據此考核以為升遷，順此立意續見於另外三篇〈敕處分十道朝集使〉，此三道敕書撰於開元 21 年，張九齡時任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知制誥。第二篇言：

朕臨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群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底於道。……。
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憂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
且一郡之政，繫一己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³⁵

篇旨依然在君王勵精圖治的立意中闡明，尤著意於一郡長官必須自律和作為表率之要，並且期勉各州長官應為君分憂。篇末言：「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理行是憑」。³⁶至於第三篇敕書布達於開元 21 年 4 月 1 日，與前篇所撰相距不出一個月，³⁷其內言：

朕所以數戒敕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升，理道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來朝而輒遷，參佐逾年而競入，此

³⁴ 張九齡〈上封事書〉有言：「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參見(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46。

³⁵ 同上註，頁 470-471。

³⁶ 同上註，頁 471。

³⁷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首篇撰於開元 12 年 3 月，次篇撰於開元 21 年閏 3 月 1 日前，第三篇布達於開元 21 年 4 月 1 日，可見張九齡第三篇約撰於 4 月前。參見(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69-479。

獨為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³⁸

此三篇〈敕處分十道朝集使〉皆可見力勉州郡官吏，務須用心治理所屬以為君分憂，為黎庶謀福的殷切，即如張九齡在第四篇敕書所言：「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為政者，防於未然」。³⁹唯有各郡縣妥切的治理，才能使百姓成為富國之基，而國朝無患。

綜觀上述四篇敕書，篇幅均長，約在 350 至 500 字之間，又敕書內容皆在闡明治國為政理念在於勸農重桑，禮儀教化等，然而張九齡以此篇幅所含涉的治國方略卻非浮泛、誇誕的政令宣導，而是綱舉目張，有所深化。第一，他在四篇敕書起首，能以簡要之筆言君主承天景命，勵精圖治的大義，承此訓示各道朝集使理政之要，並且具體的說明時政所面臨的幾項重要問題，如第一篇裡浮逃人口的管理與應對之策，第二篇中的水旱之災如何撫卹百姓，第三篇內再次申明浮逃人口造成民生與社會的弊病，務須詳加明察，第四篇的國遇甘澤之時，諸道務先農桑。

可說，藉由此類敕書，朝廷一以向各道郡縣官吏揭示民生禍福之所趨，次則展現朝廷中央掌握時政的確當，據此，張九齡常於敕書內筆鋒一轉，究論時政之際，綜論當時官僚風氣與官員理政時因循苟且的心態。張九齡仕宦於玄宗朝，自應制科考擢用，在唐世的文官系統裡歷練完整，對於把握各色人等的為官動機和目的十分精當，因而能於〈敕處分十道朝集使〉裡，緊扣人事銓敘，循名責實，申飭再三。

再如開元 24 年的〈敕處分縣令〉：

³⁸ 同上註，頁 474。

³⁹ 同上註，頁 477。

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縱近而廢。固己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為棄地。⁴⁰

張九齡於此書懇切直言，朝廷所重唯在幹才，非以命官距朝闕之遠近，來度繫其官位之升廢，用此番經術濟世，張九齡更有言：「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⁴¹

原先，張九齡奏請玄宗復置十道採訪使，目的即在於加強朝廷對地方的治理與控制：

採訪處置使宰相張九齡奏置。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以御史中丞盧絢等為之。⁴²

上言可見《唐會要》所載，而兩《唐書》本傳先後亦載：「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⁴³「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⁴⁴在〈敕置十道(採訪)使〉裡，張九齡寫道：

歲比不登，人貨流冗；……。而牧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為本，賦斂未均，當寧思之，良所於邑。且十連為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⁴⁵

⁴⁰ 同上註，頁 494-495。

⁴¹ 同上註，頁 495。

⁴² (宋)王溥撰：《唐會要》，(臺北：世界書局，1963)，頁 1420。

⁴³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3099-3100。

⁴⁴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4428。

⁴⁵ 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88。

社會民生關乎國家的安定，若社會動盪，百姓不得安養，則國家人口管理與稅賦徵收將出現重大危機，而張九齡之所奏請復置十道採訪使的用心即在此：

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⁴⁶

因而藉此敕書對盧綸等人殷切直言：

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珪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殷懷？吏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仗賢。⁴⁷

總此可見，隨著己身官位高步雲衢，張九齡就其任宦歷程裡的察聞，認為國富民強必從朝廷命官的簡任與官僚沉痾風氣著手改革起，如此思考非為個人結黨營私，乃是輔君佐政，惓款為國，厚實開元盛世的基礎。⁴⁸

⁴⁶ 同上註，頁 490。

⁴⁷ 同上註，頁 490。

⁴⁸ 由兩《唐書·張九齡傳》同載之張說濫用公器私封所親者，張九齡直言勸諫一事，可見張九齡為官性格的忠厚良篤，剛正不阿。《舊唐書·張九齡傳》：「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霽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參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098。又《新唐書·張九齡傳》：「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參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7。

(二) 經術濟世

由〈敕處分十道朝集使〉等類敕書，呈現了張九齡著力簡任官吏制度的人事審查與升遷考核的政治思考，而此政治思考的目的，無不關乎著輔君佐政所需的理政幹才與濟世經術。

而張九齡以一介文官，不僅在經略人事卓有見地之外，亦曾奏議玄宗開放民間私鑄貨幣，表達改革國家財政的立場，此事可見《資治通鑑》開元 22 年所載：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⁴⁹

由於開放民間私鑄貨幣事關至大，玄宗要求張九齡先行擬詔後由百官詳議。而從〈敕議放私鑄錢〉內容考察，可以窺探出張九齡不禁私鑄貨幣的理由與主張有三：其一，「頃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卻以少而致貴」，通貨、物資二者間供需不等，且貨幣價值高過交易物本身，物賤則傷民；其二，「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官鑄通貨，耗利甚重，且貨幣流通的數量不敷使用；其三，「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開放民間私鑄貨幣已於漢文帝之世可鑑。⁵⁰

當〈敕議放私鑄錢〉敕詔一出，公卿百僚果真詳議可否：

裴耀卿等皆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

⁴⁹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3。

⁵⁰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99-500。

而難誣。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
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上乃止。⁵¹

上述三者所駁議處在於，開放私鑄貨幣後，百姓將棄農逐利而尤有甚者，又且錢幣既是通貨，貴在流通而不在量多以致足用，再者，即使開放民間私鑄貨幣，也只有富者力可得之，如此一來將造成社會更大的貧富差距，於是富者因利逞欲而貧者因弊不得翻身。

將裴耀卿、崔沔、劉秩三人的說法與〈敕議放私鑄錢〉內容對照，可說前者一是答覆了通貨給用不贍的疑慮，實是自然成理，無庸置疑，二則從民生安定與君王柄政的立場反對開放民間私鑄貨幣的政策，其就民生安定而言，開放私鑄貨幣將可見百姓棄農逐利，這有違玄宗朝勸農重桑的國政朝綱，再就君王柄政的立場而論，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以「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之史實駁議，可說一語中的，直指開放私鑄貨幣後對於玄宗君權柄政渙散的隱憂。管仲有言：

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于饑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⁵²

可說鑄錢立幣本是君主專權，再說有唐一世私放鑄錢並非首遭，見《舊唐書·食貨志》所載，唐高宗儀鳳年間及武周則天長安年中，即曾開放民間私鑄貨幣，然

⁵¹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臺北：世界書局，2012)，頁。

⁵² (唐)杜佑著，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訂，韓昇譯訂：《通典》卷八〈食貨八·錢幣〉，(上海：上海人民，2008)，頁 86。

而此二回放私鑄錢的影響是，「盜鑄蜂起，濫惡益眾。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蹟罕到，州縣莫能禁約」。⁵³雖則當時私放鑄錢之背景與緣由已與玄宗朝開元治世不同，⁵⁴然而漢世、初唐般鑑不遠，加以公卿百僚力駁，玄宗遂止張九齡所奏，實是必然。不過時任宰輔的張九齡，勢必已察見開元治世國家財政紛亂徵兆之微，因而以「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足用」的變通立場為之謀策而奏請擬詔，亦可見其獨排眾議的膽識。

三、時濟實用：要言不煩，宏博典實

占據張九齡的仕宦文學書寫篇幅最多者，即在其個人任於玄宗朝期間，因公務需求所撰的詔告敕書，又從其敕書內容索察，可粗分為治國內政與理疆邊務二類。治國內政與理疆邊務，一以治內，一以理外，皆是觀察唐玄宗開元治世君權柄政之一體二面。此二面向分述安內、攘外，其中張九齡本於治國內政而寫的敕書計 29 篇。⁵⁵以下將援此據以觀察張九齡公文書寫的藝術特徵之一面向。

綜觀此 29 篇敕書，從體式上看，語句大都還是四六言，雖仍未脫駢文的行文格式，但從行文內容而論，則已非專以用典隸事為能的駢儷文。例如，〈敕皇太子納妃〉：

⁵³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096。

⁵⁴ 此一問題可參考吳宏哲所論。參見吳宏哲：《論君相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張九齡罷相為例》，(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5)，頁 51-53。

⁵⁵ 此 29 篇目分別為，〈南郊赦書〉、〈東封赦書〉、〈后土赦書〉、〈籍田赦書〉、〈敕皇太子納妃〉、〈敕處分十道朝集使〉、〈敕處分十道朝集使〉、〈敕處分朝集使〉、〈敕處分十道朝集使〉、〈敕歲初處分〉、〈敕令禮部掌貢人〉、〈敕幸西京〉、〈敕置十道(採訪)使〉、〈敕授十道(採訪)使〉、〈敕停官寄贈太子〉、〈敕處分縣令〉、〈敕處分縣令〉、〈敕處分選人〉、〈敕議放私鑄錢〉、〈敕處分宴朔方將士〉、〈敕宴幽州老人〉、〈敕慮囚〉、〈斥擇日告廟〉、〈籍田之制〉、〈諸王實封制〉、〈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廢王皇后制〉、〈停燕國(公張說)中書令制〉、〈敕處分舉人〉。參見(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23-519。

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庶姻媾，且猶正於人倫；況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眾之澤。⁵⁶

又如〈敕處分十道朝集使〉四篇各內言為例：「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朕臨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群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底於道」。「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逃者未必為削，為奸者因此便除」。⁵⁷

簡宗梧在《賦與駢文》述及駢文形成的形式要件為「整」「儷」「諧」。此三要素具體而言為：

語句方面要駢偶平行，多四六相用；用詞方面要鎔裁典故，經營麗辭；語音方面要異音相從，平仄相對。⁵⁸

然則，此三要件中之語句平行，句法結構相互對稱雖是駢文最基本的特徵，但非駢文之為獨特文類的主要特徵，而在於多用四六語式及經營麗辭、鎔裁典故，以為駢儷體的重要關鍵。是以由此觀察張九齡此 29 篇敕書，張九齡確實在行文的語句上，多用四六語式，再者以張九齡博學經史，浸濡詩書，他在詞語經營上，遣詞用字亦多見聖賢經傳。不過，敕書內值得關注處卻非張九齡以四六句式的駢文以為公文書寫的體式，更在於敕書內所表達的思想內容。

⁵⁶ 同上註，頁 463。

⁵⁷ 同上註，頁 467-478。

⁵⁸ 簡宗梧著：《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頁 21。

張九齡身值唐興之世，初唐文風上承六朝、隋之遺緒，因而在詔告敕書內仍以四六句式的駢文行文，然隨著唐世歷經太宗、武周、中宗和玄宗時代的經營發展，國勢強大，經濟繁榮，唐世文風亦隨世遞嬗，趨向寬博宏大的精神，簡宗梧說道：

唐玄宗崇尚經術，雖好文詞但稍厭雕琢，文人乃順應時代精神，以散行之氣運偶儷之辭，言語顯得明朗通暢、自然清新，……。駢文也開始從形式華美的追求轉為體國經野的應用。⁵⁹

因此，衡之張九齡的詔告敕書，四六行文的體式儘管保留著初、盛唐文風的過渡特徵，但是他在行文中，已擺脫了駢文采麗競繁的頹靡之風，可說是以駢體運散筆，並且直陳政事，切事中理以體國經野，陳先明在〈張九齡文學思想研究〉一文亦指出：「張九齡用大雅之聲來潤色鴻業的追求是非常自覺和鮮明的」。⁶⁰

在 29 篇言事議政的詔告敕書內，張九齡言及玄宗家事〈廢王皇后制〉、〈諸王實封制〉，論及人事制度〈敕置十道(採訪)使〉及〈敕處分十道朝集使〉，代擬廢斥朝廷命官〈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廷燕國(公張說)中書令制〉等，可見，詔告敕書絕非一般文人可由情志書寫的詞采把握，因此在撰寫時如何斟酌語氣，掌握下筆口吻的分寸，異常嚴謹，絕非泛泛文官輩者所可勝任。即如紀昀所言：

九齡守正疾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大雅之遺。⁶¹

⁵⁹ 同上註，頁 197。

⁶⁰ 陳先明：〈張九齡文學思想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29 卷第 2 期，(2008 年 2 月)，頁 16。

⁶¹ (清)永瑤、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臺北：臺灣商務，1983)，頁。

張九齡以駢文體式代擬王言，其敕書去典麗繁重，以博大典雅、舒卷自然之氣言事議政，紀昀以「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評讚張九齡之文，可謂精當真切。

第二節 代擬王言，識見邊功

自有唐一世，初有太宗李世民為大唐王朝之隆盛奠基，被上尊為天可汗，直迄玄宗朝，以開元治世致唐朝國力於鼎盛，此中之關鍵，除以文治，更由於武功。因此，身為人主以一代明君自期，除了安內，更在於統理邊疆事務的關注與態度。而君王如何統理邊疆事務，即表述著君權如何行使於邊疆異族，以擴張國家的版圖或維繫國朝的和平，並且藉由國家版圖空間的擴張，而彰顯為君權範疇的鞏固與拓展，於是，當諸侯來朝天子的君臣關係得到建立與穩固，即有大唐之世諸胡上尊李世民、李隆基為天可汗的地位。⁶²

綜觀張九齡代玄宗擬詔的敕書公文書寫，以理疆邊務的篇幅所占最多。在《張九齡集校注》裡，理疆邊務者以 92 篇，倍多於曲江公本乎治國內政而寫的敕書 29 篇。又從敕書完成的時間，集中在開元 18 年至 24 年之間，可說關注此類敕書的內容與敘述形式，一以窺探出，唐玄宗開元朝統理邊疆事務的方略，亦以觀察張九齡公文書寫的藝術特徵，以下將援此，據以觀察張九齡公文書寫的另一面向。

⁶² 朱振宏撰文針對唐朝「皇帝·天可汗」一詞釋義，進而討論此一稱號所代表的特殊性質，並且附表羅列有唐一世，諸胡上尊天可汗之號的皇帝名冊。參見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釋義〉，《漢學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2003 年 6 月)，頁 413-433。

一、謀戰遣兵：以文兼史，補史之闕

開元 18 年至 24 年之間，張九齡代唐玄宗所擬的敕書，密集而詳細的綜理了唐與邊疆異族的戰爭、議和及蠻幫降順之史實。假以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的內文所示，⁶³就所臚列之篇目觀察，時張九齡代擬詔書所下行的對象有：藩鎮節度使、蠻幫首領或國王、唐軍將領及金城公主四大類。又以敕書所往來的蠻幫異族而言，有新羅、契丹、渤海、突厥、吐蕃、護密、識匿、勃律、罽賓、日本、西南蠻及安南。

可說，開元 18 年至 24 年之間，玄宗世的唐朝疆域可謂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其根據了黃河流域的中心而收攏了亞洲大陸絕大半的地理版圖，而基於國朝疆域與多元而異質的族群接壤，大唐天子的威勢欲能王霸異邦，必須倚重各鎮節度使及將領的軍備防守，是以可見詔書多向安西、河東、幽州及河西節度使而發。

開元 23 年至 24 年，張九齡時任中書令，密集的擬詔〈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等書〉數道，此事肇因於突騎施蘇祿侵犯安西及北庭，直接威脅了唐朝的國家政權和安全：

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於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⁶⁴

又見〈敕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書〉內言：

突騎施凶逆，犯我邊陲，自夏已來，圍逼疏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遍城。

⁶³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521-693。

⁶⁴ 同上註，頁 599。

張義之等人據此城，屢與之鬥，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⁶⁵

在唐朝與突騎施蘇祿之間的戰爭，唐朝參戰的將領為安西四鎮節度使王斛斯及翰海軍使北庭督護蓋嘉運等人，而玄宗朝面對施蘇祿的侵犯與威脅，可說傾力募兵調度以援助前線戰事：

蘇祿忘我大惠，敢作寇仇，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敕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⁶⁶

就在張九齡所代擬的詔書內，詳述突騎施蘇祿來犯而玄宗朝如何調兵遣將，麾軍滅虜，策勵前線戰士等，對照同一時間《舊唐書》裡〈玄宗本紀〉所載：「冬十月辛亥，移隸伊西、北庭都護屬四鎮節度。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二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獻方物。北庭都護蓋嘉運率兵擊突騎施，破之」。⁶⁷又《資治通鑑》開元二十四年載：「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⁶⁸可說，正史僅以編年簡略的形式，一筆言及突騎施蘇祿逆犯的史實，正對比出張九齡所代擬的詔書〈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等書〉及〈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等，詳盡且敏瞻的敘述此一戰爭的起因及玄宗應戰的方略而達致以文兼史，補史之闕的寫作價值。

又且唐朝與突騎施蘇祿之間的戰爭達三年之久，由解讀〈敕安西四鎮節度副

⁶⁵ 同上註，頁 612。

⁶⁶ 同上註，頁 616。

⁶⁷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03。

⁶⁸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3。

大使王斛斯等書〉及〈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等敕書內文，可發現此一戰爭遠比兩《唐書》及《資治通鑑》所載來得複雜與重要，如〈敕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言：

突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只長寇仇。自夏及今，連營不散，疏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為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⁶⁹

承此，敕書內文亦有前線將領欲聯絡大食以制突騎施的計畫：

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回。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且突騎施負恩，為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讎，錄其遠勞，即合優賞。

70

因此，從這些敕書中，不僅揭露了突騎施蘇祿侵犯唐朝安西、北庭的過程，一方面也說明，唐朝如何針對突騎施蘇祿的犯邊有何因應。首先，就軍事上而言，敕書明確的指示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北庭經略使蓋嘉運及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等人，互相支應，組織抗敵，並且授予前線將領軍權決斷的權力：

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所緣邊鎮要切，并委卿臨事籌之，可與嘉運審量，(勿)為彼此之計也。所

⁶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671。

⁷⁰ 同上註，頁 604。

緣兵募行賜，則令所由之遣，以別敕牛仙客訖。⁷¹

再者，外交手段上，唐朝透過與吐蕃和親聯姻，來分化突騎施蘇祿與吐蕃贊普的聯盟，如〈敕吐蕃贊普書〉內言：

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既是親好，即合同疾頑凶。何為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

72

所以張九齡有〈敕吐蕃贊普書〉七道及〈敕金城公主〉三封即出於從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來突破突騎施蘇祿藉由聯絡唐朝西南邊疆藩國以壯大勢力的用心。總此可見玄宗對於突騎施蘇祿來犯的軍事謀劃與政治對治之道。

開元 24 年突騎施遣其大臣來唐請和，但從〈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突騎施雖請和好，其意不真，近敕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遠著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事在臨時，固難遙斷。

73

可知，玄宗朝於突騎施蘇祿遣使求和後，對於邊疆防護仍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以嚴防突騎施臨時變意而有逆反之舉，甚至在突騎施以外的異族侵擾。而由此次突騎施圍犯安西、北庭的連年交戰裡，從〈敕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王斛斯等書〉為中心，而由張九齡所代擬的一連串詔敕書寫裡，除了一窺玄宗開元朝廷，對於識

⁷¹ 同上註，頁 616。

⁷² 同上註，頁 647。

⁷³ 同上註，頁 611。

見邊功所開展的軍事防備，與政治外交謀略如何運用與施行，業已見時任中書令的張九齡，如何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以文運籌，解國之難，確實盡到「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的職責。⁷⁴

二、王霸異邦：解訟息爭，分君之憂

開元 20 年，張九齡奉命改作〈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其時張九齡任官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而祕書省為一圖書經籍部門，監掌圖書整理分類與校刊收藏，擬詔非為職責所在，雖說張九齡身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以集賢院「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的政治特殊色彩，⁷⁵成為皇帝政務垂詢的對象，然而代玄宗擬詔仍屬中書執掌，為何玄宗命張九齡改作〈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徐碑〉載此事：

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⁷⁶

從此段文字的記述裡可知，之所以有〈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下詔，肇因於渤海(郡)王大武藝與玄宗朝之間的齟齬，而此道敕書原先由中書令裴光庭、蕭嵩所擬，但敕書行文未能切中玄宗心意，於是下令張九齡改作，而張九齡文思敏捷，改作之敕書深得君心，其亦由此受到玄宗賞識拔擢起草詔命的要職。

首先，渤海(郡)王大武藝與玄宗朝之間發生了什麼情事，使得玄宗十分的重

⁷⁴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210。

⁷⁵ 同上註，頁 1212。

⁷⁶ 顧建國著：《張九齡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 175。

視〈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此道詔書的用命：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內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⁷⁷

就《資治通鑑》開元 20 年所載，渤海(郡)王大武藝懷疑黑水靺鞨與唐通謀，而此結盟關係將會使渤海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於是打算派遣親弟門藝及其舅任雅發兵攻擊黑水。然而，此事之不成的轉折在於：

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國之勢也。」⁷⁸

大武藝同母弟門藝曾在唐為質子，期間目睹了唐王朝的強大與雄壯，因而就渤海國勢不足以與唐為敵，來勸其兄大武藝放棄攻唐之舉，否則渤海將亡國。而門藝之勸大武藝不從，門藝再次上書力諫，孰料大武藝震怒，竟遣其從兄大壹夏代其將兵，欲殺門藝。於是門藝奔唐來歸，埋下了渤海靺鞨大武藝與唐玄宗之間的衝突：

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雲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

⁷⁷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3，(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11-6821。

⁷⁸ 同上註，頁 6811-6821。

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⁷⁹

唐玄宗在處理門藝來歸的問題上，誠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所評析：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⁸⁰

以大唐天子之尊，而未能以君主威信，正面處理門藝來歸的問題，反以虛與委蛇的態度，推諉朝中督察官吏執掌失責，而遭受大武藝的指責。從司馬光的史評觀點而論，唐玄宗「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值此蒙羞。所以，門藝來歸一事，使得唐玄宗處於遭遇大武藝方責難的尷尬處境，其說：「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誑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依前殺却」。⁸¹因此，如何透過詔敕的頒布，達到不戰而能屈人之兵，不殺而能服眾之心，藉此彰顯君主威信，挽回大唐天子威儀，就顯得十分迫切，是以，玄宗在此頹勢的政治氛圍裡，命有文場大元帥之稱的張九齡改作〈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

張九齡代擬〈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有4篇，而首篇即為「上甚嘉焉」之作，其書內言：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鬪，門藝窮而歸

⁷⁹ 同上註，頁 6811-6821。

⁸⁰ 同上註，頁 6811-6821。

⁸¹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5361。

我，安得不從？……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⁸²

敕書開篇，即透過對大武藝的稱呼裡，一展大唐天子君臨天下訓示臣民的口吻，使大武藝清楚，自己身為唐屬藩國的身分與地位。接著，張九齡之筆鋒一轉，由門藝奔唐來歸的合情合理，一以帶出華夏之風，兄友弟悌的人倫常理，表明大唐以孝友治世的理念，用以迴避大武藝責難玄宗隱匿門藝蹤跡的處置。援此，書內即就骨肉情深，兄弟之間應有所不忍之心來著墨，有所發揮：

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為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併口具述。⁸³

更進一步的，張九齡藉由玄宗朝廷實是愛護大武藝的名聲來澄清、說明為何保護門藝來歸的原因，順此言及大武藝不知國恩，竟以此事歸咎於唐，因而期以此道敕書希冀大武藝悔過輸誠。

事實上，門藝來歸，之所以成為唐與渤海關係之間的導火線，遠因在於，大武藝於其父死後，亟欲獨立於唐，稱霸東北，然而鄰近之黑海靺鞨竟與唐交好，歸順大唐，此舉成了大武藝東北稱雄的阻礙。而渤海本是粟末靺鞨依附高麗之一族，後在大祚榮手上建國，其曾遣使交突厥，國力強盛，因此唐睿宗時，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統為忽汗州，而大武藝即在其父死後，

⁸²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579。

⁸³ 同上註，頁 597。

承繼王位，且迅速而卓有用心的擴張、鞏固渤海的東北勢力版圖。⁸⁴而由於黑海靺鞨的歸唐，加以門藝來歸，渤海與唐的關係交惡勢所必然，唯玄宗在門藝來歸一事上的處置，未能以大唐君主威勢光昭渤海，以致落人口實。

觀之〈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此篇全文，就援筆氣勢而言，張九齡一展玄宗朝泱泱大國的氣度，從落筆說理而論，全文先後以 6 個詰問，逐步糾謬大武藝上表請求殺死門藝的逆倫悖禮與執迷不悟，得見張九齡擬撰敕書之筆力雄健深厚，行文思路顯現對現實政治的敏銳細膩，而能為玄宗突破當時陷於大武藝詰難的困局，解訟息爭，分君之憂，挽回君顏。

以是開元 14 年，自黑海靺鞨遣使朝唐，渤海始以此與唐結怨，至開元 20 年仍有所圖，《舊唐書》載：「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刺史韋俊」，而玄宗朝則回擊以：「詔遣門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此舉使武藝「懷怨不已，密遣使至東都，假刺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門藝格之，不死」。⁸⁵在一來一往之間，究竟所為為何，孰是孰非？張九齡代擬詔敕，拋開這一連串事件裡的鬥氣糾葛，取而代之為大唐君子的雍容大度以訓示藩臣盡忠倫理：

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非復善，即又可嘉。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況又歸服載用嘉嘆。⁸⁶

由「記人之長，忘人之短」之語，示大唐待渤海，乃出於君臣間的從容大度，又如〈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第 4 篇：

⁸⁴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179-6180。

⁸⁵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5361。

⁸⁶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582。

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卿可知之，皆朕意也。⁸⁷

「棄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之語，可說在兵戎相見，大動干戈的沙場之外，朝闕之上，以寬宥的態度，向渤海展現大唐王朝真正的強盛與壯大，非專在軍事武力，更在於以德王天下的氣度，見出張九齡深得詔敕類公文書寫的個中三昧，一展而為理直氣壯，示人利害，義正辭達。

三、走章馳檄：樸實簡練，義正詞達

在識見邊功的詔敕書寫裡，張九齡執筆立言，解君之危，彰顯大唐國威，明玄宗以德行王霸異邦，其手筆確如清人溫汝適所評的：「明暢得體，雖桀驁者聞之亦知朝廷有人」，又說：「公以輕縑素練之文，為走章馳檄之用，義正辭達，切中事情」。⁸⁸由溫汝適之評，指出張九齡詔敕公文書寫藝術特徵的另一面向，在於「明暢得體」、「義正詞達」，所以切中事件核心，言所當言，而無損君顏，鷹揚國威。是以張九齡亦由代擬詔敕，一朝獲玄宗進一步賞識其過人的才幹，使玄宗認為其「識茂而遠」，能「澄清萬里，樹聲于萬國」。

此外，在張九齡處理邊疆事務類的詔告敕書上，還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敕書的行文由駢趨散的程度，又邁進一步，尤其在遣詞造句上，有著更多口語化的表現，這在張九齡此前的公文中是比較少見的，除了〈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4

⁸⁷ 同上註，頁 584-585。

⁸⁸ (清)溫汝適《曲江集考證》卷上，《四部從刊續編》本。

篇可見此變化外，又如〈敕突厥可汗書〉：

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雲蘇農賀勒、處羅達幹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⁸⁹

或見〈敕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勳，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突干狡算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起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⁹⁰

句句可見張九齡在敕文的撰制上，筆隨意走，運用了較多的散筆言事議理，並且在行文語氣裡，展現著玄宗以賢主明君的口吻綏撫臣民，成為張九齡詔敕書寫的文學風格之一面向。

若再看〈敕突騎施毗伽可汗書〉一文，張九齡詔敕書寫的文學藝術，更見清晰。本篇敕書內容長達 800 多字，但由於用字遣詞精當，讀之無有冗長之感，反而由於措辭的簡練勁健而使文意生動多姿，試看該文之起筆：

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是我有大惠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⁹¹

⁸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645。

⁹⁰ 同上註，頁 623。

⁹¹ 同上註，頁 635-636。

本文申敕對象為開元 23 年前來求和的突騎施毗伽可汗，敕書首句以義正詞嚴的口吻開篇，可謂震人耳目，其後遍數毗伽可汗見利忘義之過：

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而迺無義為讎，暴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⁹²

文中多以四、五言的短句交錯行文，由於句式簡練，使得語氣明快剛勁，加以運用「而」字連接前後文，使得行文語氣舒緩有致，張九齡即藉此口氣表達大唐對突騎施毗伽可汗求和一事之立場與態度，所以文末有言：

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為。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舊，朕即棄舍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⁹³

一道篇幅字數近乎千言的詔敕，在堅定不移的口吻中，既要以詞采明示君主的治國柄政方略，又要以理直懾服見利即生心的藩屬異邦，首要之務即在於遣詞用字的樸實簡練，義正詞達。

⁹² 同上註，頁 636。

⁹³ 同上註，頁 637。

第三章 美刺君王的表狀書寫

本章將從張九齡任事於玄宗朝所書寫的表狀，論述張九齡仕宦書寫所承載的面向，此其一；再者，熊飛於其所校注之張九齡表狀中，并唐玄宗之御批篇者甚多，透過考察這些附錄御批的表狀，更可以細緻地解讀出張九齡仕於玄宗朝時，君臣柄政的理念以及君臣如何對話的面向，以釐探出張九齡遇合唐玄宗的君臣關係及其關係變化的線索。

第一節 君臣相偕，御批優答

有別於代擬王言的詔告書寫，乃假以站在君主治國的高度，近身君側揣摩帝王柄政心意而寫下申敕臣民的下行公文，表狀則是朝臣上呈君王的奏章，〈文心雕龍·章表〉說：「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又說：「言事於主，皆稱上書。」言明表之公文體類，¹其所書寫及應對的對象為臣下對君上，「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²雖說章表乃朝臣面君的上行公文，然而此一書寫體式既彰顯著一個人的品德與才學，亦增輝朝廷，助益國家，所以說：「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³

由於「表體多包」，所以寫作者不同而使之面貌與風采殊異，又在「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的寫作要求下，此類文章，即便在程式化的公文體製中，仍然必須倚賴寫作者個人的真才實學，換言之，析讀表狀之文，文章亦間接投射出寫作者的詞采與個性。

¹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 423。

² 同上註，頁 424。

³ 同上註，頁 425。

在熊飛所校注的《張九齡集校注》裡，65篇表狀中附錄玄宗御批篇者達51篇之多，⁴就其中篇目觀察，時張九齡所呈奏玄宗表狀之目的與用途，可蓋括為論事、請勸、慶賀、謝恩四大類，尤其以後二類之篇幅佔了絕大多數。以下，將依張九齡撰作表狀之不同目的與用途，分項論述其表狀書寫所承載的面向，再合併各篇中所附錄的玄宗御批合而觀之，藉以探析張九齡在士遇與世變下，如何經由表狀書寫，折射出文士、良相的雙重情貌與身影。

一、論事請勸：勇陳先見，美聖君王

開元6年，皇太子及鄴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⁵時張九齡登「道侔伊呂科」，遷左拾遺，有諫言獻狀之責，其獻〈論教皇太子狀〉，以此狀諫玄宗盡早為皇太子李瑛的教育之業謀劃，狀內言：

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為之師保。⁶

開篇明言皇太子乃國之儲君，是大唐政權未來得以延續的根本，因此首要之務即在儲君的養成教育，所以皇太子雖則赤子，務以教育為先，以端正儲君性情，免於久習逸樂。於是，張九齡認為，儲君養成教育的第一步便是為皇太子揀擇良師，其援引《大戴禮》言：

⁴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697-784。

⁵ 顧建國：《張九齡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89。

⁶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721。

周成王在繼祿之中，太公為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為之太傅，傳其德義；……。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亡。⁷

以《大戴禮》所載，周所以聖康與秦為何暴亡之正反對比二史例，清楚地向玄宗說明替皇太子擇師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端正儲君本身的性情，更在於鞏固大唐未來的江山，實有長治久安的治國考量，所以，擇師條件在於「耆儒碩德」，即是透過正人君子作為皇太子學習的身教典範與示範，那麼「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⁸而此事衡以《冊府元龜》所載：

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內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乃下詔曰：「修身貴乎慎始，篤學在乎自幼。朕諸子已各髫髻，須聞詩禮；宜於儒官中選德行者宿三五人入閣教授」。⁹

由《冊府元龜》宦臣部選任所載，可以見得〈論教皇太子狀〉的建言為玄宗所採納，並且確實依照狀文內言所諫施行，又觀之〈論教皇太子狀〉的寫作內容，張九齡開篇破題見意，適時援引史例，明聖王之教的同時，亦盼玄宗承繼聖王道統，行明君之教，此筆鋒運轉，一以見張九齡熟稔儒家經典，全文一氣呵成，毫無累贅；次見其輔君佐政的儒士思想內涵。

開元 22 年，張九齡撰〈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狀〉進呈玄宗，事因薛王李業病重，而薛王李業為玄宗親弟，玄宗擔憂手足病情至極，憂迫之中，容髮遂變，張九齡撰狀以陳臣民憂心與關懷：

⁷ 同上註，頁 721。

⁸ 同上註，頁 722。

⁹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編，周勛初等校定：《冊府元龜》卷 780 宦臣部選任，(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 7823。

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答制，以薛王業有疾，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憊。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情，達於神道。¹⁰

一般來說，唐玄宗開元治世，以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及經濟繁榮臻於鼎盛，可上追先祖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而與之媲美，不過，李世民以玄武門之變，兵滅手足，為後世所詬，李隆基卻以友愛兄弟，歷唐世帝王莫及，是以張九齡於狀內說：「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又玄宗御批此狀：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況有疾疹，自成憂迫，不辭容髮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顧茲德薄，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11

從玄宗之批注可知，玄宗心繫手足病情，不辭容髮致變，可是後不多時，薛王李業回天乏術病薨，玄宗因此悲傷過度，廢寢忘食，心繫朝廷安危的張九齡進呈〈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勸請道：

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戚！伏聞寢膳，有改乎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灼。伏願抑損恩命，沖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幸甚！¹²

玄宗慟絕薛王李業之薨，張九齡認為此舉實屬天倫之戚，人常情理，不過以站在人臣的立場撰狀勸請玄宗復膳，其思考與關心在於，君主哀戚手足之逝，雖則家

¹⁰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28。

¹¹ 同上註，頁 728。

¹² 同上註，頁 730。

事，無乃國事，且一國之君，因哀痛過度，造成生理與心理的疲憊不適，甚且無心理政，對於泱泱大唐來說，國不可一日無君，玄宗若因薛王薨而廢寢忘食多日，絕非宗社之福。只是，其時哀傷不能自己的玄宗御批道：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有如此情。¹³

由此可見玄宗之仁孝，其友愛手足之情絕非一般。此外，玄宗服喪雖則哀痛難以自抑，其聞狀後，也給予了張九齡從人情與法理兼而有據的回應，見得玄宗並非完全耽溺於喪弟的情緒中，而忘失了貴為人君的身分與責任。

依上所述，綜觀〈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狀〉、〈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及此二篇玄宗御批的寫作內容，張九齡皆從國政朝綱的安危，實繫於君主的身心狀況之立場來撰文。文中以薛王李業的病情，及其存歿為撰文動機，並且以此作為探問、關切君王日常近況的線索，又由於玄宗對待手足「友愛之至」，無論先是薛王李業病入膏肓，迄其之後病薨，玄宗對此勢必牽心掛懷，所以，張九齡在撰作此二狀上，篇幅和遣詞用語必得簡要精當，好使玄宗在短時間內，可以不耗費過多的心力閱覽批奏。

再者，在簡要的篇幅裡，如何使君主於心神勞瘁之際，讀進「臣庶之望」，張九齡以同理心出發，由天倫之常立意，續從關切君王的容髮及飲食起居的改變著手問候，如此可見人臣護主時關懷之情的真篤。另外，從此二篇的御批來看，張九齡此二狀之發文與立意，確實扣合了玄宗當時遭遇的心境，可謂頗得君意，另一方面也見得玄宗友愛兄弟之實，自是不假。

除此之外，且從上述三篇狀文及玄宗御批的立意作一番探查，隱約可見，唐

¹³ 同上註，頁 730。

玄宗與張九齡君臣眼中的聖王與理想治世典範，可說其特別推崇，上古淳樸時代的三皇五帝，是故，緣此特定的歷史認識與政治想像，玄宗朝的君臣，彼此認真看待聖王典範，各自努力扮演好「君君臣臣」的角色，並且盡其職分。¹⁴

然而，對於上古淳樸時代聖王的推崇，玄宗不盡然以出入《周禮》及儒家理想治世的政治藍圖，作為治國方略唯一的政治思考準則，陳弱水在探索了初唐的墓誌發現道：「初唐的政治意識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家傾向」。¹⁵而道家對於玄宗治世政治思想的作用，廖宜方的研究指出：「從太宗至玄宗，道家政治理念在朝廷中始終佔有相當的地位。此事不單是李唐尊老崇道的結果，其背後涉及中古時代道教的宇宙觀、世界觀以及道家政治思想的歷史視野」。¹⁶

由上所述，以上古淳樸作為政治思考的歷史想像，在玄宗的治國方略裡，不盡然以代表儒家治世理想藍圖的《周禮》來統攝，在多方歷史與政治要素的牽引下，玄宗的柄政舉措亦包含了道家的傾向，且就道家最主要的治國方術而言，以「無為而治」、「以道治國」為先，尤其「無為」作為道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自三代以下，即有漢世帝王援引為治國的口號與理想之一。不過，以「無為」治國，畢竟僅是一面政治大纛，而真能助益帝王成就一代盛世王朝，與此意念相關者，更應在於以「道」治國的運用。廖宜方論述道：

嚴格而論，皇帝王霸論中，三皇正是以「道」治國。李唐皇室推尊老子、

¹⁴ 廖宜方在其《唐代的歷史記憶》一書上卷，自唐太宗迄玄宗世，從歷史認識、時代認識與政治文化三面向，綜合考察初、盛唐君主與士人的歷史記憶，而此歷史記憶實可劃分為三個層次論述，即唐代朝野君臣對過去特定歷史時段的看法，其次，此看法與唐代的政治文化、時代發展以及唐人的時代認識有何關係，第三則為所涉及課題的人物與身分認同、口傳與文字兩種歷史記憶、歷史知識的效用。從廖宜方在其著作上卷的論述中，玄宗和張九齡君臣以上古聖王的治世作為治國柄政的理想典範，始應推自唐太宗世，又唐王朝國祚中間雖歷武曌移國，以周代唐而治，然而唐太宗對上古淳樸聖王治世的推崇之實際影響迄於唐玄宗世未消殆。參考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49-257。

¹⁵ 陳弱水：〈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前期思想〉，《新史學》第 19 卷第 4 期，2008），頁 12。

¹⁶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52。

道教，與唐代前期帝王對上古治術的興趣，可能兩相符合。¹⁷

在此王霸的政治意念下，上古聖王的以「道」治國，便更見清晰地成為唐玄宗柄政下政治文化重要的一環，因此玄宗躬自親注《道德經》，此事見《冊府元龜》卷五三帝王部尚黃老所載：

二十三年三月癸未，親注《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相蕭嵩等奏曰：「……請編入史冊」。¹⁸

此事於開元 23 年張九齡所撰的〈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亦有其言：

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閭闕？伏奉恩敕，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德經〉及疏》本。¹⁹

從張九齡此狀，可知玄宗親注《道德經》，並且慎重其事的將御注本頒告天下，而張九齡等諸大臣則以狀勸請、酬應道：

天旨玄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豐，文省而事愜，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非陛下道極帝先，勤宣祖業，何能回日月之晷度，鑿乾坤之戶牖，使盲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有適？²⁰

¹⁷ 同上註，頁 91。

¹⁸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編，周勛初等校定：《冊府元龜》卷 53，(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 558。

¹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31。

²⁰ 同上註，頁 731。

全篇狀文篇幅不長，字數約莫 160 字左右，其勸請內容方向有二，其一先就《道德經》的闡釋而言，因為「天旨玄遠」，若沒有御注本，恐將產生人人各安其意，穿鑿附會的結果，另外，張九齡從盛讚玄宗御注《道德經》的角度，認為玄宗此舉，乃是承繼先祖，宣揚帝業，振聾發聵，祛除蒙蔽的美舉。

在玄宗對此狀的批注裡，其說：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歧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明，推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有未周，故遍氏積學，竟無損益，遍請宣行。²¹

玄宗認為歷世以來，對《道德經》的注解越多，其歧見增廣，憂心世人對《道德經》的解讀與領會產生疑誤，所以著手校勘諸家說解，躬自詳釋，至於對張九齡等諸臣的進狀盛讚，除以「朕之不才，甘失旨於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聊表謙恭退讓，又說「可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為條件，錄姓名以聞，當別加重賞」。²²見得尊老崇道在玄宗治國方略中的舉足輕重，且堪為開元治世時期重要的政治文化舉措。

事實上，歷觀唐世帝王在位時間，以玄宗最久，從政治文化的影響來說，亦最深遠。玄宗以開元治世上追先祖太宗貞觀之治，天寶末年，竟以安史之亂傾頹國運，影響中、晚唐嗣君的家國想像與政治思考，成為大唐國運承先啟後的轉捩點，之中即可能蘊藏著，玄宗尊崇老子與道教的同時，對於「無為而治」用以治國得以王霸想像的偏重，此說，不僅止於御注《道德經》本身所延伸的政治象徵與文教意義，更在於玄宗在位日久，君心日漸豫怠的柄政權術思考，試見《資治

²¹ 同上註，頁 731-732。

²² 同上註，頁 732。

通鑑》天寶三年所載之一事：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²³

在玄宗的認知裡，尊老崇道即在於「無為而治」、「以道治國」，那麼其說「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便無不符合道家的政治理念了，只是當高力士以「天下大柄，不可假人」精簡扼要的一語應對裡，竟惱怒玄宗，甚至欲賜死高力士，使素來深受明皇重用的近身內侍高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直可說玄宗晚年欲以上古治當今的柄政思考裡，輕忽了歷史想像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假似和差異。

在張九齡數篇勸請酬應玄宗的表狀裡，還有〈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此狀據熊飛考證，應為裴耀卿、張九齡、李林甫三人所上之賀狀，²⁴內容雖然多在歌功頌德玄宗之聖斷能謀，用事如神，並且藉由勸請玄宗詔令刊石，銘記聖功，以宣揚平定契丹之大捷邊功，不過狀文依然可見，張九齡在制式的上行公文書寫裡所展現的詞采風華，試見該文如下所言：²⁵

陛下獨斷宸襟，高奪群議，以為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歲。不若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不爾，

²³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5，(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62。

²⁴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35。

²⁵ 《資治通鑑》開元 23 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參見(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3。

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不出此歲，當并成擒。²⁶

以駢文六、四的句式編排文意，又以「不若」、「且」二詞轉折文意，使得行文語氣跌宕有致，屢起波瀾，非一般平鋪直敘，專事褒揚的頌美之詞。又如文末表明人臣之所呈狀的心跡說道：

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以返耕。……。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²⁷

此段從邊疆征人得以返耕、聖意洞燭機先、人臣應盡宣美之職分三面向，勸請玄宗刊石，並且以此說明，何以契丹大捷，足堪刻石以紀功德的理由。先就「緣邊戍卒，咸以返耕」來說，男丁返耕表示邊疆無事，舉國太平，且百姓不再以征戍、離合聚散為苦。其次，若非「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斷不能「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所以，正因為聖意洞燭機先，善斷能謀，因此大唐得以用兵如神，平定契丹，大捷來報。再來，為人臣子者，便有以章表「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的職分。

對於張九齡諸臣呈狀勸請之事，玄宗是否准其所奏，且看御批如下：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實已盈，人神棄之，指期可滅。今之咸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頗矜功伐，不願為之。伯獻前請，

²⁶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733。

²⁷ 同上註，頁734。

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愧，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²⁸

玄宗認為契丹平定，大捷來報，實屬情理自然，若刊石紀功不啻伐善施勞而流於好大喜功了，所以說「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頗矜功伐，不願為之」，而玄宗在回絕此事上，甚至以其篤志所習的王獻之大令書一事，批答以「桓山之頌，復在茲乎？」詰問作結。

就張九齡上呈的表狀裡，從美聖君王行跡為目的而撰作的勸請之文，還有〈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可供觀察張九齡與玄宗君臣之間的互動與對答：

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小小？陛下遂當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²⁹

在此狀文內，張九齡先於起筆簡略交代，玄宗為何考慮西幸改期的原因，再就為人臣子，掛懷聖躬安泰的立場，以精鍊扼要之筆，說明洛陽皇都的宮殿苑囿、風土氣候不甚宜人之處，話鋒一轉，言及正因為玄宗是一位痾瘵在抱、視民如傷的明君，所以可以置自身的安適於身外，降令西幸改期。

開元 23 年，唐玄宗原欲幸西京，但是聞奏「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百姓，猶有未安」，玄宗擔心驚擾百姓，至於京畿之地來年歲穀不豐，所以欲將西幸改期，並敕令百官奏議此事，而此狀即作於玄宗從張九齡所奏，西幸改期後。張九齡認為玄宗能「以萬姓為心」，「苟利於人，朕何顧惜？」立意，而將行

²⁸ 同上註，頁 734。

²⁹ 同上註，頁 739。

幸西京改至來年，此乃聖主明君之舉措，所以「聖君鴻名」之由，一以勸請一以請示玄宗，能否將此事宣付史館立傳。然則，玄宗對於此事又是如何看待：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欲西行。然積虛屢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麥不登，未免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不忍。至於宮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為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³⁰

以「百姓不足，朕孰與安」的心意，將由於「宮苑所樂」而「誠欲西行」的念頭打消，且說「再三疚懷，欲去不忍」，以此與〈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內，「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恩愛育，遂及於此」互讀，³¹可知時任中書令的張九齡與唐玄宗君臣之間，其柄政待民之仁愛與用心，契合一致。

二、辭謝慶賀：移孝為忠，忠誠謀國

在張九齡諸多慶賀辭謝的表狀中，以謝恩讓爵的篇幅，最能於制式化的公文書寫格局外，盡顯曲江公的詞采風華與風度情性。就謝恩讓爵此類公文而言，撰作內容無非是要竭力盡其自謙自抑之詞，以謝皇恩隆盛，以表承受之惶恐。因此，即使是在一套既定的格式化語言下，士人仍需要具備一定的文墨涵養以騁詞藻，好在揮墨淋漓之間，或謝主隆恩，或辭讓君王。³²

³⁰ 同上註，頁 739。

³¹ 同上註，頁 739。

³² 例如，張九齡就曾為人代撰有〈為兵部尚書王峻謝平章事表〉、〈為信安(郡)王獻聖真圖表〉及〈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參見：(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10-719。

張九齡撰作〈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於開元 22 年，此際由於玄宗朝廷正值朝宰蕭嵩與韓休二人不協，時相爭執，朝政難以推行，致使玄宗急於撤換宰輔，決另起用適逢母憂，為母守孝的張九齡。《資治通鑑》開元 21 年詳細的記載了蕭嵩、韓休同朝為宰之事：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丘聞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³³

蕭嵩、韓休二人能夠同朝為宰，起因裴光庭逝世，依唐朝相權的配置來說，玄宗需要再命 1 至 2 人為宰輔之一，用以平衡朝廷的權力中樞，錢穆在〈唐代政府組織〉說道：

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因於相權的變動，一切制度也自隨之變動。……而唐代宰相則採用委員制。……唐代則把相權分別操掌於幾個部門，由許多人來共同負責，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來決定。³⁴

錢穆在比較了漢唐二朝的相權任用制度後，認為唐代相權由漢朝集中於一人之手的領袖制更換為多人共治的委員制，是非常大的變化。因為唐朝相權分掌，以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三省會治，才等於一個漢朝的宰相權，且監察權還不包括在內。因此，對於玄宗理政治國的張弛而言，若宰輔彼此之間能夠性情、意見相協，減少摩擦、齟齬之事，順利執行君上意志，當為帝王揀擇人選起任宰輔的首要考量，但是蕭嵩、韓休二人在性情上，首先便不能相輔相成：

³³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3，(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11-6821。

³⁴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2011)，頁 41。

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³⁵

韓休得與蕭嵩同朝為宰，除了裴光庭薨逝作為晉身契機外，更在於蕭嵩私心的拔擢，其認為韓休性情安靜淡泊，應當容易受其限制，不忤己見。然而，蕭嵩始料未及的是，韓休以守正不阿的剛毅性格，執掌侍中之位，在共事之時，自身屢次遭到韓休的矯正，如此秉公執政的性格，甚至犯顏直諫，也令玄宗心有所懼。不過，韓休守正不阿的性格，不僅賢相宋璟讚嘆，在玄宗的心中更是頗受肯定的：

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³⁶

但是，唐朝廷權力的中樞，畢竟不屬於蕭嵩或韓休一人之手，此二人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越演越烈，竟演變至玄宗面前爭論，到了由聖意裁奪的地步：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君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³⁷

韓休與蕭嵩同朝任宰，掌政不協劇烈如此，對於日理萬機的玄宗而言，若不在宰

³⁵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3，(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11-6821。

³⁶ 同上註，頁 6811-6821。

³⁷ 同上註，頁 6811-6821。

輔人事上重新布局，只怕朝綱空轉，國事傾頽，是以玄宗決定罷嵩、休二人中樞宰輔之位，起復張九齡：

丁巳，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³⁸

開元 21 年，張九齡遭逢母憂，為母守孝，奉制後隨即上表陳情，哀訴道：

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³⁹

表文開篇，從收到制命後的誠惶誠恐心情立論，自言正逢母喪，丁憂家中，無心亦無力於勝任宰相一職，更何況宰相者，有輔國佐政，調和鼎鼐之職分。其又說：

臣實單人，本無大用，況在艱疚，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願感恩，匍匐抵命；其如塵玷聖鑒，污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虛廢。⁴⁰

平生事親至孝的張九齡，曾經為了奉養母親「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⁴¹又為了侍母在側，而上表更換任官地點，「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⁴²及至母喪，「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

³⁸ 同上註，頁 6811-6821。

³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697。

⁴⁰ 同上註，頁 697。

⁴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7。

⁴² 同上註，頁 4427。

白鳩、白雀巢家樹」。⁴³在養生送死無憾，竭盡孝思的意念裡，張九齡藉此作為回絕玄宗此道制命的主要依據，然後再於行文之間，騁藻以自貶自抑，增添表文情思之動容哀戚，以遂其陳表所求：

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痲疹之際，遽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道，是以庭闈昔絕，幾筵今阻，凡曰名教，實所深哀！……，惟聖所體。實冀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⁴⁴

為人子女者，生養死哀，儒家認為：「子生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當為父母服三年之喪，對於事親至孝的張九齡而言，為母守孝，恪遵孝禮，自不待言，然不多時，忽蒙玄宗制命起復任宰，鄭雅如指出：「解官為父母服三年之喪，於晉唐間已成為統治階層的共識，但朝廷以政務需要為由，要求部分官員中止服喪起復，亦不時發生」。⁴⁵其又說道：「奪情起復只是少數官員才有的待遇，故皇帝與官員多將起復視為特殊恩榮」。⁴⁶緣此可知，張九齡在玄宗心中殊絕一般文武官員的地位。

玄宗十分賞識張九齡的政治才幹與風度儀表，所以在此次起復時，授予張九齡宰輔之位，以示重用。⁴⁷除此，為了使張九齡放心奪情起復，在玄宗的批注裡，顯然的玄宗認為移孝為忠，忠誠謀國，無乃張九齡不可推卻，即刻赴命就任的理由與責任：

⁴³ 同上註，頁 4428。

⁴⁴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697。

⁴⁵ 鄭雅如：《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82。

⁴⁶ 同上註，頁 84。

⁴⁷ 鄭雅如在〈生養死哀〉論述道：「皇帝對於特別看重的官員，也往往於起復時授予更清顯的官職，以示重用。如高祖起復李素立，將其官從原來的八品監察御史超升為七品清要官，有司擬官時皇帝還特別要求一定要符合「清」、「要」的條件。中宗欲起復張說，擬官時從原來尚書省工部副長官工部侍郎(正四品下)遷為更清貴的門下省副長官黃門侍郎(正四品上)。玄宗時張九齡更於起復之際直接拜相。起復既被視為殊恩，也難怪官員『多以起復為榮』」。參見同上註，頁 85。

雖屬家艱，已逾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綬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⁴⁸

御批很是高明的從二個立場發為對張九齡陳表所求「喪紀獲終」的肯定與拒絕。首先，希盼張九齡務以黎庶蒼生大我為念，置個人小我私情於身外，是移孝為忠；其次，雖則遭逢母喪，憂思悱惻，然而國家正值非常時刻，君上既賞識其賢，聖意不可違背，是忠誠謀國，所以奪情起復，即刻上任。

對於張九齡仍在母喪丁憂之際，能移情奉忠，玄宗遍從生活起居，給予張九齡諸多照料，備加關懷，如賞賜了食物、藥物、衣物，蕃口，甚至是宅第等，面對所在多有的賞賜，張九齡每必言謝，且看〈讓賜宅狀〉：

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敕，賜臣前件宅，仍令官修，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慚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華，所居淺陋，爨屬苴麻，豈圖弘敞？⁴⁹

張九齡對於玄宗在生活起居的種種關懷照料，熟諳在心，然而御賜宅第，使尚在服孝居喪的自己既慚又愧，認為自身淺陋，「況涓滴未效，霈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其咎」？⁵⁰實不足以承受此等殊常厚恩隆禮。另外，在該表內值得關注的是，張九齡於辭謝御賜華府的同時，所展現出簡樸自律的恭謹性格：

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為豐厚，以此貿遷，足辦私室。

⁴⁸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698。

⁴⁹ 同上註，頁 824。

⁵⁰ 同上註，頁 824。

今崇其甲第，更使增修；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時垂寬容，而臣苟為貪冒，其如物議何？其如公道何？⁵¹

此表文意雖在明示謝恩以陳辭讓之意，可是探索全文語氣及措辭，誠懇篤實，在四、六句式行文間，文意全無重疊覆沓，反而就自身功績的付出，與虧耗國家器用二者立意，來逐一剖陳自己，為何辭讓御賜宅第的真實看法與考量，可說行文「如進實錄」的〈讓賜宅狀〉有別於張九齡其他奉制酬應，謝恩辭讓的表狀，凸顯了其簡樸恭謹的自修性格。⁵²

批奏此等賢良恭謹的〈讓賜宅狀〉，觀看玄宗的批注，亦見一代明君榮寵良臣，以四兩撥千斤手筆回應的聖意雍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修飾，已有處分，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修，其于國命？況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為宜。可擇日移入。⁵³

若說為人臣子的張九齡擔心「陛下時垂寬容」，所以獨厚賞其身，身為人主的玄宗亦自有一套解釋與說法，那麼便是，官宅既是公物，所以可以隨事借人，再者，即便賢臣如張九齡者，一心師從簡樸，翻修官宅實則對應就任官吏職等高低之所需，不可一味儉吝，當以名副其實相容。總此理由，責令張九齡擇日移入安居。

⁵¹ 同上註，頁 824。

⁵² 顧建國在《張九齡研究》裡說道：「古人曾有這樣的說法：『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是錄。若汨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以此觀照九齡狀文，確實多有吻合者。《讓賜宅狀》一文只是辭讓之意未避所謂『太露』之忌，但余以為這正是狀表『如進實錄』之本質特點的體現」。參見顧建國：《張九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07。

⁵³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24-825。

從上所述，即使是謝恩讓爵的公文書寫，亦可窺得張九齡恭謹自修，忠誠謀國的性格，在開元 24 年的〈進《千秋節金鏡錄》表〉裡，張九齡更將自身直言骨鯁的為政性格嶄露無遺：

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鑒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鑒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⁵⁴

開元 24 年八月壬子玄宗生日，舉朝文武百官無不藉機競獻珍異，博取聖意垂愛，唯獨張九齡殊異同僚，逕上《金鏡錄》。《舊唐書》載此事：「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⁵⁵又《新唐書》：「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鑒錄》，以伸諷諭」。⁵⁶資治通鑑亦載：「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褒美」。⁵⁷由此三史傳載所示，張九齡進呈《金鏡錄》的目的在於，冀望玄宗以史為鑒，覽觀前古興廢之道，明瞭《金鏡錄》中所隱含的諷諭：

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鑒。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沖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鑒》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⁵⁸

⁵⁴ 同上註，頁 700。

⁵⁵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099。

⁵⁶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9。

⁵⁷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4。

⁵⁸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00-701。

進呈〈進《千秋節金鏡錄》表〉之時，張九齡任中書令，位高權重，備受玄宗殊恩榮寵，履登其一生仕宦生涯的高峰，然而與此同時，探查朝中和其位列同僚者卻是李林甫、牛仙客之輩。事實上，早在上呈《金鏡錄》之前，張九齡因為玄宗欲假名器優賞張守珪平定契丹的邊功，而與玄宗意見相左，千秋節後，又因阻撓玄宗以尚書職封牛仙客一事，使得李林甫趁隙居中善巧便佞聖意，埋下自身與玄宗君臣關係危急、決裂的伏筆，如〈新唐書·張九齡傳〉所言：

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⁵⁹

張守珪因斬獲契丹有功，玄宗欲以三相之一的侍中之位大行封賞，張九齡卻認為宰相位高權重，地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可以用作封賞，況且張守珪只是平定邊患之一虜契丹，即高蹈宰相之位，若是平定為患更大的突厥，聖上未來將以何位而賞，以是玄宗打消了以相位封賞張守珪的念頭。

在封賞張守珪相位的君臣爭論裡，張九齡的建言仍為玄宗採納，至於封賞牛仙客一事，由於李林甫憐心的趁隙迴旋，竟離間了張九齡和玄宗君臣之間，長久以往理政的和諧關係，並且由此促使張九齡加速遠離玄宗朝權力中樞的地位。蓋此事，起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竭盡職責，操持有方，府庫充實，深獲玄宗賞識，於是玄宗欲以尚書大位嘉賞，《資治通鑑》開元 24 年有較為詳細的說明：

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

⁵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8。

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⁶⁰

張九齡先就尚書一職官名向玄宗釋之所由來，再以此衡之牛仙客的功績，認為牛仙客僅是竭盡其節度使的本務，若聖意欲行優賞，當以財飾外物論賞，實不足以尚書相位超擢牛仙客，張九齡言畢，玄宗當下默然，不過事情卻因為李林甫的居中介入，而另起波瀾：

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闕闕！」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台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⁶¹

李林甫居中介入的時機，緊接在張九齡辯駁玄宗欲賞牛仙客尚書之位後，如此趁隙而入，居心所求乃出於，李林甫自入朝與張九齡為同僚起，即因自身非以詞賦對策應舉出身，但見張九齡文雅，深獲玄宗重用，便心生妒忌，⁶²如此李林甫，只好務求善體聖意，巧善君心寵盛玄宗，博取玄宗的倚重，是以李林甫於朝理政而言，儘管以不忤玄宗之意，便宜玄宗行事為首要，因此，在封賞牛仙客此事上，李林甫不僅恭順聖意，又且藉機巧妙的奪取了張九齡所深獲玄宗倚重的信賴：

⁶⁰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4。

⁶¹ 同上註，頁 6822-6824。

⁶² 〈新唐書·李林甫傳〉：「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參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6344。

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⁶³

李林甫如何居中乘牛仙客事離間玄宗與張九齡的君臣關係，此事也見〈新唐書·李林甫傳〉詳載：

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⁶⁴

在此回因玄宗封賞牛仙客尚書大位的政治論爭裡，可說是一場張九齡與李林甫二者之間，對於起用人才，簡任官員，審視標準各有堅持與差異的政治角力戰，李浩在〈唐代文學士族與賢能標準〉論述了唐代科舉取士與吏部銓選所引出的文學與吏能之爭，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為張九齡和李林甫：

以文學之才進用為宰相的張九齡對用人標準的理解與以吏幹之才進用的李林甫不同。張九齡主張按傳統的觀念用人，而李林甫認為要用一些有豐富政治經驗和實際行政能力的人，這種差別，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賢能標準和人才觀。⁶⁵

這段話更進一步的來說，其實體現了玄宗朝官僚制度內，官與吏分離的現象與任官制度的兩套系統，李浩說道：「官多為通過科考入仕者，熟悉經史，擅長文學：

⁶³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4。

⁶⁴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6344。

⁶⁵ 李浩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52-153。

而吏則為地方人士，沒有科第，不擅文史，但對衙門的內幕、辦事程序、地方特色等瞭如指掌」。⁶⁶可見得為官與任吏二者不同，朝廷也由於任官制度與銓吏制度二套系統的並行不悖，互為補充，才能適時為朝廷補充職員俾使行政運作順暢。不過，官與吏既是二套官僚系統，之間能否互為所用，就張九齡與李林甫對於玄宗封賞牛仙客一事的答辯來看，除非君主制詔擢用，否則官與吏彼此之間，實際難以互容。

若說張九齡「出入台閣，典司誥命有年矣」，熟稔朝廷官吏一切銓敘制度，且任中書令，自當有最高的行政權力諫處玄宗封賞牛仙客一事，而素忌張九齡的李林甫亦勢必深諳官與吏銓選制度之不同，唯可看準此時機，挾著自唐興以降，朝廷普遍對於官與吏、科舉與世族等進用人才制度的批評與駁論為勢，翻動玄宗進用人才之觀瞻。⁶⁷所以，在李林甫進言後，玄宗執意封賞牛仙客不移，對於張九齡的文風不動，固執如初，致使玄宗大動肝火直以門閥之見駁難張九齡，張九齡自陳嶺南邊鄙出身，實與牛仙客關中世族不同以對，然而堅守自身職責所在，仍必須稟明朝廷品官與地方吏胥制度不可僭越。

反觀李林甫，先是從張九齡處得知，其將力諫玄宗不可以相位大封牛仙客，又竊自將消息走漏於牛仙客，再來是與張九齡同朝面聖時對此事保持默然，不置可否，事末卻以「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一語暗斥張九齡，文學之才對於君主現實治世不一定有所用，應當以才識為要，何況玄宗為一

⁶⁶ 李浩又說道：「故由朝廷派遣的、走馬燈似變換的官，實際上受制於那些小小的吏。換言之，官在某種程度上是外行的，而吏則是長期浸泡在某一方面的內行。一方面分別流品，看不起吏胥；另一方面又把實際的政務，都推放在吏胥手裡。官與吏的分離，科舉制度中對文史經藝的片面強調，導致官僚機構高高在上，沒有辦事效率」。參見同上註，頁 153-154。

⁶⁷ 李浩在閱讀有唐一代的文獻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是唐人對唐代的新生事物科舉制及銓選制批評極多，而且批評此制度者，本身多是從科舉甚至是進士明經科出身的。雖則根據唐人的觀點，科舉被批評的一無是處，但是在歷史的必然下，唐代選拔人才的制度影響近古至深至遠，尤其是唐人對賢能標準的討論影響廣大。根據他的研究指出，唐人對賢能的認識並沒有預設的、固定不變的標準，而是在實施過程中，各人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從不同側面對此提出看法，闡述見解。可說，唐人對賢能標準的爭論與分歧，自科舉制施行以來，其來有自。參見同上註，頁 139-163。

代盛世明君，既然牛仙客為天子所用，豈有天子務必遵守朝廷人才銓選制度一定之成理，可說李林甫此話一出，雖其言簡，無乃從二立場扣合聖意本心，順服玄宗君權專使的心願，亦在千方百計中成為玄宗權寵。

開元 22 年，玄宗罷蕭嵩、韓休二相，制命張九齡奪情起復，進用宰輔首位的中書令，於是張九齡與李林甫同朝任相，佐助玄宗治國理政。二人自同朝共事起，李林甫即因忌妒張九齡之文學才識，加以張之鯁直性格公正嚴明而與之不協，如二人對於玄宗廢太子一事，意見分歧，且見得二人為政性格之不同，可說張九齡剛毅尚直，李林甫善柔趨承：

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⁶⁸

開元 24 年是張九齡士遇生涯的高峰，卻也是其由士遇到士不遇的分水嶺，張九齡於此年遭玄宗罷知政事，謫貶嶺南荊州，可說開元 24 年對張九齡來說，是與其忠心侍奉一生的君王唐玄宗，君臣關係劇烈生變的一年，而玄宗終因李林甫言罷相張九齡，對於安史亂後的中、晚唐國家政局與史鑑意識來說，則被視為盛唐國祚盛衰二分的傾危之際，是為唐朝世變的轉捩點。

張九齡因李林甫巧佞善柔，居心權寵，致使謫貶荊州長史，對於時已仕於玄宗朝 20 多年的張九齡來說，為官多年期間也曾因為坐牽張說事而遭貶謫，但是此際坐引周子諒罪而遭貶，心情卻是極為惶懼的一次。在〈荊州謝上表〉一文裡，張九齡透過 500 多字的篇幅，申辯自己因周子諒事牽連被貶的冤屈：

⁶⁸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6343-6344。

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屬小道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輒惜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⁶⁹

〈荊州謝上表〉開篇猶為表狀之上行公文格式，然起筆即見張九齡此回遭貶荊州長史驚惶怖懼的心情，並且以「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提引下文：

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遙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王禕奏將朔方驅使，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而奏乞，事不敢隱，未止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⁷⁰

表文第二部分極陳自己坐罪周子諒事之原委，《資治通鑑》開元 25 年載此事：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命左右手暴於殿庭，絕而復甦；仍杖之朝堂，流灋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⁷¹

在周子諒事之前，張九齡先是由於牛仙客事為玄宗所疏遠，之後又因諫廢太子事，為玄宗所弛廢，因由李林甫專務玄宗權寵為目的，所引致的宮闈政治事件，接二連三的直朝張九齡骨鯁性格襲來，張九齡雖深知，此皆李林甫與武惠妃私下預謀，仍然忠誠謀國，侃侃諤諤力諫於上，反而一步步落入李林甫操弄奪權術的安排。由《資治通鑑》所述，因李林甫一言，張九齡牽連獲罪，謫貶荊州長史，然此事

⁶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02。

⁷⁰ 同上註，頁 702。

⁷¹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4。

也不過在其榮登中書令大位後二年多而已，想見張九齡撰作〈荊州謝上表〉時，內心的百感交集：

臣特蒙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罄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土，照臣血誠；夙夜煩冤，欲辨無路。⁷²

張九齡佐助玄宗操持權柄半生，對於玄宗的知遇之恩，唯在殫智竭力，盡思報效國家，即使智慮所限，仍不至於阿結私黨，愧對聖恩，字裡行間將話鋒矛頭指向李林甫等人，以「皇天后土，照臣血誠；夙夜煩冤，欲辨無路」披肝瀝膽之語傾訴心中滿腔幽怨，更是他剴切陳詞後的憤懣與沉痛。其又言：

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於知人，稟命舛剝，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息苟存者，臣為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釁咎則然，恩禮猶重，面目有覩，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達？⁷³

「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張九齡力陳自己光明理政，磊落處世，由是無所防避而屢遭小人趁隙詆毀、落井下石，想起當初「臣為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如今卻落得謫貶荊州境遇，於是，忠厚鯁亮之臣終屈於政治現實，而一代賢相張九齡內心的百感交集，亦藉由此表開誠布公，情性盡顯。

⁷²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03。

⁷³ 同上註，頁 703。

盛唐一代賢相張九齡於開元 25 年赴任荊州長史，既標記著自身仕宦玄宗朝的士遇終點，卻也是其開展一生情志書寫的嶄新里程。謫貶荊州後的張九齡，深知現實政治的變幻無常，與現時朝廷為李林甫輩者所把持的恐怖驚惶，一方面仍心懷玄宗，掛心國朝安危，所以在特定國朝慶典時，依舊上表慶賀關懷，如〈賀赦表〉：

臣聞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為春者，發生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罪荊南，亦濫承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⁷⁴

因為「春郊展禮，惟新布澤」，玄宗頒布了大赦令，張九齡此表基於慶賀頒布大赦令所作，此表文篇幅簡短，但是明言春郊展禮之義，仍見張九齡行文訓釋禮儀之名，以表狀潤色鴻業，體國經野的撰作用心。

三、詞顯情性：遣語精確，情真意篤

〈舊唐書·張九齡傳〉有言：「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⁷⁵致遠又與器識和文藝相關，而器識和文藝的連結，又為唐人從科舉制度檢核人才賢能的標準之一，李浩曾就唐人爭論文人有器識可以致遠的立場，論述此一立場與文人創作駢文的關係，其認

⁷⁴ 同上註，頁 705。

⁷⁵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098。

為有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二面向：

官員有文學之素養及技能，也是基本要求，聖賢原典包涵著文，公私文翰之製作與理解亦需要文。尤其是在唐代這樣一個將駢體文作為應用文體而非藝術美文的時代，對文之接受與表達的水平，自然與仕進發生密切關係。作為士人教養與辦公技能的文，與後來作為個別人的特殊愛好與獨擅的文是有根本區別的。⁷⁶

張九齡撰作表狀，乃朝臣上呈君王的奏章，體式上要以駢文為主，而駢文在此時期作為應用文體而非早先情志書寫創作的藝術載體，就張九齡所身處的初、盛唐轉變時期而論，表狀此一上行公文書寫，在具確嚴謹的程式化公文書寫格式下，將在張九齡的筆下呈現何樣面貌與特徵？又在「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政治正確的文藝風氣裡，⁷⁷張九齡如何從表狀書寫中，表述開元時期的文壇改革風氣？

綜觀張九齡 65 篇論事請勸、謝恩讓爵的表狀公文，儘管曲江公在此些書寫裡，專務以四六文句式行文，可是若再進一步詳其行文內容，卻見其運散於駢、駢散相間的筆力。先由於駢文仍作為表狀此一公文體類的書寫載體，因此駢四儷六的句型乃形成張九齡表狀之文格式嚴謹、莊重整飭的風貌，例如〈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托於群生。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合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讎所載，殊祥罔不臻。

⁷⁶ 李浩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46。

⁷⁷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3057。

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⁷⁸

又如〈論教皇太子狀〉：

胡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⁷⁹

再如〈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頓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侗使回，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⁸⁰

援引上述三則文例，以駢文形成的形式要件「整」「儷」「諧」探查其中，⁸¹首先〈洪州進白鹿表〉開篇以老子之說起筆，最見駢文之典麗雅正，〈論教皇太子狀〉則多見重疊複沓之偶對，到了〈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則藉由「至今」、「即是」、「在於」、「雖」、「且」、「亦」等連接詞形成四六句式行文，使全文流暢自然，去除繁麗典重，達致以駢體之文，運用散筆語句論述事件，使得論述之事因由駢散相間的敘述方式，更見作者思辨清晰、條理分明的中心意旨。戴紅梅說道：

張九齡散文在遵循規範的同時，又不同程度地突破特有規範的束縛，相對

⁷⁸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709。

⁷⁹ 同上註，頁722。

⁸⁰ 同上註，頁726-727。

⁸¹ 簡宗梧著：《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頁21。

於「燕許」等人而言，他更多地把散文引入駢文，大量的使用奇句單行文字，法中求活，活中見美，呈現出「駢散相間典雅自然」的審美特徵。⁸²

事實上，張九齡身為皇帝執筆之臣，又身居宰相重臣，其閱歷和見識確實是超乎常人，所以熟悉駢文體式，既是為官技能也為仕進素養，有鑑於此，戴紅梅認為，張九齡及其文：「不僅大力倡導雅頌之聲，而且在文中往往採用漢賦中鋪張揚厲的手法，不吝筆墨」，⁸³所以表狀中不乏張九齡為潤色鴻業目的之作。其次，就章表的用途而言，「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⁸⁴如何經由制式化的公文書寫，凸顯個人文學內涵，如〈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讓賜宅狀〉和〈荊州謝上表〉等表文裡，儘管仍多充斥著謝恩辭讓之語，然而張九齡就事言事，忠誠謀國，直抒胸臆，鎔鑄詞采手筆與個人情性風華於文中，尤其〈謝荊州上表〉全文開篇直抒心曲，披肝瀝膽，不見畏罪頓脫的應酬敷衍。

承此可說，張九齡的表狀書寫面貌與特徵，因由開元朝玄宗主導的文藝趨向下，使得駢文作為公文書寫的體式，在初、盛唐得到了改造與轉化的契機，正因為玄宗的文藝趨向在於「稍索理致，崇雅黜浮」，所以「氣益雄渾」即成為玄宗朝群臣撰作努力達致的目標，又且雄渾之氣當如何展現，張九齡懷抱賦家精神，由采飾玄宗帝業，鋪張王朝經世濟民之術為之，期使以表狀盡現「潤色鴻業」以「體國經野」的士遇圖像。

⁸² 戴紅梅：〈駢散相間·典雅自然——論張九齡散文的審美特徵〉，《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2期(2012年4月)，頁75。

⁸³ 戴紅梅：〈體兼雅頌·浩瀚為文——論張九齡散文之氣盛〉，《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0卷第7期(2012年7月)，頁65。

⁸⁴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424。

第二節 君臣相猜，犯顏勸諷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元 24 年評論了唐玄宗自即位以來歷任的宰相風骨，其說：「姚崇尚通，宋珪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而其評述止於張九齡，因為此後玄宗朝宰為李林甫、牛仙客及楊國忠之輩，其後又言「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⁸⁵。

由司馬公之言，可以看出玄宗開元朝治世由鼎盛向衰頹奔赴的二項端倪，其一，開元朝的鼎盛，實在於玄宗任用宰輔中樞的用人精當，各取所長，互補所需，此外，張九齡得罪遭玄宗罷相後，玄宗朝廷忠良進諫之路塞阻，最終綱紀敗壞。

張九齡秉公職守，其骨鯁敢言盡顯儒士風範，若論其敢於逆鱗直諫的風骨，又可溯及上古以來的諷諫傳統連繫觀察，〈詩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⁸⁶張九齡對於現實政治的思辨，或微言諷刺，或慷慨直陳，可要言之皆本於《詩經》「以聞天子」的諷諫傳統。

此外，《禮記》：「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窺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尤其說道：「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為君，

⁸⁵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臺北：世界書局，2012)，頁。

⁸⁶ 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頁 10。

不避喪身」。⁸⁷諫者所以秉直上言，為了使是非黑白得以反正，當不顧自身利害，以達為君謀國，防微杜漸之目的。

在熊飛所校注的《張九齡集校注》裡，收錄了 6 篇以諫名篇的文章，⁸⁸就篇目所示，張九齡直言進諫面呈玄宗之對象與目的，無非專注於國家之任人用事，且除以〈諫張說勿私公器〉外，其餘篇章撰作時間皆集中在玄宗開元朝後期。以下，將依張九齡進程諫言之不同對象與目的，分項論述其謇諤直言所承載的面向，再合併《資治通鑑》、兩《唐書》中所記載的敘述合而觀之，藉以探析張九齡在士遇下，如何在侃諤的諫諍書寫裡，折射出一代良相瞻顧世變的骨鯁身影。

一、諫私公器：滅私盡忠，公私分明

在討論唐玄宗如何任人用賢，以及張九齡躋身相位後遭謫貶的歷史進程裡，張說、李林甫和高力士等人物與張九齡的仕宦生涯發展密切相關，不容忽視。首先，張九齡雖因才鑒受到吏部試萃拔擢，然而能受到重用進遷，可說和時任宰相張說的親重，與通譜系有關，兩〈唐書·張九齡傳〉先後有言：「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中書令，與九齡同姓，敘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⁸⁹「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⁹⁰

⁸⁷ 曹美秀：〈陳澧《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期（2007年3月），頁282。

⁸⁸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112-1123。

⁸⁹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097。

⁹⁰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4427。

張九齡初登玄宗朝仕途，因為有時任中書令的張說與通譜系，使得張九齡藉以躋身上進，深受張說的提拔與重用，因此張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不過開元 13 年，張九齡卻上諫張說勿私公器，其言：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也。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為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⁹¹

此事起因於開元 13 年，玄宗東巡行封禪之禮，《舊唐書》說：

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⁹²

時任宰輔之首的張說位高權重，欲假玄宗封禪泰山大典，行私賞親故小吏，並且令張九齡草詔，將此事看在眼裡的張九齡，不顧張說拔擢其在先，直接聽命其事，反而向張說直諫：「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也。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張九齡先從公忠謀國的角度，規勸張說不可假公器，以為結黨營私之用，再就明哲保身的為政操守來說，若執意如此，將身遭謗議，使天下四方清流高品失望，今事仍有轉圜，望張說收回成命，然而張說認為：「『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⁹³

此事之後，張說因田戶之事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意見相佐，張九齡對此諫言：

⁹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112。

⁹²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3097。

⁹³ 同上註，頁 3097。

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複勸說為備，說又不從其言。無幾，說果為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為冀暫刺史。⁹⁴

從上述二事中，深獲張說親重的張九齡，即使面對拔擢自己的長官同僚，仍然執中秉直而言，不因個人偏私而有所鑽營藏匿，張九齡面對親重自身的張說，如此敢於直諫，誠如《資治通鑑》24年所評：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珪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⁹⁵

雖則自身初登玄宗仕途，成也張說、敗也張說，但在此因張說趨炎附勢、貪汙納賄連帶自己也由中書舍人坐貶太常少卿，身陷張說罷相的政治風波裡，無乃開啟了張九齡認識現實政治的視域，並且成其往後仕於玄宗朝的政治試煉。

二、諫阻奸佞：防萌杜漸，公忠體國

在直諫張說勿私公器時的張九齡，初履玄宗仕途，擔任的是文書、教育及政治備詢一類的中低階官員，到了開元22年奪情起復後，張九齡執掌宰輔之首的中書令，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張九齡此際雖則地位卓高、權柄日重，然而玄宗朝到了開元24年之時，卻是唐明皇在位歷23年，春秋日高，逐漸沉迷於開元治世的繁華太平而懈弛朝政的治理，於是開元末期，忠臣、奸佞並列於朝，即使如

⁹⁴ 同上註，頁3097。

⁹⁵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6822-6823。

此，張九齡依然侃侃諤諤，竭誠事君，盡忠輔國。

縱觀玄宗朝的盛衰二分，世皆以天寶 14 年的安史之亂為唐世治亂二分的歷史節點，而安史之亂的核心人物之一即為安祿山，在開元 24 年時，張九齡即曾上諫〈誅安祿山疏〉，向玄宗勇陳先見以杜絕大唐後患：

伏以春生秋殺，蒼天之大權；罰罪賞功，聖人之巨柄。倘時令不中，何由萬物化成？苟彰瘴失宜，尤難三軍立績。是以用命用成，固宜嘉勳；失律而逃，更當懲戒。今節度使張守珪有部將安祿山，狼子野心，獸面逆毛，既非類而偷生，敢恃勇以輕進，為賊敗衄，挫我銳氣，必正法乎軍中，庶章威於閫外。⁹⁶

張九齡之所以諫上誅安祿山，事出於張守珪派遣安祿山討伐奚、契丹兩蕃，安祿山卻恃勇輕進，以致打了敗仗，於是：

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⁹⁷

《資治通鑑》24 年詳載了誅安祿山一事的轉折，起初張守珪既以安祿山打了敗

⁹⁶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114。

⁹⁷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4。

仗，於是將欲奏請軍法斬處，不過行刑安祿山前，張守珪的心念一轉，起了惜才之情，其實張守珪私下是愛惜安祿山的驍勇善戰之才，「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⁹⁸於是，張守珪更改軍令送交京師張九齡簽處，不過張九齡認為，軍令如山，豈可輕易更改，但是誅安祿山一波三折處，竟在於玄宗的不殺，接著張九齡固諫力爭，君臣一來一往之間，玄宗最終反而大赦安祿山，是以〈誅安祿山疏〉又說：

茲其執送京師，請行刑典，豈守珪之故爾緩刑？是威福之未敢擅便。列上其罪，留中不行，皆云殺此，將謂赦之？雖陛下之弘仁，恐奸徒之漏網。故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宜免死！況形相已逆，肝膽多邪，稍縱不誅，終生大亂。⁹⁹

張九齡援引春秋時代齊國大將司馬穰苴誅殺莊賈一事，奏明玄宗軍令如山，絕不可輕易動搖，唯有斬處安祿山，才能大振軍心，建立威信，況且安祿山的行為舉止已顯露謀逆之相，若不趁此誅除，將成後患。

夫陽者發生之道，陰者肅殺之義。必肅殺而後能發生者，勢也。苟秋肅不行，適為姑息之惠，欲發生而必須肅殺者，時也。惟春恩欲遍，無存養奸之弊。系非細故，臣切大憂！是以率直犯顏，望行天怒，深聽守珪之奏，立斬祿山之叛。¹⁰⁰

上文就生殺符合陰陽的天道循環之理，說明誅安祿山之勢所必然，即使皇恩浩蕩，

⁹⁸ 同上註，頁 6822-6824。

⁹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115。

¹⁰⁰ 同上註，頁 1115。

仍無存奸養弊的必要，張九齡於此極言其憂心之殷切，所以犯顏直諫，務請上誅安祿山。張九齡未卜先知的忠言，對於玄宗來說無異忤逆逆耳，然而玄宗豈料得天寶 14 年安祿山果真謀亂造反，當其因為安史之亂西逃之時，途經四川，「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¹⁰¹是以，歷史洪流的淘洗，終將還原張九齡的忠良耿直與詞理精確。

事實上，張九齡為相雖僅二載餘，然而通觀他仕於玄宗朝二十八年間，自授門下省左拾遺起，迄於罷相謫貶荊州長史，建言獻策，識見邊功，洞察奸佞，皆見他殫智竭慮，運籌帷幄，固諫力爭，力挽開元末期國勢頹波，卻絕意於玄宗無意國事，而殊寵邊功的柄政偏廢裡，就在玄宗大赦安祿山之際，玄宗已先為其盛世王朝留下外患，同此時另任相李林甫、牛仙客輩，更是加速王朝奔向衰頹之途。

開元 22 年至 24 年，張九齡高蹈中書令相位的士遇輝煌之境，卻也在謇諤直言中黯然地走下玄宗朝的政治權力核心，開元此二年間，玄宗朝國事如麻，唐明皇對張九齡的倚重與日俱增，可是君臣的相處卻因宰相中樞的人事布局安排上，多有歧見，日益不協：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並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¹⁰²

¹⁰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30。

¹⁰²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4。

在〈唐玄宗擇相與開元天寶年間中樞政局〉一文裡，李鴻彬認為，開元、天寶時期是唐代發展的鼎盛期，也是它走向衰落的轉折期，因而有關這一時期宰相中樞

的人事布局，是研究此關鍵不可忽略的問題，李鴻彬觀察道：

用人方法的改變，實際上正是開元中期以後政治形勢變化的反映。當時各種新舊勢力相互交織，不同利益之間紛爭衝突，而他們在朝廷中的代表者亦為自身勢力縱橫上下，分合聯結，形成了宰相多途，背景各異的局面。

103

玄宗奪情起復張九齡，張九齡因此掌開元朝中書令大位，但是張九齡乃出身嶺南邊鄙之一介平民，一朝平步政治權力核心，其代表了武則天以來迅速崛起的文學進士集團勢力，再者，張九齡能躋身上進，實與張說的舉薦有直接關係。〈舊唐書·張九齡傳〉：

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為學士，以備顧問。說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¹⁰⁴

就在開元中期以後，玄宗朝以「興利斂財」成為國家治理的首要推行政策，¹⁰⁵於是，開元 24 年起，玄宗在平息了蕭嵩與韓休的人事風波後，將政治中樞權力核心之三相安排為張九齡、裴耀卿與李林甫，不過此三者所代表的仕進背景截然不同，張九齡一路以文學之才進用，為唐代自武后而起的新興科舉仕進勢力，裴耀

¹⁰³ 李鴻賓：〈唐玄宗擇相與開元天寶年間中樞政局〉，《文獻》第 3 期(1995 年 12 月)，頁 75。

¹⁰⁴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098。

¹⁰⁵ 「開元八年後，隨著整個社會矛盾的演變積聚，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譬如土地兼併，色役偽濫，均田制瀕於崩毀，租庸調制弊端百出，軍事制度的變更踐損等等」。參見李鴻賓：〈唐玄宗擇相與開元天寶年間中樞政局〉，《文獻》第 3 期(1995 年 12 月)，頁 73。

卿取代宇文融拜相，其專才在於漕運，能夠確實解決京城糧食缺乏的問題，至於李林甫，原隸屬胥吏集團，能夠登堂入相，實依賴著玄宗寵妾武惠妃的裙帶關係攀附而得，所以在《資治通鑑》24年之紀事裡，當玄宗欲立李林甫為相，詢問張九齡的看法時，張九齡才語帶玄機地說道：「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

在〈諫廢三子〉一文裡，張九齡即緣李林甫暗合武惠妃的內廷情事而發：

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太子二王，皆以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欲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也，未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代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一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毀，黜太子勇，立少子廣，天下崩失。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召。臣忝居相職，陛下之事，臣事也，臣敢不盡心言之。¹⁰⁶

依上所言，張九齡直指玄宗打算廢太子，實是聽聞了無根之語，並且生發無根之語的人將以此言影響玄宗廢儲與立儲的人選，另外由「晉獻公聽驪姬之讒」及「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等史故，將針砭的矛頭分別指向後宮的武惠妃和朝廷中的李林甫，諫言之末以「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召。臣忝居相職，陛下之事，臣事也，臣敢不盡心言之」斬釘截鐵地向玄宗表明自己一心為主的赤膽忠心，不容質疑。不過在如此開誠布公的諫言裡，由於指斥的對象是玄宗的寵妾武惠妃，武惠妃寵冠後宮，其耳畔細語足以浸潤玄宗秉政心意，¹⁰⁷加以善養君欲的李林甫，著力邊

¹⁰⁶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119-1120。

¹⁰⁷ 諫廢太子事，《資治通鑑》詳載如此：「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馳；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瑒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

功與玄宗宮闈家事，執此周旋在玄宗與張九齡逐步貌合神離的君臣關係裡，搬弄君相柄政理念相左的矛盾。李林甫以為張九齡既是人臣，其柄政用心當不忤君意，而李林甫即以此用心寵盛玄宗：

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¹⁰⁸

玄宗面對張九齡無所畏懼的骨鯁直諫，即使不悅，卻仍未下定決心廢除太子，於是李林甫趁隙拉攏內廷宦官，由玄宗近身侍臣著手傳話，另一方面武惠妃亦著手向張九齡釋出聯手奪嫡的好處與善意，未料張九齡斥責武惠妃，轉身面聖，於是太子在張九齡的忠貞不渝下保住了儲君的位子，卻遭玄宗罷相。由諫廢三子事後，李林甫終於離析玄宗對張九齡長此以往的倚重，進而在開元 24 年接替張九齡的中書令一職，獨攬朝綱。

胡如雷在〈唐「開元之治」時期宰相政治探微〉，析論了玄宗擇相的幾項原則，其一在於「兼重才德」，尤其將德擺在首位；其二在於不輕易重用功臣；第三項原則在於盡可能不用皇親國戚為宰輔。¹⁰⁹若援此論三項原則，探察玄宗於開元後期，即張九齡任中書令之際，玄宗朝的權力中樞人事布局的揀擇與權衡，可說因諫廢三子一事後，玄宗罷相張九齡及裴耀卿，代之為李林甫和牛仙客，不僅

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參見(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臺北：世界書局，2012)，頁。此外，〈新唐書·張九齡傳〉：「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參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9。

¹⁰⁸ 同上註，頁 4429。

¹⁰⁹ 胡如雷：〈唐「開元之治」時期再向政治探微〉，《歷史研究》第 1 期(1994 年)，頁 66-74。

破壞了自即位以來的任人原則，更為自己的盛世王朝埋下衰亡之機。¹¹⁰

在開元 23 年，李林甫為了奪取玄宗對張九齡的寵盛與倚重，便在推介牛仙客入宰一事上，引起一場爭論：

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¹¹¹

就《資治通鑑》及兩《唐書》所載，在李林甫的極力周旋下，玄宗最終不顧張九齡的力諫固爭，仍然大封牛仙客為尚書相位，不過在《明皇雜錄》裡反而有言：「玄宗用仙客為相，頗憂時議不協」，甚至宦官高力士也對答玄宗：「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¹¹²可見得牛仙客初以財政器械的功績入相，但是在真正進入到朝政的權力決策中樞位置時，起不了決議與決策的作用。所以，胡如雷認為：「張九齡與李林甫之間的爭執確實具有忠賢與奸佞之爭的性質」。¹¹³

¹¹⁰ 《資治通鑑》開元 24 年詳載張九齡與裴耀卿罷相之原委：「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王寅，以耀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鄰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洛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

¹¹¹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116-1117。

¹¹² 《資治通鑑》亦言及牛仙客拜相後與李林甫同朝任宰的情形：「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參見(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4。

¹¹³ 胡如雷：〈唐「開元之治」時期再向政治探微〉，《歷史研究》第 1 期(1994 年)，頁 72。

開元 24 年，張九齡終因謇諤直言遭玄宗罷相，從此遠離玄宗朝的權力核心，是以：

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補闕杜璩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¹¹⁴

誠如司馬光於《資治通鑑》開元 24 年所評議，張九齡罷相除斷絕玄宗朝中忠良的諫諍之路，亦標誌著文學晉身之士被李林甫為首的胥吏集團的排擠，不過「開元末是一個大用計臣的時候，李林甫的得勢，不能完全歸之於他的狡猾，與他諫用牛仙客等計臣有關」。¹¹⁵

然則，若依玄宗的柄政原則為宰輔中樞互相制衡以為人事布局來看，¹¹⁶李林甫為求任相，發揮便佞善柔的性格寵盛玄宗，掖助武惠妃奪嫡¹¹⁷，在務除張九齡與裴耀卿等朝中忠良的目的裡，將政治手腕玩弄得淋漓盡致，因此，玄宗開元朝後期的政治風波與鬥爭，可說全在李林甫為求專寵固位，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且隨著玄宗春秋日高，在位日久，君心怠弛，使得宰輔中樞互相制衡的局面，到了李林甫和牛仙客任相之際，走向失敗。

¹¹⁴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3。

¹¹⁵ 胡如雷：〈唐「開元之治」時期再向政治探微〉，《歷史研究》第 1 期(1994 年)，頁 73。或者參見宋社洪：〈相李林甫是唐治亂之分嗎〉，《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25 卷第 1 期(2004 年 2 月)，頁 62-65。

¹¹⁶ 關於玄宗任命宰輔的人事策略，參見吳宏哲：《論君相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張九齡罷相為例》，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¹¹⁷ 《資治通鑑》言：「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啖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參見(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5。

三、謇諤直言：義無反顧，諫諍如流

在張九齡以諫名篇的敘述裡，張九齡以性直、言直指事進諫，因此在其諫言裡，雖不見張九齡文場大元帥的詞采風華，卻得見其身為開元朝一代賢相的骨鯁忠厚，及其字裡行間所顯露之忠誠謀國而無所畏懼的氣勢。

開元 24 年，張九齡因謇諤直言諫廢三子一事，遭玄宗罷相，後又因周子諒事，坐舉非其人而遠貶嶺南荊州長史，雖說張九齡的政治地位因李林甫黨的攻訐，自此遠離玄宗朝政治權力核心，不過其忠心侍奉玄宗朝 20 餘載，其九齡風度成為玄宗用人度才的衡量準則，〈新唐書·張九齡傳〉：「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¹¹⁸張九齡官至宰相，儀表風度卓爾不群，《開元天寶遺事》說：「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眾僚，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¹¹⁹

程宇昂從唐代選舉官員的一般標準和張九齡作為官吏楷模兩個方面解讀了九齡風度，其認為張九齡為官場人物，而九齡風度與唐代選官標準直接相關，所以九齡風度是在身、言、書、判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個性風采，也是躬行直道、堪為王佐、胸懷萬類的道德人格，故九齡風度是前、後二者合鑄而成的完人符號。

¹²⁰ 此就玄宗之言而論九齡風度，張九齡的儀表自為其外在風度之一環，然則從開元末期，張九齡身陷李林甫專權固寵的政治風波裡的義無反顧，諫諍如流來看，

¹¹⁸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9。

¹¹⁹ (五代)王仁裕撰：《開元天寶遺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 44。

¹²⁰ 程氏先由《後漢書》及魏晉南北朝、唐宋史料中，釋析了「風度」一詞，在他的闡明裡，他認為九齡風度契合了魏晉風度，皆強調了包括體貌在內的士的綜合稟賦的外現，與三代以下韜光養晦、注重內修，以禮為主臬的道德人格有著明顯的分野。參見程宇昂：〈九齡風度：個性風采與道德人格的合鑄〉，《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32 卷第 7 期(2011 年 7 月)，頁 9-13。

九齡風度更在於其如何議處、決策朝政時所一一展露的政治人格與風範。

職是之故，九齡風度實是含藏在一代賢相義無反顧，諫諍如流的審諤直言裡，尤其在其面聖直諫的言詞中，玄宗治世的盛衰在歷史進程的必然下，因由張九齡的諫言成其以文學見證的感性存在。



第四章 宦遊宮闕的序文書寫

張九齡拜相之時，玄宗即位歷二十三年，春秋日高，逐漸沉迷於開元治世的繁華太平，懈弛朝政。張九齡於開元 21 年至 24 年任相，任相不出三年，即為李林甫所構陷而遭玄宗罷相，謫貶荊州以卒。是以，張九齡的罷相遭貶，既是其個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亦是唐代治亂之所分的轉捩點。職此，本章節之所論述者，在於透過觀察張九齡的序、賦體式作品，由其撰作主題及內容關注他任官於玄宗朝期間，由士遇到士不遇之情志轉折下的文學審美觀照。

張九齡的序文創作是其散文書寫中文學色彩最濃厚的篇章，而其序文所涉及的内容，要有宴游、送別、紀事、題繪、頌贊和登高、感懷等，可說書寫範圍遠較公文類的詔告、敕書及表狀廣泛。至於序體類的文章，在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有言：「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其序事又有正、變二體，其題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敘，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¹此外，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說道：「《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²可知「序」或作「敘」，此類文體始於《詩》〈大序〉，其內容則是將事理有次序地述說，可以議論，也可以敘事。

余英時認為：「『序』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特殊的『文體』，至遲在蕭統編《文選》時已正式成立。如果通全部古典文學史而言，我們大致可以將『序』分

¹ (明)徐師曾纂輯：《文體明辨·序說》，(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 93-103。

²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 52-57。

為兩大系統」。³余氏所謂的兩大系統分別為，以游宴、詩會、餞送、贈別等場合的即興之作及為書籍所寫之序二者。

在《張九齡集校注》裡，以序名篇者有 13 篇，⁴就張九齡序文所書寫之對象與用途，主要又可蓋括為宴游送別及紀事感懷二類，以下將依此分項論述張九齡序文書寫所承載的面向，藉以探析張九齡在士遇與貶謫之間，如何經由序文的文學審美，觀照自身宦游宮闕時居處人生順、逆境的情志轉折。

第一節 宴游送別

開元 4 年張九齡時任左拾遺，曾作〈酬通事舍人寓直見示篇中兼起居陸舍人景獻〉一詩，表露了官卑位薄，無受上賞的消沉心緒：

軒掖殊清祕，才華固在斯。興因膏澤灑，情與惠風吹。所美應人譽，何私亦我儀。同聲感喬木，比翼謝長離。價以陸生減，賢慚鮑叔知。薄遊嘗獨愧，芳訊乃兼施。此夜金閨籍，伊人瓊樹枝。飛鳴復何遠，相顧幸媿媿。

5

此外，秉言直諫的張九齡該年又因為〈上封事書〉後的政治現實，以「封章直言，不協時宰」遭朝中權臣傾軋，所以萌生退意，於是開元 4 年秋後張九齡即去官歸養，返南歸韶賦閒在家，開元 5 年張九齡作〈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寫的便是幾位官場失意人在王少府東閣聚會宴飲以自我排遣的情形：

³ 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 124。

⁴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72-907。

⁵ 同上註，頁 82。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弦歌，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吊；窮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書？⁶

序文起筆以「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弊？」的理性分割，來叩問其身所遭受的時乖運蹇，並且援引「仲尼得之以弦歌，傳說因之以版築」二歷史事例，來期勉寬慰同為謫居之人的我輩，而此際的韜光養晦，皆為以待時日，不必自怨自艾，所以更應當效法古之聖賢，善處謫居逆境時的智慧。接著，張九齡筆鋒一轉，為此回聚會宴飲的友人們營造了一幅江山風月，如詩如畫的山水勝境，獻呈為謫居文人的精神仙鄉：

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為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既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倚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回合，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適。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咏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⁷

在 300 餘字有限的篇幅中，張九齡透過理性的態度來分析人生的時運不濟，續以歷史的事例比照開篇，作為在聚飲宴會中可引起大家共鳴的話語，其不落入哀時傷逝的自悼俗套，改以積極地順處逆境的期勉及呼告，並且透過詩情畫意的山水描寫，文旨在激起同儕們「放言」詠歌的情懷，亦以求得在觥籌交錯之中，拾

⁶ 同上註，頁 875。

⁷ 同上註，頁 875。

得聚會宴飲之內，彼此交心的快樂。

在〈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裡，張九齡起筆先敘及了景龍觀的來歷和變遷，讚揚玄宗的「抑華務實」，「設教以垂範」的功績，續以言及今日之宴游及其所見景龍觀的美景：

景龍東山，初主第也。始其置金榜，築鳳台，窮土木之功，極岡巒之勢，議與磐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翦，采椽不斲，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為列仙之館，其後常有好事，以為勝遊。今日芳辰，攜手接袂，往往而在，祇取樂焉。⁸

在此篇幅裡，張九齡以四六句式錯落行文，精簡扼要描述景龍東山的人文地景和景龍東山的美景，其先以3、4字數的短句，後為6字句，復又長而短的句式，一連數句，回環往復，縱橫排比，盡顯景龍山水碧山青的清麗景致予人目不暇給之感：

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修聳而垂彩，綠羅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緣石茵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概。⁹

序末則交代大家宴集之時，意氣相知，先後賦詩以贈之景：

⁸ 同上註，頁 883。

⁹ 同上註，頁 883。

既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杯有屬，却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迫如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何恨仳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¹⁰

覽觀全序，張九齡無論從景龍觀的人文地貌連結自然勝景，說明景龍觀地靈人傑的殊異，進而言明全序主題，送密縣高贊府宴集時的酒酣歡暢，皆可見其情緒高昂，尤以「聚必有散」之語，為高贊府瀟灑送行，序末之「相知意氣，何恨仳離」收束全序，一氣呵成，盡顯張九齡撰作此序時的快意，或可推知張九齡做此序之時，仕途順遂，意氣風發。¹¹

開元 4 年〈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張九齡因陪王司馬登山臨水之際，且王司馬有感於羊祜峴山故事而作此文。¹²全文以親臨薛公逍遙臺後所引發的懷古幽情起筆：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巋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¹³

在上述文字裡，張九齡筆隨景走，借古寫今，藉由遙想薛道衡當年登臨逍遙臺的

¹⁰ 同上註，頁 883-884。

¹¹ 據《何考》開元 25 年，認為：「此序撰作年月無可稽考」。不過，何氏從《唐會要》針對景龍觀的人文地理與命名來由考察，認為「此文必撰於公貶荊州以前」。參見同上註，頁 885。

¹² 《晉書·羊祜列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又載：「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參見(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90)，頁 1020-1022。

¹³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886-887。

失意情形言及王司馬今日登臨時的不遇情懷：

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為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¹⁴

張九齡在此段文字內直言「今司馬英達好古」的性格，於是王司馬今日登臨逍遙臺所引發的不遇情懷，便有了「懷古」的意識情態。廖蔚卿在〈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臨懷古」〉說道：「就『懷古』的意識情態而言，其基礎是建立於對人生的了解的歷史認知，也是對時間的流程中的過去、現在、將來的反省」。¹⁵又說：「『懷古』的意識情態具有道德責任的『憂傷』」。¹⁶是以見得「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之句，兩漢時期的賈誼、桓譚之譬況切中了王司馬心緒。

屬府庭閒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墟，指甌貉以南馳；雲合山川，踞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溪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為茂草。

17

此外，在上列這段文字中，張九齡以四、六句式交錯行文，歷述登臨逍遙臺所見之美景，而此美景經由季節光影的變化，遠眺所見之蓁莽、飛禽，近看之溪水、

¹⁴ 同上註，頁 886。

¹⁵ 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臨懷古」〉，《幼獅學誌》第十七卷第三期(1983年5月)，頁 104。

¹⁶ 同上註，頁 110。

¹⁷ 同上註，頁 887。

游魚，描繪出一幅詩情畫意，自然予人心曠神怡的性靈之美。序文末又言：

司馬公又以為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某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祇命為序，請各言詩。¹⁸

以王司馬感於羊祜故事欲興寄幽情，於是應命作序，張九齡以此舉深具王羲之蘭亭雅集之古風，既代以排遣了王司馬懷古後不遇之情，亦以抒發了「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的文士情懷。

開元6年春，張九齡被召入京城拜左補闕，主持吏部選拔人才，到了開元7年，改任禮部員外郎，在仕途順遂，平步青雲的任官心情裡，張九齡在開元7年所寫的〈韋司馬別業集序〉，筆觸顯得愉快而清新：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竹，左并宜春，山靄下連，溪氣中絕；此皆節公之有也，余固已聞之。¹⁹

文章起首先寫了別業的處所和美景，以「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總啟全文，下言鳥瞰遠眺之景，再寫群友相聚，主客盡歡的情形：

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跂彼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其七召，果獲於前期。乃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韋公方拭席見待，羞以藥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移

¹⁸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887。

¹⁹ 同上註，頁900。

景，閒步周林，翻飛自情，俯仰為得，斯亦吾儕之樂事，幸可而同也！²⁰

不過就在文章述其朋友歡聚之時，張九齡亦逐漸移筆描繪韋司馬別業的美盛於人眼前，其言：

扶陽餘慶，礪溪古迹，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澣芝蘭，馨香世襲，歎乃韋氏之懿業，是所為異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身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焚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迹繼前軌，將為龍以為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²¹

該段文字一連使用了6個4字式短句，寫出了韋氏別業的自然之景與物質之勝的相得益彰，語調顯得輕快而活潑，接續以「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身之貴，……」末句總結了文人雅士所嚮往的處世之道與生活方式。

張九齡開元13年作〈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此序起筆首言幽州重要突出的戰略地位，盡顯王長史此行赴軍肩負國家重任的地位：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憚軍佐，數求國良。以王公能，有命汝往，底其耕戰之事。介於將吏之間，則已聲籍天庭，氣雄遼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攜壺抱琴，留飲極於郊岐，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²²

接著描寫了眾人為王長史送別的場面，場面之盛大亦以見得王長史為世所重，接

²⁰ 同上註，頁900-901。

²¹ 同上註，頁900-901。

²² 同上註，頁898。

著則交代了送別的時節：

仲月暄矣，陽時貴若，植物之發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曰群萃，豈懷安於鹿豕；不曰垂堂，已載馳於原隰。孰不知西笑之美？況伊歲華！東征之勤，兼彼戎旅。蓋樂不遑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為用。今之作者，聞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²³

然而全篇序文最緊要處在於，「蓋樂不遑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為用」句來彰顯王長史「義不顧私」的用世精神，此為張九齡撰作〈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欲令世人讚揚、效仿王長史的用心。

至於〈別韋侍御使蜀序〉，張九齡以序文寬慰好友韋侍御遭逢謫宦，因而赴蜀一事，序文內言：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為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為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美，朝議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²⁴

文章起筆直書序文對象及其自身遭遇，並且以象徵君子品德的玉石來比喻好友韋侯，說明韋侯即使身遭困挫與坎坷，依然應命任官，無所遲疑，而張九齡寫道，其皆在於「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美，朝議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之故。

²³ 同上註，頁 898。

²⁴ 同上註，頁 903。

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輶，為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饒。或席次林援，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為無欲而自致，韋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為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²⁵

序文第二部分則說明此番與好友分別的情景及其個人心緒，莫則表明序文撰作緣由。另外，觀察此篇序文的行文句式，仍然以四六句式為主，唯使用了連接詞「而」、「或」、「然則」等，使得全文語氣舒緩起伏，錯落有致。

綜觀上述張九齡六篇宴游送別所作的序文，從撰作的篇幅來看，字數約莫落在二百至五百字之間，非為長篇，但是依各篇內容所示，其皆能在有限的字句裡，表明撰作緣由，使用精要確實的文字，敘述宴游送別之時的人、事、物、景，即如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所述：「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為上」。²⁶因此，可說「隨事以序其實」，是張九齡宴游送別類序文顯著的特色，而且其序文「隨事以序其實」的特色無不在要言不繁的文句中彰顯，更見張九齡的筆力道勁與深厚。

第二節 紀事題贊

張九齡在開元 4 年曾在朝獻狀請開大庾嶺路，因此玄宗讓張九齡以左拾遺內供奉的身分出使韶州，督責此項工程的具體施工。²⁷開元 6 年張九齡作〈開鑿大

²⁵ 同上註，頁 903-904。

²⁶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 52-57。

²⁷ 在熊飛先生對於張九齡史蹟及作品繫年的考證裡，他認為張九齡與大庾嶺開鑿一事是：「大庾

庾嶺路序〉，文內細述開鑿大庾嶺南路之所由來、施工過程及目的：

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業巖，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般，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財，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²⁸

序文起首從大庾嶺險要的地理位置與緊要的經濟交通地位，來敘述為何開鑿大庾嶺路的緣由，由於嶺東地區位處偏遠，是以急需聖聽德政為之謀劃，因此：

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阪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鑿耳貫胸之類，殊琛絕贖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為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千上雙，若斯而已哉？²⁹

此段張九齡自述奉旨督鑿大庾嶺路的經過，以精鍊簡要之筆，描摹出開鑿大庾嶺路時，山勢的蠻荒與險峻，亦言及邊疆族群百姓的服飾。末段則言〈開鑿大庾嶺路序〉撰作的目的：

嶺南路的開鑿早在『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即已開始，但工程進展緩慢。始建議開鑿南路者為誰，已不可考。九齡獻狀，應是就工程的具體施工等技術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所以，一般世所認為，張九齡即為最初建議開鑿大庾嶺南路者，實有所出入，實際而言，張九齡為此工程的具體督責者，所以後世始將此工程皆歸功於曲江公。參見同上註，頁 880。

²⁸ 同上註，頁 890-891。

²⁹ 同上註，頁 891。

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寢遠，絕垠胥泊，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³⁰

在〈張九齡開鑿大庾嶺新路的政治文化意義〉說道：「路通政令大通，有利於安定統一」。³¹因此，就開通大庾嶺路一事來說，一是暢通了南北交通，進而促進嶺南地區少數民族的交通往來與文化融合，對於玄宗朝而言，朝廷政令更能有效推行於嶺南各州縣，州縣勢力亦能朝向中央集權，由朝廷權力確實掌握，所以開通大庾嶺路對於唐朝治世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實是高瞻遠矚的一項擘劃與重要工程，所以張九齡於序末言：「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寢遠，絕垠胥泊，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撰作〈開鑿大庾嶺路序〉自有歷史意義之必要。

另一方面，張九齡在開元 4 年在朝獻狀請開大庾嶺路，於大庾嶺路開通後撰〈開鑿大庾嶺路序〉，無論是請開大庾嶺路，督責此工程直至為此新路作序，從其願意於個人官宦生涯做下如此耗時費心的政治思考，可見張九齡實乃一位卓富遠見、經世濟民的政治家。

此外，在張九齡十三篇以序名篇的文章中，其中有兩篇以動物和鳥禽命名者，分別為〈獅子贊序〉和〈鷹鷂圖贊序〉，此二文有別於宴游送別類序文的清詞麗句，張九齡在序文裡針對所頌讚之物，深入闡發，又能不拘於物，意在言外，別開生面。在〈獅子贊序〉裡，張九齡寫道：

³⁰ 同上註，頁 891。

³¹ 王若楓、尚紅：〈張九齡開鑿大庾嶺心路的政治文化意義〉，《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30 卷第 10 期(2009 年 10 月)，頁 11。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域，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³²

開篇即顯大唐德威遠播，四方來朝的鼎盛國力，因此遠方各國無不按時節進貢殊方異物，而其中即有獻「獅子」來朝者：

《爾雅》所謂「狻猊，如戲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群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耽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

33

張九齡從《爾雅》所記載者，溯源了中原文化對於獅子之為異獸的認識與理解，接著對獅子「信然絕猛者」的形象加以描摹，其說獅子威猛的外貌，特出於毛獸，絕非一般，又從獅子懾服百獸的眼神，強調獅子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的絕猛，而此段文字一連使用了12句的4字句式，對獅子的外型和精神做了生動貼切的喻寫，語氣顯得輕快活潑。

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綬、伏閑皂，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贖，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玩好；以為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異獒犬，

³²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906。

³³ 同上註，頁907。

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為之贊曰。³⁴

然而四方來朝獻獅子為貢禮，不僅止於「獻其方物」的物質本身，更在於「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說明玄宗治世以德惠威服異邦，所以殊邦異國無不來朝，然而當各國來朝，其所朝覲之貢獻，為何天子不加辭讓，即在於「明異方之臣妾」，所以大唐天子所重在於異邦臣服之儀，而非所獻朝覲之禮，是以「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玩好；以為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所以為侍臣者張九齡，自有其責，為之作贊，以明天子之恩澤，大唐國之威儀。

開元 25 年因有使臣進獻鷹鶻，後大唐朝廷命工人繪圖後，鷹鶻即隨渤海使臣放還蕃幫，所以張九齡之所序者乃為此圖。³⁵至於〈鷹鶻圖贊序〉開篇，張九齡從自身宏博的學養為該序釋其名義：

鳥之鷲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³⁶

先從《詩》所記載，對於鷹和鶻分別釋名，然而述至「鶻」鳥，以「物亦有遺」話鋒一轉，連續拋出二個疑問，續起下文：

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鈇鋒，顧視之間，燁如也。

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嘴，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

³⁴ 同上註，頁 907。

³⁵ 熊飛根據《何考》後又參酌《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卷認為，開元 25 年 4 月確實有渤海派遣使臣來朝獻鷹鶻。此事又衡之以同年張九齡貶謫荊州一事，熊飛認為〈鷹鶻圖〉當繪於張九齡貶謫荊州前。參見同上註，頁 911。

³⁶ 同上註，頁 910。

之勢。³⁷

在此段中，張九齡認為鷹鵄是「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便從其體態、顧盼描摹鷹鵄外型之剛悍，再以此鳥之勁翮，寫其神態與精神，所以說鷹鵄「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

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群噪無益。³⁸

接著，以鷹鵄與古之武士法吏譬況，認為是鳥乃人中之酷吏郅都，驍勇善戰的飛將軍李廣，擁有不畏艱險的勇氣與志節，如此即是鸞與鳳所不及，更遑論雞與鶴之輩，然而一般人卻認為鷹鵄無所用處，既無法登上廟堂作為犧牲，或是出入苑囿用為畋獵，是以張九齡說道：

然後知二禽之為用，眾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韙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³⁹

可知鷹鵄之所以為「眾鳥之絕倫者」，在於「風骨」，非在於世俗凡人眼中的堪為

³⁷ 同上註，頁 910。

³⁸ 同上註，頁 910。

³⁹ 同上註，頁 911。

實用者，要言之，鷹鷂之殊異於眾鳥，在於其有「意不群飛」，「不立垂枝」的不屈之志，此總總即是鷹鷂所以「才美」處。此外，若將〈鷹鷂圖贊序〉內文所敘之事理衡諸張九齡開元 25 年所遭遇的政治憂患，其由履登宰相高位，因與同朝任宰的李林甫不協，彼此理政時相齟齬，進而觸忤玄宗君意，一夕遭貶為荊州長史的史實來看，該序文所言者無不對應著張九齡自身遭遇的政治處境，是以藉鷹鷂喻己，撰作〈鷹鷂圖贊序〉以抒發胸中塊壘。

第三節 清新淡雅，文采雍容

顧建國在論述張九齡序文特色時，說道：「『隨事以序其實』，是九齡贈送宴集等序文的一個顯著的特點」。⁴⁰而顧建國此說法無乃援引自明朝吳訥《文章辨體序說》的說法：「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⁴¹綜觀《張九齡集校注》所收錄的 13 篇序文，內容儘管含涉宴游、送別、紀事、題繪、頌贊和登高、感懷等，然主要可歸為宴集送別和紀事題贊二類。

在宴集送別的序文裡，無論是贈人以言，或是應命而作，張九齡皆能以精鍊之筆，在有限的篇幅裡，詳實的交代宴集送別的人、事、地、物、景。諸如〈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的「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咏蟋蟀而傷儉」，〈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的「青林修聳而垂彩，綠羅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的「其遠則煙連井墟，指甌貉以南馳；雲合山川，踞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溪見底，鱗介之所

⁴⁰ 顧建國著：《張九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12。

⁴¹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 52-57。

出沒」，〈韋司馬別業集序〉的「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身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焚枯」，〈別韋侍御使蜀序〉的「自廷尉評為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這些文句也許是因人而發，因事而寫，或隨景描摹，張九齡皆能化用文獻典故，自為清詞麗句，準確的掌握序文所書寫的對象來揭示主題。

此外，在紀事題贊的序文裡，〈開鑿大庾嶺路序〉卓有以文為史的用心，是在文句的經營上，即以詳贍事理為主，到了二篇以珍禽異獸名篇的序文〈獅子贊序〉和〈鷹鵠圖贊序〉裡，張九齡借物說理、托物言志，不拘於物，別開生面的對於所敘之物，有所發揮，例如〈獅子贊序〉的「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將獅子令百獸皆伏的絕猛形象，寫得活靈活現，又如〈鷹鵠圖贊序〉的「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賦予鷹鵠「眾鳥之絕倫者」堅毅不屈的形象。

由上所述可見，張九齡以其宏博深厚的儒生學養及其為玄宗所識的文采，⁴²確實於序文內一展其長於辭藻的文士風華，就其序文所書寫的主題來說，可謂言廣情深，若就其序文所寫的文句來看，描物摹景清新淡雅之餘，盡顯文采雍容。

⁴²《舊唐書》：「玄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參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096。

第五章 詠物寫志的賦作書寫

士遇或士不遇，往往不是單一人物或事件的推致，即使如此，亦常潛伏著禍福相倚的肇端。再者，深獲上賞而宦途順遂或不協君意遭遷官貶謫，許是為人臣子，稟命朝廷之際，所應深諳之官場哲學，而張九齡仕宦於玄宗朝 28 年，自玄宗即位，勵精圖治，舉天下文藻之士，張九齡對策高第，復以文學晉左拾遺，此後，他的仕宦之路可謂順遂，更於開元 21 年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直抵皇權統治的核心，然則平步青雲之中，張九齡亦曾數次遭貶謫外放而出任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及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在《張九齡集校注》裡，有二篇詠物賦，分別是〈荔枝賦并序〉和〈白羽扇賦并序〉，《文心雕龍·詮賦》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¹明言賦體文學使用鋪敘的手法體察事物為文，又《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²，而《隋書·經籍志》：「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聘辭，情靈無擁者也」，³究此二書所載之言，皆可以「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的說法為之闡釋。⁴然則「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此「登高能賦」不盡然是士人足履山川之高覽觀勝景所興之感懷，更許是士人待詔金鑾殿，應對君王聖意，因物聘辭，盡顯文采之作。

因此，將此二篇詠物賦對照張九齡的仕宦生涯，合併考察，在其「登高能賦」的文學書寫裡，如何由潛藏著士遇的焦慮下應對、居處世變的困境，並且在士遇

¹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 137。

² (漢)班固著，《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五》，(臺北：鼎文書局，1986)，頁 1755。

³ (唐)魏徵等撰：《新校本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頁 1090。

⁴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 138。

與世變下，經由體物言志的賦篇書寫，次第向後世折射出文士、良相與騷人多重身影的曲江蘊藉。

第一節 鋪寫南嶺之珍

開元 15 年，張九齡在貶謫洪州、桂州期間撰作〈荔枝賦并序〉，全文依體製而言，分為序和正文，頗具賦體完整的構篇形式。但序的部分，以散體寫成，明顯有別於正文以四六句式行文的駢體形式。在序文部分，張九齡以簡練之筆，明言荔枝所生長之地理位置與季候，針對荔枝的外形、味道以「狀甚瓌詭，味特甘滋」扼要的把握此果的神韻，並以「百果之中，無一可比」極言荔枝冠絕百果。

不過，張九齡為何對荔枝此果知之甚深呢？其先言，過往在中書省時，便曾對荔枝讚譽有加，但是朝中同僚卻一無所聞，唯獨中書舍人劉昇因「經于南海」，所以瞭解此果之甘美特出：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惟舍人彭城留侯，弱年遷累，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喜歡，以為甘旨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閑議，欲為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⁵

然而一般人對於荔枝的不熟悉，又將龍眼與之相比，續從援引魏文帝史事，仍見

⁵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415-416。

對於荔枝認識的謬誤，於是，張九齡藉此說明撰作〈荔枝賦〉的原因，實在於中原凡俗，不瞭解出於南海郡的荔枝之妙，此賦有以專為荔枝正名、釋名而作的用心。然其於序末說道，早先因為在中書省處理政事繁忙，有所拖延，無法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是以遂志，由此便可知，張九齡實已經由〈荔枝賦〉一序，表露自己所以閒暇，即在於離開中書省的朝廷要職，而身遭外放的貶謫事實，所以，〈荔枝賦〉可說是一位出身南方，擁有南海視野的文士張九齡，極欲向固守北方，久居中原世族的統治階層，借物抒懷的情志書寫。

而序中「理郡暇日」所指，即是張九齡貶謫洪州都督任內，此事最早可溯及開元 13 年諫張說勿私公器一事。⁶其原出於張九齡公忠體國，耿介直言，犯顏直諫，卻受張說私授公器的政治牽連，遭受玄宗外放疏遠，這對初次仕宦於玄宗朝的張九齡而言，無乃開啟了張九齡認識現實政治的視域，並且成其往後仕於玄宗朝的政治試煉。所以，在〈荔枝賦〉序末之言，可看出張九齡借物抒懷，以荔枝自比的口吻：

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⁷

那麼，以〈荔枝賦并序〉抒發此番坐連政治的無端迫害，此中的失意與憤懣之情，張九齡將是如何梳理，亦即在鋪采摛文之餘，其如何體物以寫志？在〈荔枝賦〉

⁶ 張九齡初登玄宗朝仕途，因為有時任中書令的張說與通譜系，使得張九齡藉以躋身上進，深受張說的提拔與重用，因此張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不過開元 13 年，張九齡卻上諫張說勿私公器，其言：「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也。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而此事起因於開元 13 年，玄宗東巡行封禪之禮，《舊唐書》說：「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時任宰輔之首的張說位高權重，欲假玄宗封禪泰山大典，行私賞親故小吏，並且令張九齡草詔，將此事看在眼裡的張九齡，不顧張說拔擢其在先，直接聽命其事，反而向張說直諫。後因張說趨炎附勢、貪汙納賄連帶張九齡自身也由中書舍人坐貶太常少卿，身陷張說罷相的政治風波裡，其後改任冀州刺史，後為奉養老母，上表陳請換江南一州，玄宗優制許之，所以開元 15 年，授洪州都督。

⁷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416。

開篇，其先以「果之美者」為荔枝在水果的總類裡，立定評價，再針對荔枝所生長之地，荔枝果的外表形貌，以及荔枝樹作一番鋪陳與描繪：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時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不合圍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紋紺理，黛葉緗枝，蒼鬱而霽霽，環合而棼纒。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於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⁸

賦篇起首，從生發、孕育荔枝的天然地理環境，來說明張九齡為何認為「果之美者，厥有荔枝」之理，且說明之前關於荔枝的記載有的是錯誤的，接著話鋒一轉，以「何側生之見疵」為荔枝發出不平之語，續以說道：

爾其句芒在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固微文而妙質；蒂藥房而攢萃，皮龍麟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猶不可定。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眾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准，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侘。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之湘橘？援蒲桃之見擬，亦古人深疾。⁹

此段對於荔枝果實的外殼與果肉，甚至氣味，從形色與滋味作了貼近而生動的描摹，以「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固微文而妙質」，顯明荔枝不重外貌，卻富含內蘊的特質。然而，此「敦本微文」之果，只有在去除外表後，啖

⁸ 同上註，頁416。

⁹ 同上註，頁416。

嗜果肉之際，才能使人驚覺此果之妙質，且此妙質竟在於，「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堪可神於天降甘露，怎可將之與湘橘比擬，亦回應了序文裡，「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及「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的「傳聞之大謬也」。

若乃卑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快。信雕盤之仙液，時玳筵之綺續；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治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之為最！¹⁰

至於荔枝此果是否能登上大雅之堂，宴饗嘉賓，張九齡認為荔枝不僅可以，還可以使人在大啖之餘，身心舒暢安泰，宛如瓊漿玉液，即使吃上百來顆，更能補中益氣，調理五臟六腑。所以，荔枝當是令人喜愛，甚至「雖不貪而必愛」，即便李子、瓜果在前，荔枝也毫不遜色，一果獨秀。

夫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可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遇，孰能辯乎其中哉！¹¹

是以，張九齡認為荔枝如此佳果，「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卓有佳用，然而「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張九齡慨嘆荔枝如此美好卻生於偏遠之地，在嗟歎荔枝命運不遂的同時，其意在言外，實在於同時慨嘆自身遭逢士不遇的失意與憤懣，尤其此番是忠而被貶，所以又說，「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借荔枝明言自身無受上賞，遭逢貶謫的心情。最後又將荔枝比之柿子

¹⁰ 同上註，頁 416。

¹¹ 同上註，頁 416-417。

和梨子各有所賞識者，奈何荔枝卻無？更是將其無語問蒼天的無可奈何，失落之情的無可名狀，一語道盡。趙君偉認為，張九齡對於荔枝的興發之情，來自於荔枝結合了張九齡的嶺南印記與感遇情結，尤其，連結嶺南印記與感遇情結的中間環節是荔枝本身特殊的生物種性與性狀以及張九齡投注自我於其中的人格精神與力量。¹²

張九齡在開元 15 年貶謫洪州時期，曾有詩〈在郡秋懷二首〉，在該詩(其一)有言道：

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戈效，忽復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¹³

可說張九齡以詩言志，傾吐了自身遭天子疏斥的不平失望之情，溢於辭表，尤其詩中自言直道事君，朝廷卻蘭艾不分，一方面又感於自身「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半百之身倏忽於官場，蓋有「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的憂慮與焦慮。詩之(其二)更進而言之：「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¹⁴因此，若將此二詩與〈荔枝賦〉內文對讀觀察，張九齡面對官場政治現實在寥落憤懣不平之際，亦意識到官場的險惡與自身遭貶的主、客觀原因，無非在於「遇」與「不遇」的機運偶然。

〈荔枝賦〉末言，「亦因人之所遇，孰能辯乎其中哉」！張九齡道此語以自解，亦是其在這次面對官場困頓之際的處世思考與寬慰自我的體會，誠如《史記·

¹² 此觀點參考自，趙君偉：《荔枝題材與意象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 42。

¹³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20。

¹⁴ 同上註，頁 322。

佞幸傳》開篇所言：「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¹⁵ 可說，對於致身宦達之人而言，努力固是必然，然而機運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此，士遇與士不遇，關鍵在於人的機運，其中奧妙，怎可是言語所能道盡。

趙君偉在《荔枝題材與意象文學研究》指出：

詠荔文學在初唐整個文學中十分暗淡，但在其自身的文學演進中卻又有它自己的特點。中原人士丁儒於八世紀左右在閩地所作的《歸閑詩二十韻》是荔枝在唐代文學中的首次亮相。嶺南人士張九齡的《荔枝賦》，遙接東漢王逸《荔枝賦》，運用比興寄託的手法，書寫其強烈的政治『感遇』情結，至此，荔枝終於在文學中成為詩人、士大夫『興寄』的對象。¹⁶

自張九齡〈荔枝賦并序〉一出，宋代名臣李綱亦有〈荔支賦有序〉，唱和張九齡賦荔枝之美，並針對張九齡賦荔枝的感遇情志有所發揮，至於南宋范成大〈荔枝賦有序〉、明代黎遂球的〈荔枝賦〉、胡宗華的〈荔子賦〉等賦篇，則專務於詠荔枝的形貌及其生長環境。¹⁷

第二節 辭寄篋笥弱羽

開元 24 年，張九齡作〈白羽扇賦并序〉，據其自序所言：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某與焉，竊

¹⁵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2010），頁 1332。

¹⁶ 趙君偉：《荔枝題材與意象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 11。

¹⁷ (清)陳元龍輯：《歷代賦彙》，（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 1688-1691。

有所感，立獻賦曰：¹⁸

可知張九齡作此賦原出於玄宗賞賜白羽扇後而為，然自序中言及「竊有所感」，是以「立獻賦」，其因何事而有所感必須獻賦？開元 24 年，張九齡時任宰相，宦途順遂，權傾一時，然因極力阻撓玄宗以尚書職封賞牛仙客一事，造成君臣秉政理念不協，亦使君臣關係產生嫌隙。《新唐書，張九齡傳》詳載此事之經過：

(帝)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¹⁹

在上述史傳文字中，可見得封賞牛仙客一事，之所以能掀起開元 24 年玄宗朝巨大的政治人事波瀾，除了從張九齡與唐玄宗君臣之間的對話透露端倪外，李林甫向玄宗的進言，更是使玄宗貶斥張九齡，罷知政事，左右朝政的關鍵人物。《新唐書·張九齡傳》說道：「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²⁰張九齡骨鯁為相，面對在位日久怠弛朝政的玄宗，其議論必極言得失的性格，卻埋下自身與玄宗君臣關係危急、決裂的伏筆，至於罷相外貶荊州，反觀李林甫為相，卻是「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²¹於是，一切波瀾無非同朝任宰的同僚李林甫的別有居心，趁此嫌隙善巧便佞聖意撩撥而來。

¹⁸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413。

¹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8。

²⁰ 同上註，頁 4429。

²¹ 同上註，頁 6347。

所以，推究張九齡撰作〈白羽扇賦〉的主、客觀因素，可說「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²²既知「帝賜白羽扇」已有「秋扇見捐」之意，一方面又擔心受李林甫危害，命在旦夕，所以在不能不寫及不得不寫下，向玄宗獻呈〈白羽扇賦〉，以賦明志，吐露明哲保身之意。在〈白羽扇賦〉開篇即言：

當時而用，在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采畫文章；復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眾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而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²³

「當時而用，在物所長」，張九齡以此句總啟全賦，更是將白羽扇的價值明白指出，此即在為「時」所用，才是實用，此物才具有存在的必要。其再針對玄宗所賜之白羽扇的材質、形構作一番描摹，不過「惟眾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而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即言若非深受上賞，以區區白羽扇，如何出入宮廷，朝天闕。可說，張九齡已然以白羽扇自況，所以在賦末極言深獲聖恩，縱使殺身不忘，即使秋扇見捐不為時用，仍懷聖恩以終的心情。賦篇採取如此戒慎恐懼的口吻，且看玄宗御批如何答覆：

朕頃賜扇，聊以滌暑；傾立賦之，且見情愴。詞高理妙，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筥，義不當也。²⁴

²² 同上註，頁 4429。

²³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413。

²⁴ 同上註，頁 413。

玄宗在批注裡，絲毫不涉及朝廷其時發生的政治紛擾，先是就賞賜白羽扇一事，全為消暑，不為其他，又見張九齡立獻〈白羽扇賦〉，表示依然賞識張九齡的文采，唯「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當也」一句，最是玄宗意味深長的答覆，也是《新唐書·張九齡傳》所謂「御批優答」之處，玄宗此語表明白羽扇自有用處，亦在寬慰張九齡勿以白羽扇自況而妄自菲薄。

然則，究論此番政治現實的陰影，卻是在李林甫隻手擺弄下，鋪天蓋地而來，《新唐書·李林甫傳》詳載此事：

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慄。²⁵

由「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慄」可見得李林甫為顧寵市權下陰狠性格之一面，是以張九齡在此事件中對於李林甫不能不有所忌憚與防範，於是就在其獻呈〈白羽扇賦〉之時，亦寫了〈咏燕〉詩一首致李林甫：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²⁶

張九齡以海燕自比，託言「海燕何微眇」，又於詩末以「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一語，向李林甫明言無意在官場與之相爭，以此詩緩解李林甫的恚怒，躲避

²⁵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6344。

²⁶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79。

殺身之禍。

張九齡一生仕宦於玄宗朝長達 28 年，幾回政治牽連，仕途或遷或謫，然而開元 24 年既是張九齡士遇生涯的高峰，卻也是其由士遇到士不遇的分水嶺，張九齡於此年遭玄宗罷知政事，謫貶嶺南荊州，可說開元 24 年對張九齡來說，是與其忠心侍奉一生的君王唐玄宗，君臣關係劇烈生變的一年，因此，就在〈白羽扇賦〉獻呈之後，張九齡的處境誠如自身於賦中所預言：「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自此不為時用，遠離玄宗朝的權力核心，南貶荊州。

開元 25 年，張九齡罷相到任荊州，有詩〈荊州作二首〉，(其一)有言：「士伸在知己，已況任於君。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千慮且猶跌，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²⁷即吐露了自身罷相無受上賞，有志不得伸下士不遇的憤懣，而(其二)詩言：

千載一遭遇，往賢所至難。問余奚為者，無階忽上搏。明聖不世出，翼亮非苟安。崇高自有配，孤陋何足干。遇恩一時來，竊位三歲寒。誰謂誠不盡？知窮力亦殫。雖致負乘寇，初無挾術鑽。……。胡為復惕息，傷鳥畏虛彈。²⁸

張九齡即使罷相驟貶嶺南，心中依然感懷往昔遭逢明主，拔擢高位的知遇之恩，自言豈敢不殫精竭力，知恩圖報，然而，「傷鳥畏虛彈」極言罷黜後，自身惴惴不安，心有餘悸的心情。

綜上所述，可見得〈白羽扇賦并序〉凝鍊了張九齡士遇到士不遇的多重身影，

²⁷ 同上註，頁 315-316。

²⁸ 同上註，頁 318。

身為一代良相的張九齡，接受玄宗賞賜白羽扇之時，既知君賜該物，意有所指，且意在言外，欲以白羽扇作為試探，所以為人臣子不能不獻賦以謝恩，然一方面，包裹在忠臣良相之下的文士騷人張九齡，深知白羽扇此物的價值即在於為時所用，而當時過境遷，終有見捐納篋的時候，因此如何維持著最美好的身影並且得到保存，張九齡有不得不透過白羽扇自況以全身而退的焦慮與憂慮，於是透過體物寫志，鋪采摛文的賦篇，藉由純文學的口吻抒發遣懷，也可說張九齡透過文士騷人的感性心曲以抒情的對應政治現實的冷峻，成其為仕宦歷練下的理性與智慧。

第三節 睹物興情，情以物興

根據熊飛校注的《張九齡集校注》所收錄的張九齡文學作品，唯有〈荔枝賦并序〉和〈白羽扇賦并序〉二篇賦作。此二賦篇，皆以詠物作為題材出發，一以詠水果，一以詠器物，張九齡在此二篇賦中，體物、狀物進而感物，可說，其透過對於物質的感性理解以表達主觀的情感，例如〈荔枝賦并序〉：「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固微文而妙質」，又如〈白羽扇賦并序〉：「當時而用，在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廖國棟認為詠物賦在於：「以吟詠物之個體為主旨之賦，謂之詠物賦。此類篇賦乃作者有感於物，而力求『體物』、『狀物』」。²⁹另外，白承錫在〈詠物之開拓與轉化〉論述道：「初唐詠物賦所詠之物雖多為傳統的常見之物，但往往從不同的視角，對物的題材作了深入開拓，由此又昇華了賦的主旨」。³⁰又說道：「初唐詠物賦繼承和發展了詩、騷的『興寄』傳統，注重物、情、理融合」。³¹

²⁹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13。

³⁰ 白承錫：《初唐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頁190。

³¹ 同上註，頁195。

因此，在睹物興情，情以物興的寫作脈絡下，將此二篇詠物賦對照張九齡的仕宦生涯，合併考察，即見賦篇內容潛藏著張九齡士遇的焦慮下如何應對、居處世變所遭遇的困境，尤其此二賦篇，皆作於張九齡仕於玄宗朝期間之開元 15 年與 24 年先後二次貶官時期。

二次貶官前後相距十年，然則在〈荔枝賦〉裡，張九齡娓娓道出的是初次貶官的困頓，在於朝廷蘭艾不分，年近耳順之年卻無受上賞的憂慮，口吻頗為自憐。在〈白羽扇賦〉中，張九齡履登玄宗中書省宰相高位，卻因聖主明君在位日久，怠弛朝政，加以李林甫顧寵市權，左右聖聽，在君臣秉政理念不協中，黯然的落入李林甫設下的罷相險局，是以〈白羽扇賦〉在銘謝聖恩之餘，無非力求明哲保身，語氣則顯得臨淵履薄，戒慎恐懼。

職此而言，張九齡撰作〈荔枝賦〉時，鋪寫著的是初次遭逢貶官的士不遇情志圖像，而〈白羽扇賦〉卻觀照著其自身由士遇再次走向士不遇的政治視域，以及個人絕意於玄宗朝廷後所遁入的情志異域。若從宏觀的歷史演變來看，張九齡開元 24 年再次的士不遇，既顯明耿介骨鯁之士，諫諍言路斷絕，而使佞聖意者，獨攬朝綱，專斷妄為，亦預言了大唐治世由盛轉衰的開元世變。

第六章 張九齡仕宦書寫的主題

本章奠基於前述四個章節所論述之張九齡仕於玄宗朝期間的文、賦書寫而展開。而在此章裡，論題所欲關注之處則在於，綜合考察張九齡仕宦生涯的書寫裡，其在寫作意識與構篇審美上，是否有著一貫而相似的撰文主軸與關懷重心。因此，本章節擬從士不遇諫諍意識及美刺書寫的審美觀照，此二視角來釐析張九齡仕宦書寫的主題。

第一節 士不遇的諫諍意識

《新唐書·崔群傳》有言道：「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明。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¹世來論斷唐祚盛衰二分之由肇因玄宗朝之安祿山叛亂，然而，崔群獨以為開元 24 年玄宗罷相張九齡，專任李林甫，如此「遠正士，昵小人」是理亂之所分的關鍵。而對於躬逢這一唐治世由盛轉衰階段，見證此一漸變過程的張九齡來說，其仕宦於玄宗朝期間所書寫的散文，即使絕大多數為應用文類的公文，具有發人深省的意義。

一、士伸知己，任君報恩

探究張九齡仕宦書寫的中心意旨，無非可先以其在開元 25 年罷相後，貶謫嶺南，到任荊州所作的〈荊州作二首〉（其一）一詩，一窺其士遇玄宗朝半生後的

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5081。

官場心跡：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況仕於君。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失，事往良難分。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勳。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千慮且猶跌，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眾口金可鑠，孤心絲共焚。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古劍徒有氣，幽蘭祇自薰。高秩向所忝，於義如浮雲。²

全詩以「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況仕於君」表露任官初衷與事君志向，由「千慮且猶跌，萬緒何其紛」一語帶過任官時期所遭遇的紛擾，卻以「何其紛」凸顯這一切紛擾盡在不言中之感，「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則言坐連監察御史周子諒彈劾牛仙客一事，因引薦失才進而貶官荊州長史，「眾口金可鑠，孤心絲共焚。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面對官場毀譽讒言，心情如治絲越理越亂，詩末自言，現下其身如敗軍之將，無以言勇，於是無奈的慨嘆官場這一切若是取之不義，那麼富貴對於自己便如浮雲。張九齡透過該詩以自我排遣罷相後的失意與寥落。

從詩中張九齡所言，隱約可推知，開元末玄宗朝的朝廷政治氛圍已然今非昔比，首先在於，如張九齡輩者的有志之士無以盡忠報國，言路盡斷，即使張九齡位高權重，身為中書省門下宰相，面對朝廷日漸詭譎的政治生態，依然有「千慮猶且跌」的憾恨，更遑論其他官階不如其位者；其二則在於人事鬥爭與朋黨勾結足以乖違朝堂，加以有心固寵之人的讒言毀譽，於是在〈荊州作二首〉（其一）詩裡，張九齡雖然只能「幽蘭祇自薰」，以獨善其身自姿，聊以自勉來排遣罷相的愁緒，然則循此心跡，毫不諱言地指出，開元末期的玄宗朝可謂潛伏著盛極而

²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15-316。

衰的世變暗流與國危家變的徵兆。因此，若由此詩來分割張九齡的仕宦書寫意識，可說當其仕進為官時，當在伸志報恩，當其不遇身退時，則意在諫諍謝恩。

張九齡仕宦於玄宗朝 28 年，因才見用於唐玄宗，以文學晉左拾遺，於是躋身朝廷，更於開元 21 年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直抵皇權統治的核心，歷官拜相至於貶卒。可說，他仕宦生涯裡的高峰與低谷，同玄宗朝之任事，密切相關。而在他任官期間，依熊飛校注之《張九齡集校注》所收錄者，其中公文 255 篇，包括詔告敕書 125 篇、表狀 67 篇、策書奏疏 13 篇，其他篇則是序 15 篇、祭文 9 篇、碑銘 17 篇、頌贊 4 篇和賦 2 篇。

在這些篇幅中，除了〈荔枝賦并序〉和〈白羽扇賦并序〉此二賦篇，可視為純文學的作品，其於幾乎是應用文類的書寫。換言之，這些大量的應用文書寫，無非一一縮合、連綴了張九齡仕宦生涯盡忠事上，經世濟民的任官思想與撰作脈絡，亦摹寫了玄宗朝開元治世由盛而衰的漸變過程，因而也唯有比對、研讀這些公文書寫，才能體現出張九齡仕宦書寫視域裡士遇與世變的文學圖像。

爬梳張九齡仕於玄宗朝 28 年的官宦生涯，可以景龍元年至開元 14 年前及開元 14 年後至開元 22 年分為二階段來考察其仕宦生涯的書寫主題與情志轉折。若以開元 14 年前作為觀察張九齡仕宦書寫的第一階段，其任官歷程由景龍元年，因「才堪經邦科」，授祕書省校書郎(九品官)，專掌校勘書籍、訂正訛誤之事，於先天元年，應「道侔伊呂科」，遷為左拾遺，不久由左拾遺升遷為左補闕，再於開元 7 年，改授禮部員外郎，開元 8 年，轉任司勳員外郎(從六品上)，在開元 12 年，加封曲江縣開國男，直到開元 14 年，受到張說私授官爵遭彈劾罷相一事牽連，貶官外放出任冀州刺史。

如此可說，在張九齡任官最初的 20 年裡，雖然官階品秩不高，然而因近身朝堂，且由於官職之便，大量的接觸中央官方書籍，使得張九齡得以學習朝堂事務，尤其在擔任左拾遺期間，以忠言直諫上書，間接參與了朝堂政務，此皆為其之後蹈履宰輔高位，協理玄宗朝政，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開元 14 年，張九齡因張說事，遭逢入仕以來第一次的貶謫，除了在心態上的無端遭受波及牽連的憤憤不平外，還因為此番貶謫在於由京城外放任官，由於唐人任官普遍存在著「重京官，輕外任」的心態，所以，即使冀州刺史為從三品官階，但對於張九齡而言，不啻是一回宦宦生涯的重大頓挫，亦開啟了張九齡居處進退政治現實的視域。

直到在開元 19 年玄宗詔其回京之前，從開元 15 年授洪州都督，開元 18 年改赴桂州任桂州都督為止的 5 年時間，張九齡沉潛此際，排解憂慮，以待時運與機遇。張九齡於貶謫洪州期間曾有詩〈與弟游家園〉：

定省榮君賜，來歸是畫遊。林鳥飛舊里，園果釀新秋。枝長南庭樹，池臨北澗流。星霜屢爾別，蘭麝為誰幽。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棲棲將義動，安得久情留。³

又如〈答嚴給事書〉所言：

今專典一州，蓋幸遇已甚；……。昔賈誼才偕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梁傅，班固猶云為未遇；況僕非其倫，遇已過彼，故多慚色，豈敢怨而更求歟！……。顧恨上負名主丘山之恩，未有涓塵之答；下愧知己提獎之力，卒無知言之效。又平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徒，

³ 同上註，頁 160-161。

退有後議，竟不獲盡展所有之用，以塞罔極之讒，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⁴

蔡阿聰在《論盛唐文人的論謫心態》說道：

這才是張九齡貶謫中最為本質的心態，其他的心態特點，諸如對仕途坎坷的牢騷不平，辭官歸田和對世外境界的嚮往，嗟老歎衰甚至思鄉之情，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這裡找到源頭。也正是這種對君主的忠心和報恩的思想，使他作品中多次出現理政無方、不堪大用的自謙自抑之辭，雖然其中也不乏仕途失意的牢騷與不平。⁵

從蔡阿聰上述的論述裡，其明確地指出，張九齡面對士不遇下的消極思考，乃在於，張九齡為官秉持著對君主的忠心和報恩思想，因由這盡忠報恩的仕宦心態特點，所以在貶謫的遭遇下，發散於其文學書寫之中，也可說成為張九齡仕宦書寫的一個重要面向。

開元 19 年，玄宗詔張九齡回京，命其為祕書省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一展文采長才，開元 20 年，張九齡官拜工部侍郎兼知制誥，專管皇帝起草詔令，開元 21 年，玄宗擢張九齡為中書侍郎，同年下詔張九齡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 22 年，張九齡拜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此為張九齡官宦生涯的第二階段，卻是張九齡位極榮寵，與玄宗君臣一心，相偕柄政的時期。⁶

⁴ 同上註，頁 861-862。

⁵ 蔡阿聰：《論盛唐文人的論謫心態》，（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4），頁 36。

⁶ 張九齡任官生涯的官職與繫年參考自吳宏哲學位論文附表，吳宏哲：《論君相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張九齡罷相為例》，（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82-87。

總其 28 年宦宦生涯裡的公文書寫，其中占據張九齡公文書寫絕大多數的散文形製是詔告敕書，其次為表狀。而詔書，是皇帝詔告天下的文書，至於敕書，是皇帝用以諭告慰勉公卿、警戒約束眾臣的文書。《文心雕龍·詔策》說：「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宸，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⁷此言詔書既是文學書寫，卻非純然按照主筆者意識的文學創作，而是代擬王言者在揣摩上意的政治語境內所作的詮釋與書寫，《文心雕龍·詔策》又說：「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⁸便詳述了詔告敕書的撰作原則及書寫風格。

再來，張九齡自以文學晉左拾遺起，時常上書玄宗，忠諫直言，而上書之體用在《文心雕龍·奏啟》說道：「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於上也」，⁹上書不僅止於臣下對君上滔滔不絕的一陳己見，其書寫要點與陳奏之言，必須以誠為本，所以，「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案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¹⁰

無論是代擬王言的詔策或是臣子上書君王的奏啟，據《文心雕龍·詔策》所述，觀察張九齡此類的應用文書寫，諸如勤於王事，勸君郊祀所寫的〈南郊敕書〉裡所言：「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

⁷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 371。

⁸ 同上註，頁 372-373。

⁹ 同上註，頁 439。

¹⁰ 同上註，頁 439-440。

下」，¹¹或是治國內政所需而寫的〈敕處分十道朝集使〉：「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與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¹²擔任宰輔時期處理外交事務的〈敕渤海(郡)王大武藝書〉第4篇：「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遠，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¹³和〈敕突騎施毗伽可汗書〉：「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為。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舊，朕即棄舍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¹⁴無論是內政、外交事務上，顯然可見張九齡皆能透過奏章、詔敕此二類公文書寫載體，準確地站在執行玄宗柄政意志的視角下綜理朝廷政務。

張九齡因公務需求所撰的詔告敕書，可大致劃分為治國內政與理疆邊務二類，皆是觀察唐玄宗開元治世君權柄政之一體二面，其中張九齡本於治國內政而寫的敕書計29篇，理疆邊務者以92篇倍多於前者，又從敕書完成的時間綜合探查，理疆邊務之詔敕所撰制的時間，幾乎集中在開元20年至24年之間，可以見得當張九齡初仕於玄宗朝，以其官職品位較為低階，多廁身於圖書教育部門，職分所能綜理之政務少，所撰之文亦少，而隨著開元朝中後期，才幹逐漸為玄宗所識，於開元20年起履登相位，以王佐之才代擬王言，經理朝政，竭盡中書令職責。誠如陳先明在〈張九齡文學思想研究〉所提出：「張九齡是盛唐最早極力倡導和推動『雅頌之音』的詩人。他的詩文多處明確且強烈呼籲必須創造盛唐的大雅和頌聲」。¹⁵他又說道：「張九齡用大雅之聲來『潤色鴻業』的追求可見是非常自覺和鮮明的」。¹⁶

¹¹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23-424。

¹² 同上註，頁467。

¹³ 同上註，頁584-585。

¹⁴ 同上註，頁637。

¹⁵ 陳先明：〈張九齡文學思想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9卷第2期(2008年2月)，頁15。

¹⁶ 同上註，頁16。

至於占據張九齡公文書寫次多者是表狀，依據張九齡所呈奏玄宗表狀之目的與用途，可蓋括為論事、請勸、慶賀、謝恩四大類，尤其以後二類之篇幅佔了絕大多數。《文心雕龍·章表》：「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貴，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¹⁷可說，章表乃朝臣面君的上行公文，不過此一書寫體式特別之處在於，要能彰顯著一個人的品德與才學，亦增輝朝廷，助益國家，所以寫作者不同將使章表面貌與風采殊異，必須倚賴寫作者個人的真才實學，換言之，析讀表狀之文，文章亦間接投射出寫作者的詞采與個性。

據上所述，諸如擔任左拾遺時期所呈之〈論教皇太子狀〉：「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者儒碩德，為之師保」。¹⁸高蹈宰輔時期所寫的〈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狀〉：「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答制，以薛王業有疾，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懼。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情，達於神道」。¹⁹還有〈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閭闕？伏奉恩敕，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德經〉及疏》本」。²⁰以及〈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小小？陛下遂當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

¹⁷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 424-425。

¹⁸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21。

¹⁹ 同上註，頁 728。

²⁰ 同上註，頁 731。

於人，朕何顧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²¹

職此而論張九齡的表狀體類書寫，依張九齡進呈表狀的目的與功用來說，不管是論事請勸及辭謝慶賀，由此觀察張九齡遇合玄宗的君臣態度，可見得表狀在程式化的公文書寫中，因由張九齡的儒生涵養與文士詞采，藉由其樸實無華、直抒胸臆的行文口吻，盡顯臣下感於君上的知遇之恩而殫精竭慮竭誠事上的懇切。

二、人之所遇，孰能辯乎

張九齡的官宦生涯有二次仕途偃蹇，第一次是開元 14 年，張九齡因坐連張說私授公器一事，遭逢入仕以來第一次的貶謫。第二次則是開元 24 年，諫阻玄宗以尚書職封賞牛仙客卓有邊功，堅持名器不可假，與玄宗君意相忤而罷知政事，翌年周子諒再諫牛仙客，引喻失義，張九齡坐連舉薦非才，逕貶荊州長史，而其官宦生涯與年壽在荊州一併告終。

在直諫張說勿私公器時的張九齡，初履玄宗仕途，擔任的是文書、教育及政治備詢一類的中低階官員，到了開元 22 年奪情起復後，張九齡執掌宰輔之首的中書令，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張九齡此際雖則地位卓高、權柄日重，然而玄宗朝到了開元 24 年之時，卻是唐明皇在位歷 23 年，春秋日高，逐漸沉迷於開元治世的繁華太平而懈弛朝政的治理，於是開元末期，忠臣、奸佞並列於朝，即使如此，張九齡依然侃侃諤諤，竭誠事君，盡忠輔國。

開元 15 年，張九齡在貶謫洪州期間撰作〈荔枝賦并序〉，其於賦末言：「亦

²¹ 同上註，頁 739。

困人之所遇，孰能辯乎其中哉」！張九齡道此語以自解，亦是其在面對官場困頓之際的處世思考與寬慰自我的體會，實際上，此句話也是張九齡此後所身處日益險峻的開元末政治局勢最貼切的士不遇註解。尤其到了開元 22 年，張九齡儘管授命為相，直抵皇權統治的核心，步履仕宦生涯高峰的張九齡，卻遇玄宗年事漸高，荒怠朝政之際，於是，朝廷奸佞如李林甫者輩出，朝政日漸旁落，為其輩所把持，《資治通鑑》載述了開元末的朝政治局勢與氛圍：

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²²

開元 24 年，張九齡獻呈〈白羽扇賦并序〉，推究張九齡撰作〈白羽扇賦〉的主、客觀因素，可說「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²³既知「帝賜白羽扇」已有「秋扇見捐」之意，一方面又擔心受李林甫危害，命在旦夕，所以在不能不寫及不得不寫下，向玄宗獻呈〈白羽扇賦〉，以賦明志，吐露明哲保身之意。其後處境誠如自身於賦中所預言：「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自此不為時用，遠離玄宗朝的權力核心，南貶荊州。

在張九齡一回回義無反顧、諫諍如流的審諤直言裡，終因違拗玄宗君意，遭罷相位，謫貶嶺南荊州長史，此後玄宗朝政為李林甫輩所把持，再無忠良敢於逆鱗直諫，是以張九齡的罷相不啻是其個人仕途生涯的終點，從歷史進程的遞嬗裡，張九齡於開元末年與玄宗的君臣關係變化，亦成為中、晚唐嗣君檢討治國方略的

²²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214，(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822-6823。

²³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29。

柄政原則與盛衰分際的歷史認識與教訓。

綜合張九齡詔敕與表狀的公文體式篇章，其在程式化的篇構形製裡，秉持儒生事君之誠執筆，當其仕進之時，以「士伸知己，仕君報恩」的懷抱，巧妙的藉由忠諫事上的上行表狀與代擬王言的下行詔敕，映現及轉換士遇的諫諍情志，然當仕途偃蹇，「人之所遇，孰能辯乎」的詠物賦篇，則示現了世變隱喻的焦慮。誠如蔡阿聰所言：「作為一個正直有政治抱負的知識份子，張九齡對君王的忠誠與對理想和人格的忠誠，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張九齡沒有因為仕途的坎坷而否定自己，他也不可能因為同樣的原因而改變對君王的忠誠勤懇之心和報恩之志」。²⁴

第二節 美刺書寫的審美觀照

文士、良相、騷人為張九齡仕宦歷程中交疊顯現的三重身影，同時卻又可以作為審視張九齡仕宦生涯及其人生困境觀照的依據。其中，良相身分標誌了張九齡仕宦生涯的高峰，也是其公文書寫篇幅的豐碩階段，對於探討其士遇情志與事君情懷，擔任宰輔時期的書寫語境，值得令人關注。至於開元 14 年及開元 24 年二次謫遷的政治困挫，對於張九齡的心靈世界與文學書寫的牽動與衝擊，更是其由文士朝向騷人身影的轉向，對於把握張九齡仕宦書寫的精神意涵，具有發人深省的面向。

本節論題將探討張九齡仕宦書寫在不同形製的書寫裡，所呈現出的寫作筆法、

²⁴ 蔡阿聰：《論盛唐文人的論謫心態》，（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4），頁 42。

任宦思想和文學審美等面向有何異同，衡之張九齡在士遇與世變下，如何經由散文書寫，次第向後世折射出文士、良相與騷人多重身影的曲江蘊藉，最後歸結出張九齡文仕宦書寫所承載的面向是否為香草美人抒情傳統的再現。

一、雅正沖淡，體合風騷

世論張九齡平生功業，認為其相業與詩文並舉，其中，後世讀者關注其詩歌作品者多，然而論述其散文、賦篇作品者少，這之中的差異在於，張九齡的詩歌作品數量多且富含純文學價值，然其散文作品近九成為應用文類的公文書寫，在程式化結構的篇幅裡，記錄了其綜理朝堂政務的政治籌畫，可說深具歷史文獻價值，卻非文學性高的感性書寫。

詩歌作品，固然可以視為探討張九齡文學創作面向與仕宦生涯精神情志的依據，然而散文書寫，即使是公文體式，依然經由不同於詩歌的載體，映現出相似的潛藏於張九齡的創作心靈與情志趨向，也可說就在張九齡仕宦生涯同一時間內所創作的詩歌作品、散文及賦作書寫，互為表裡的闡述了其時所能明言及不能言明的理性現實與感性喻託。

張九齡生平有二次謫遷困頓，二次謫遷際遇卻截然不同，開元 14 年張九齡坐連張說私授公器事，外放冀州，後遷洪州，初遇政治風波，使其認識了政治現實的影響力與不可掌握，不過此回外放京城擔任地方官的經驗，卻拓展張九齡的為官視野，由京城視角向地方開展，可說第一次的謫遷挫折，奠定了張九齡來日蹈履高位，執掌宰輔的政治基礎與智慧，因此對於張九齡個人的任官歷程而言，

雖是其士遇挫折，但是就其一生的宦官生涯來說，不啻是段沉潛蛻變時期。然則，開元 24 年，張九齡諫阻玄宗以尚書職封賞牛仙客，翌年逕貶嶺南荊州，卻是由宰輔高位罷知政事，外放荊州，此次貶謫，雖則結束了張九齡仕於玄宗朝的政治前途，卻驅使張九齡創作了〈感遇十二首〉之「典型」香草美人的詩作，藉以抒懷寄託士不遇的焦慮與困頓。

吳旻旻在《香草美人文學傳統》裡，就唐朝詩歌創作風範及表現手法的差異，提出四種類型，其中之一類型為「感遇」，即是一般公認為「典型」的香草美人作品，因為其中具有鮮明的香草或美人意象，而「感遇」類型，以陳子昂、張九齡、李白為代表，因為此三人先後以〈感遇〉為題，分別寫下〈感遇三十八首〉、〈感遇十二首〉及〈感遇四首〉，各言其內心情志，吳旻旻更進一步指出，「總的來說，陳子昂、張九齡、李白三人皆自覺地要揚棄齊梁以降淫靡之風而力追風雅，他們採用香草美人手法，運用某些特定的象徵作為自我寫照，所抒發的感慨內容傾向懷才不遇」。²⁵ 而此三人詩作雖是同題，不過風格迥異，關於張九齡的〈感遇十二首〉部分，吳旻旻說道：

至於詩歌內容，張九齡畢竟是宰輔氣度，作品中很少自怨自艾，發窮酸之牢騷，多以「好修」自重自勉，成就一種「雅正沖淡，體合風騷」的氣格。

26

在吳旻旻的觀察與論述裡，已扼要的指出，張九齡詩歌內容與其自身人格涵養的密切相關，且此「雅正沖淡，體合風騷」的氣格映現的是宰輔氣度，而這宰輔氣度由張九齡策勵自修而來，也可說，張九齡的〈感遇十二首〉凝練了文士、良相、騷人多重交疊的身影，因此解讀〈感遇十二首〉的詩歌內容與寄託情志，應當就

²⁵ 同上註，頁 173。

²⁶ 吳旻旻著：《香草美人文學傳統》，（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170。

能梳理張九齡創作詩歌時，三重身分如何或隱或顯、或重或輕眾聲喧嘩的交互流轉，並且在文學敘述的語境裡自我對話，抒發心靈，形成對外在政治現實衝擊的審美觀照與感性回應。

若說詩歌作品，如〈感遇十二首〉者，已能顯現張九齡詩如其人的宰輔氣格，那麼散文及賦篇書寫的篇幅，其實更直截、樸實無華的表露張九齡居處官宦生涯裡，必須秉持何種態度、抱持何種政治立場以居處進退朝堂、君王意念的現實場域。因此，若由「香草美人」的抒情傳統來探察張九齡的文、賦書寫，除了在其作品內搜找是否具有鮮明的香草或美人意象，更應當關注其作品意在言外的含意裡，是否存在著寄託、比興的根本精神。如〈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張九齡談到了有感而興的情形：

司馬公又以為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²⁷

又如〈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亦直接談到了「興」和「情」，強調有感而發：

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適。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咏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28

再者，較明顯的從詠物的角度書寫的〈獅子贊序〉、〈鷹鷂圖贊序〉、〈荔枝賦并序〉和〈白羽扇賦并序〉，前二篇以序文體製分詠異獸、珍禽，後二篇則以賦

²⁷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87。

²⁸ 同上註，頁 875。

分詠水果、器物。在這四篇作品裡，可以看見張九齡對於所詠之物，作了信實貼切的描摹，在〈獅子贊序〉內，對獅子「信然絕猛者」的形象加以描摹：

《爾雅》所謂「狻猊，如戲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群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耽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

29

在〈鷹鵠圖贊序〉裡，從鷹鵠的體態、顧盼神情描摹其外型之剛悍，再以此鳥之勁翮，寫其神態與精神：

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燁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³⁰

至於〈荔枝賦并序〉，對於荔枝果實的外殼與果肉，甚至氣味，從形色與滋味作了貼近而生動的描摹：

蒂藥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猶不可定。³¹

〈白羽扇賦并序〉，從白羽扇的用途以及材質、形構描摹：

²⁹ 同上註，頁 907。

³⁰ 同上註，頁 910。

³¹ 同上註，頁 416。

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采畫文章；復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³²

吳旻旻在其論述說道：

「詠物」遂成為香草美人文學傳統裡一個相關的小傳統，表面意義是二者在詠草木部分作品重疊交集，更深邃的含意則是二者在「寄託」、「比興」的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³³

是以，將上述四篇作品的興寄之語爬梳整理，諸如〈獅子贊序〉中，寄托大唐天子所重在於異邦臣服之儀，而非所獻朝覲之禮：

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贖，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玩好；以為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³⁴

〈鷹鵠圖贊序〉，是張九齡時逢政治頓挫而藉鷹鵠喻己以抒發胸中塊壘之言：

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群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眾鳥之絕倫者也。³⁵

而〈荔枝賦并序〉則是張九齡慨嘆荔枝如此美好卻生於偏遠之地，在嗟歎荔枝命

³² 同上註，頁 413。

³³ 吳旻旻著：《香草美人文學傳統》，（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174。

³⁴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907。

³⁵ 同上註，頁 910-911。

運不遂的同時，其寄托自身士不遇的失意與憤懣：

夫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可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遇，孰能辯乎其中哉！³⁶

至於〈白羽扇賦并序〉，寄托了張九齡面對玄宗的政治試探，言明殺身不忘，即使秋扇見捐不為時用，仍懷聖恩以終的心情：

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³⁷

白承錫在〈詠物之開拓與轉化〉說道：「初唐詠物賦的基本表現手法和抒情方式，可追溯到屈原〈橘頌〉之『興寄』傳統，也就是『利用擬人化』的手法，使橘子樹不但有了生命，而且有了性格，詩人所要暗示寄托的情志也非常明顯有利的象徵表現出來，完全達到『詠物寄懷』的效果」。³⁸其說「利用擬人化」的手法，即在於作者透過物我融合的精神觀照與心靈投影來詠物，使得所詠之物，具有作者人格的投射，那麼以此來看張九齡二篇以珍禽異獸、二篇以水果器物名篇的文、賦書寫，除了〈獅子圖序〉未見得擬人化獅子以詠物寄懷的情形之外，在〈鷹鷂圖贊序〉、〈荔枝賦并序〉和〈白羽扇賦并序〉三篇中，鷹鷂、荔枝、白羽扇各自代言了張九齡遭逢不同階段的士不遇困頓下，潔身自修，秉節持重的興寄情懷，亦以透過騷人筆觸再現了香草美人的抒情傳統。

³⁶ 同上註，頁 416。

³⁷ 同上註，頁 413。

³⁸ 白承錫：《初唐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頁 190。

二、運散於駢，典麗雅正

張九齡，生於唐高宗儀鳳3年，卒於唐玄宗開元28年，年63。從曲江公身處的歷史時代，論及唐代的文學發展，以及其文學書寫與時代精神的交互濡染與開展，可說張九齡承襲了六朝、隋的文學遺緒之餘，又能在初唐朝向盛唐的文學發展漸變過程裡，獨樹一幟，自成一格。《新唐書·文藝傳》：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擣齋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³⁹

就新唐書的說法來看，唐代文學的發展有著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的分野，以唐世帝王的更迭為斷限，首先第一階段在高祖、太宗，顯然延續了江左餘風，所以「絺句繪章」為這一階段的文學特色，到了玄宗治世，由於帝王好經術，文學已從初唐注重華麗雕琢的藻飾文采中，一轉而為「崇雅黜浮，氣益雄渾」的盛唐氣象，到了中唐代宗大曆、正元年間，文學才俊輩出，加以韓愈的提倡，《新唐書·文藝傳》認為唐代文學的發展至此到了極致，並且於此時期臻於完成。

根據此說，欲論張九齡文章書寫的審美特徵，可從初唐文壇對於「絺句繪章」的承襲轉變為玄宗時期「崇雅黜浮，氣益雄渾」的氣象來觀察，然後以此作為視角來探查張九齡文章的書寫內容是否映現著此一時代精神的轉向，而在此轉向中，

³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5725-5726。

在張九齡的文學書寫裡，是如何回應或呼應此一轉向。

首先，就「絺句繪章」來說，指出的是六朝以來駢體文著重雕琢與藻飾的特徵，然而這與玄宗時期「稍厭雕琢，索理致」的文學風氣對立，前者文章體製注重外在形式與內在篇構的整齊與華美，然而後者卻是關注在內容的實質意義。據《新唐書·文藝傳》所說，由玄宗好經術至於「燕、許擅其宗」，可說開元治世在帝王有意識的主導文學發展的趨向下，時任宰輔的張說和蘇頌與玄宗君臣一心，改革了六朝以來浮靡而失實的駢體文風，張九齡在〈集賢殿書院奉敕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便提到玄宗好經術的事實：

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改仙為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⁴⁰

「用相必本於經術」，可見玄宗對於經術的重視已縮結了士子的宦途，而時任中書令的張說如何與玄宗一心，大力推動開元治世的文風：

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⁴¹

從《新唐書·張說傳》的載述裡，即可見得玄宗對於張說的倚重，尤在於朝廷文

⁴⁰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872。

⁴¹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4410。

辭述作，在《大唐新語·匡贊》稱許張說：「為文精思，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

⁴²另外，《舊唐書·張說傳》更詳盡的提及張說遇合玄宗，擅長撰寫朝廷政令文章，

⁴³自執掌中書令後，其文學風格更是影響了當朝天下士子：

始玄宗在東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清內難，遂為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⁴⁴

張九齡在〈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裡，將張說一生對於當世文壇的影響作了說明，而此影響尤在於「與經籍為笙簧，於朝廷為粉澤」，可說張說的文學功業即在佐助了玄宗「好經術」的文學改革，而張說的文學實踐便在於朝廷典章制度的多所修飾：

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闕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為笙簧，於朝廷為粉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耻，子雲不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⁴⁵

張說與張九齡，先後執掌開元治世的中書令，擔任玄宗宰輔，又張說以張九齡為同宗，對於張九齡多所提拔，《舊唐書·張九齡傳》：「時張說為中書令，與

⁴² (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0。

⁴³⁴³ 曲景毅對於「大手筆」一詞的意義，指出：「由於朝廷所需的這些公文一般都由專人撰寫，所以『大手筆』的稱謂逐漸由某類文章進而指稱撰寫這類文章的文章家」。曲景毅：《唐代「大手筆」作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 9。

⁴⁴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057。

⁴⁵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952。

九齡同姓，敘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⁴⁶張說與張九齡由於此二主、客觀因素形成了師承關係，薛新萍在〈張說、張九齡「大手筆」考論〉認為，張說的「大手筆」由張九齡承襲開拓，以典雅富贍的風貌、雄渾暢達的境界、清新超拔的氣格，呈現了盛唐恢弘氣象，並藉此影響了盛唐文學家的寫作風格及技巧，為唐文發展開闢新路，並推動其走向振興。⁴⁷

如此可說，張說藉由朝廷典章的公文書寫，作為改革六朝以來駢體文專務華麗浮靡風格的文學實踐，將公文書寫翻新為「緣飾盛時，潤色王道」的實用文學，而此文學實踐不僅影響了張九齡官宦時期的文學書寫，也由張九齡承襲此文學改革之風，續以開拓。曲景毅在《唐代大手筆作家研究》提到：

「大手筆」作家一般與宰相、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或其他重要的著作郎官等職位關係密切。那麼，是否意味著曾擔任宰相、知制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等職務的人都可以稱作「大手筆」呢？事實絕非如此。唐代宰相共 358 人，被稱作「大手筆」者只有 10 人。⁴⁸

職此析論張九齡的仕宦書寫及其書寫特色與風格，最重要的便是，張九齡仕宦玄宗朝期間，歷任之官職，曾長時間由玄宗授予知制誥之職，代擬王言，其勢必具備了「荷明天子旨」的「大手筆」才能，又從其「大手筆」書寫的文章體製與篇構著手探究，首先，就文章體製的書寫形式而言，在張九齡的文、賦書寫裡，主要仍是採用駢體文作為行文的主要結構，但是其有所不同之處在於，將駢文融入散文化的句式，使得文句更顯錯落有致，整體結構語氣更加自然流暢，例如詔

⁴⁶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098。

⁴⁷ 詳細論述，參考薛新萍：〈張說、張九齡「大手筆」考論〉，《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2 期(2012 年 4 月)，頁 10-13。

⁴⁸ 曲景毅：《唐代「大手筆」作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 13。

敕類的散文書寫〈敕皇太子納妃〉虛詞與連接詞的運用：

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庶姻媾，且猶正於人倫；況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眾之澤。⁴⁹

另外〈敕突厥可汗書〉，在遣詞造句上，有著更多口語化的表現：

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雲蘇農賀勒、處羅達幹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閒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⁵⁰

又如〈敕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勳，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突干狡算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起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⁵¹

句句可見張九齡在敕文的撰制上，筆隨意走，運用了較多的散筆言事議理，並且在行文語氣裡，展現著玄宗以賢主明君的口吻綏撫臣民，且就行文的內容及思想上已見體國經野、潤色鴻業的企圖與用心。因此，從張九齡的詔敕書寫裡，觀察由駢趨散的程度，句式雖仍集中於4、5、6言，但能錯落有致，遣詞用字筆隨意走，更見淺白。

⁴⁹ (唐)張九齡，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463。

⁵⁰ 同上註，頁645。

⁵¹ 同上註，頁623。

再者，由表狀書寫觀察張九齡運散於駢的情形，由於駢體仍然是表狀此一公文體類的書寫載體，因此駢四儷六的句型乃形成張九齡表狀之文格式嚴謹、莊重整飭的風貌，例如〈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托於群生。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合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讎所載，殊祥罔不臻。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⁵²

或如〈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頓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回，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⁵³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藉由「至今」、「即是」、「在於」、「雖」、「且」、「亦」等連接詞形成四六句式行文，使全文流暢自然，去除繁麗典重，達致以駢體之文，運用散筆語句論述事件，使得論述之事因由駢散相間的敘述方式，更見作者思辨清晰、條理分明的中心意旨。

綜上所述之例，顯見張九齡透過將散化的句子融入駢文句型中，以去除六朝以降駢體文繁麗典重之習氣，使得詔敕、表狀書寫，達致切於時事，緣事而發，時濟實用的功能，此外，除了有意識的在行文句式上的經營與安排，改革六朝駢

⁵² 同上註，頁 709。

⁵³ 同上註，頁 726-727。

體文以來過於講究排偶對仗而衍生為篇構華美的弊病外，張九齡更從古史典籍援引事例，化用成句，若說駢文的寫作特徵在於「用典」和「藻飾」，張九齡更是直接從「用典」和「藻飾」，改善駢體文內容空泛的積習。以「用典」來看，在〈上封事書〉裡，「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早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眾，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⁵⁴「東海殺孝婦」之事見於《漢書·于定國傳》。〈敕處分十道朝集使〉：「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與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守文」語出《史記·外戚世家》。〈答嚴給事書〉：「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感不兢兢」？⁵⁵「惟疾之憂」語出《論語》。〈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咏蟋蟀而傷儉」，⁵⁶「歌滄浪」語出〈漁父〉，「咏蟋蟀」語出阮籍〈詠懷〉。諸如此類援引經籍典章以為事例者，在張九齡的散文書寫裡，不勝枚舉，由此也見得張九齡博學深厚的儒生學識。

至於張九齡對於文章內「藻飾」的經營，在〈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內，描述景龍觀的美景，就自然環境的山勢、川流、樹林，從形貌、色彩、視覺角度的交錯鋪排呈現詩情畫意的美感。

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修聳而垂彩，綠羅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緣石菌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概。⁵⁷

⁵⁴ 同上註，頁 846。

⁵⁵ 同上註，頁 861。

⁵⁶ 同上註，頁 875。

⁵⁷ 同上註，頁 883。

又如〈荔枝賦并序〉：

紫紋紺理，黛葉緗枝，蓊鬱而灑，環合而棼纒。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於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爾其句芒在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固微文而妙質；蒂藥房而攢萃，皮龍麟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猶不可定。⁵⁸

對於荔枝的外殼、果肉、氣味，由視覺上的形貌、色彩至於味覺上的滋味作了貼近的描摹，並且在層層推進的鋪排裡，荔枝由外形的風貌到內在的味道，形成了荔枝渾然一體而與眾不同的神采。

⁵⁸ 同上註，頁 416。

第七章 結論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開元以後，世稱曲江公。生於唐高宗儀鳳3年，卒於唐玄宗開元28年，年63。他一生躬逢武曌移國垂統之用心，遂行文詞科考取才之制，使他得以嶺南邊鄙之出身，於武周長安2年進士及第，此後，張九齡遇玄宗治世，歷官拜相，至於貶卒。由此可說，終其一生仕宦生涯裡的高峰與低谷，同玄宗朝之任事，密切相關。

張九齡仕於玄宗朝28年，28年的仕宦生涯裡，張九齡寫下了大量應用體式的文章，專務朝政，在這些詔告敕書、表狀、諫書裡，張九齡展現了傳統儒生仕君報恩的精神，在序文及賦的文學書寫裡，則展現了以文詞晉身的文士文采與騷人風貌，其中開元14年及開元24年的二次遷謫事件，不僅轉折了張九齡的政治生涯，也成為其文學書寫的情志轉折，尤其開元24年的罷相遭貶，既是其個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亦是唐代治亂之所分的轉捩點。準此而言，張九齡的文學書寫無不綰結了個人的仕宦生涯，無論是詔告書寫、表狀、諫書、序及賦作，關注他仕宦於玄宗朝期間的歷程，可梳理為由士遇到士不遇的仕宦書寫主軸。

張九齡於唐玄宗先天元年對策高第，以文學晉左拾遺起，任事玄宗朝所書寫的詔告敕書乃占據其仕宦書寫篇幅最多者，以此觀察張九齡仕宦書寫所承載的面向，尤在於關注張九齡遇合於玄宗時的柄政舉措，如何分從安內、攘外二向度輔佐玄宗續寫「開元之治」。

是以張九齡因公務需求所撰的詔告敕書，可大致劃分為治國內政與理疆邊務二類，皆是觀察唐玄宗開元治世君權柄政之一體二面，其中張九齡本於治國內政而寫的敕書計29篇，理疆邊務者以92篇倍多於前者，又從敕書完成的時間綜合

探查，理疆邊務之詔敕所撰制的時間，幾乎集中在開元 20 年至 24 年之間，可以見得當張九齡初仕於玄宗朝，以其官職品位較為低階，多廁身於圖書教育部門，職分所能綜理之政務少，所撰之文亦少，而隨著開元朝中後期，才幹逐漸為玄宗所識，於開元 20 年起履登相位，以王佐之才，代擬王言，經理朝政，竭盡中書令職責。

總此觀之張九齡的詔敕書寫，本於治國內政而寫者，內容著重於儒家禮樂教化的闡發，尤以勸君承繼先秦、兩漢之聖王文化道統為首要，又張九齡在此際所撰制之文，仍沿襲魏晉六朝文風，運駢體為文，句式亦保留了駢四儷六的痕跡，唯在行文的内容及思想上已見體國經野、潤色鴻業的企圖與用心。

而在開元中後期，張九齡所擬撰之詔敕，幾乎因為邊疆事務而發，篇幅之多與詔敕對象之廣，顯見其時玄宗著力邊功之盛，而張九齡亦用心竭力其中，輔君佐政，尤其多篇敕書針對特定藩屬國而發，其所牽連者眾，然張九齡卻以樸實簡練之筆，言事議政，義正辭達，謀戰遣兵，懾服藩國，鷹揚國威。是以此間完成之詔敕書寫，由駢趨散的程度，更進一步，句式雖仍集中於 4、5、6 言，但能錯落有致，遣詞用字筆隨意走，更見淺白。職此，張九齡詔敕書寫的藝術特徵可歸結為，時濟實用，宏博典實。

再從張九齡的表狀體類書寫，分從御批優答及犯顏勸諷二個視角探察，來論述張九齡的仕宦書寫面貌與特徵。在御批優答裡，依張九齡進呈表狀的目的與功用來說，可析分為論事請勸及辭謝慶賀二項，由此衡之以玄宗於表狀後的御批，討論張九齡遇合玄宗的君臣關係。至於犯顏勸諷，從張九齡直言進諫的對象與史事，來釐析玄宗朝開元末期宰輔中樞的人事布局與策略。

首先就表狀體類書寫的文學載體而言，因由開元朝玄宗主導的文藝趨向下，使得駢文作為公文書寫的體式，在初、盛唐得到了改造與轉化的契機，正因為玄宗的文藝趨向在於「稍索理致，崇雅黜浮」，所以「氣益雄渾」即成為玄宗朝群臣撰作努力達致的目標，又且雄渾之氣當如何展現，張九齡懷抱賦家精神，由采飾玄宗帝業，鋪張王朝經世濟民之術為之，期使以表狀盡現「潤色鴻業」以「體國經野」。

且從玄宗批注張九齡的表狀來看，張九齡的忠誠謀國深入玄宗之心，君臣答覆之間，成為一幅開元盛世的士遇圖像，然則隨著玄宗在位日久、春秋漸高，君心怠弛，時任宰輔首位中書令的張九齡，明知身陷李林甫專權固寵、排除異己的朝廷政治鬥爭裡，依然無所畏懼的向玄宗諫阻奸佞誤國，為大唐盛世防萌杜漸，展現其不因地位攀升而忘卻為官職守，依舊公忠體國，一如最初。

然則在張九齡一回回義無反顧、諫諍如流的謇諤直言裡，終因違拗玄宗君意，遭罷相位，謫貶嶺南荊州長史，此後玄宗朝政為李林甫輩所把持，再無忠良敢於逆鱗直諫，是以張九齡的罷相不啻是其個人士遇生涯的終點，從歷史進程的遞嬗裡釐析，張九齡於開元末年與玄宗的君臣關係變化，亦成為中、晚唐嗣君檢討治國方略的柄政原則與盛衰分際的歷史認識與教訓。

另外，透過觀察張九齡的序、賦體式作品，由其撰作主題及內容關注他任官於玄宗朝期間，由士遇到士不遇之情志轉折下的文學審美觀照。在序文類的作品，又依據內容所呈現的主題分從宴游送別和紀事題贊逐篇析論，至於賦篇書寫，由於張九齡僅有二篇詠物題材的賦，即〈荔枝賦并序〉和〈白羽扇賦并序〉，所以便將各篇獨立為一章，並且援引賦篇寫就之時，同期相關史料與張九齡詩作，綜合觀察，悉加討論。

首先，就張九齡序文書寫而言，在宴游送別一類的文章裡，其顯著特色在於能以清詞麗句達致「隨事以序其實」，尤其在字數有限的篇幅中，其能針對序文主題所含涉的人、事、時、地、物、景，作出井然有序的安排，使得在送別目的下的宴集時刻，彰顯出餞行與遠行者之間，彼此祝福與關懷的情意。而在二篇以動物名篇的序文裡，張九齡則別開生面的以借物說理的手法，托物言志。尤其在描摹動物及鳥禽形貌的文句藉援引古史典籍著眼，在用典之際又能翻出新意，盡顯張九齡深厚的儒生學養，使得〈獅子贊序〉和〈鷹鵠圖贊序〉讀來博采雍容，卻不落俗套。

至於二篇以詠物題材體物寫志的賦，在〈荔枝賦并序〉一篇裡，張九齡藉由北方權貴或凡俗對於嶺南珍果荔枝的一知半解中，由糾正謬誤中以正名釋義起筆，然而其在詠物、體物中，意在借荔枝自況，說明其自身與荔枝同為嶺南珍奇，只因出身邊鄙，所以不為世所知賞的寥落，同時撰作〈荔枝賦并序〉正是張九齡坐連張說私授公器的政治風波中因而貶官洪州之時，所以〈荔枝賦并序〉可視為其士不遇的情志書寫。

另外，與〈荔枝賦并序〉相距十年後而作的〈白羽扇賦并序〉亦是張九齡遭貶官前夕之作，然則二篇撰作所表達的主觀情感已有所殊異，其因在於書寫〈白羽扇賦并序〉一篇時，張九齡履登玄宗朝中書省宰相高位，是其一生仕宦際遇的高峰，卻因諫阻玄宗以尚書封賞牛仙客，堅持名器不可假，不協君意，加以李林甫居中挑撥，致使玄宗決意將張九齡罷相，遠貶嶺南荊州。是以〈白羽扇賦并序〉之於張九齡的士不遇情志書寫，更深一層揭露了一位忠貞骨鯁儒生士遇與世變下的抒情觀照。

文士、良相、騷人為張九齡仕宦歷程中交疊顯現的三重身影，同時卻又可以

作為審視張九齡仕宦生涯及其人生困境觀照的依據。根據此脈絡，論述張九齡文、賦仕宦書寫的審美特徵，可從初唐文壇對於「絳句繪章」的承襲轉變為玄宗時期「崇雅黜浮，氣益雄渾」的氣象來觀察，張九齡文章的書寫內容，秉持著潤色王道的用心，在篇構經營上，則以運散於駢的筆法，透過援引文獻經籍作為事典，務實文章內容，並且使文句呈現典麗雍容的藻飾之美，映現著初唐朝向盛唐文學改革的趨勢以及此時代精神的轉向，並且在此轉向中，張九齡透過官宦生涯書寫，實踐了此一轉向。

綜合考察張九齡仕宦生涯的書寫，其在寫作意識與構篇審美上，維持著一貫而相似的撰文主軸與關懷重心，可說士遇與世變的諫諍焦慮及香草美人抒情傳統的再現可作為釐析張九齡文、賦的仕宦書寫主題的二個面向。

總的來說，在張九齡的仕宦書寫裡，在詔告敕書中，可見張九齡遇合於玄宗時的柄政舉措，輔佐玄宗續寫「開元之治」，另外，張九齡以文藻對策見用於玄宗，是開元文壇繼張說之後的領袖人物，在他終身「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的用心裡，以其「多得玉言之體」的手筆展開君臣對話，股肱盛唐，力挽開元頹波，然當仕途偃蹇，張九齡以序、賦寫志，又吐露出貶謫宦遊下的生命情志。總此三點，可說是張九齡仕宦散文書寫的特色。

另外，從文學審美的角度論述張九齡文章的書寫內容與形式，其秉持著士遇報恩的用心，為文在於潤色王道，義尚光大的時濟實用。在篇構經營上，由於玄宗好經術的政策，張九齡承襲了張說「大手筆」的文學改革精神，以運散於駢的筆法，透過援引文獻經籍作為事典，務實文章內容，並且使文句呈現典麗雍容的藻飾之美，映現著初唐朝向盛唐文學改革的趨勢以及此時代精神的轉向，並且在此轉向中，透過官宦生涯裡的散文書寫，實踐了此一文學轉向。

自明代以降迄於 21 世紀的張九齡研究，隨著文學、思想、史料的逐步整理，使得盛唐一代良相張九齡的文學藝術、學術貢獻及歷史定位漸趨清晰而詳贍。然則綜觀前人研究所述，仍多擇取或詩歌或政治或思想之單一面向，作為窺得張九齡精神人格全貌的研究視角。張九齡作為盛唐歷史的理性存在，能否透過後世經由共時性的文、賦、史三者交互對讀，將終其一生的仕宦生涯視為其文學書寫的歷時進程，交錯縱橫而為研究視角，或者更能編織、羅繡盛唐一代良相張九齡的感性圖像。因此，本論題依張九齡仕宦生涯期間所書寫的詔告敕書、表狀、序文及賦等文學體式作為主要論述對象，並且以此等文學書寫與古史典籍作共時性的文史對讀，作為考察張九齡遇合唐玄宗之君臣關係變化的線索。

遇合、對話、貶謫作為考察張九齡仕宦生涯文學書寫的視角，也貫串為張九齡仕宦書寫的基調，在張九齡的寫作意識與構篇審美上，圍繞著士遇與世變的諫諍焦慮展開，在行文口吻與筆觸則再現了香草美人的抒情傳統，無論是文士、良相、騷人，張九齡透過此類書寫凝練了自我面對外在現實與內在情志世界裡的多重身影，其一方面以文為史，協助玄宗續寫開元治世，見證了盛唐的恢弘氣象，一方面，以文體志，抒發了一介嶺南寒士以文學進用感遇上賞而事君以忠的入世情懷。

張九齡因才見用於唐玄宗，其任於玄宗朝期間的書寫，絕大多數為詔告文書的公文，此外，亦有因官場頓挫、遷謫，遂發感遇、憤懣的序、賦書寫數篇。無論何者，此皆吐露著諫諍與美刺君王，潤色鴻業與體國經野的心跡，雖然其最終仍難逃罷相貶謫際遇，然則，文士、良相、騷人作為張九齡仕宦書寫中交疊顯現的三重身影，同時卻又可以作為審視張九齡仕宦生涯及其人生困境觀照的依據。換言之，張九齡經由仕宦生涯期間的文學書寫，次第向後世折射出文士、良相與騷人多重身影的曲江蘊藉。

因由張九齡的仕宦文、賦書寫研究，不僅描繪了盛唐一代文學寒士晉身官宦的士遇圖像，也經由張九齡的仕宦歷程，譜寫了世變下儒生進退的情志心曲，在諫諍焦慮之中，文學書寫使張九齡觀照了自我面對士遇時的追逐與士不遇下的放逐，並且藉由文字安頓、安排流轉的生命遭遇。是以，通過張九齡的仕宦文、賦書寫，或可說映現著開元末盛唐衰變下玄宗群臣生存共感的悲哀，並側寫了玄宗權柄起初如何由韋后手中爭奪最後卻旁落為權寵之臣爭端的世變扉頁，由此論題亦可以縱橫開展為盛唐群臣的諫諍圖像。另外，張九齡詩歌、散文及史料的研究，雖已蔚然成風，然而就近世研究專題來看，仍以文學體裁或分或合而考論，缺少將張九齡詩歌、散文、賦篇與史料綜合的考察，由詩、文、賦、史四者交互對讀的研究視角，或可為未來研究張九齡諫諍意識論題發展的方向之二。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一) 古籍

- (漢)班固：《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五》，臺北：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南朝梁)劉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
-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唐)魏徵等撰：《新校本隋書》，臺北：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
-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唐)杜佑，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訂，韓昇譯訂：《通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
-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編，周勛初等校定：《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 (宋)王溥撰：《唐會要》，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 (明)汪篈：《漢唐史論稿》，北京：北京大學，1992年。

- (明)徐師曾纂輯：《文體明辨·序說》，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 (明)高棅：《唐詩品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明)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
- (清)永瑤、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章學誠，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年。
- (清)彭定求等奉敕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清)劉熙載撰：《藝概》，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

(二) 近人專著

- 王德華：《唐前辭賦類型化特徵與辭賦分體研究》，杭州：浙江大學，2011年。
出版中心，2014年。
- 曲景毅：《唐代「大手筆」作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 衣若芬，劉苑如主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史研究所，2000年。
- 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7月。
-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5月。
- 吳元嘉：《張九齡及其詩研究》，臺北：麗文文化事業，2009年。
- 吳旻旻：《香草美人文學傳統》，臺北：里仁書局，2006。
- 吳儀鳳：《詠物與敘事：漢唐禽鳥賦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07年。
-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5月。
- 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2年。
- 周睿：《初唐漸盛文學轉型關鍵人物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年。
- 洪銘吉：《唐代科舉明經進士與經學之關係》，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
- 徐靜莊：《張說與開元文壇》，臺北：花木蘭文化，2011年。
- 許東海：《經典與世變的辭賦書寫》，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
-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 趙成林：《唐賦分體敘論》，湖南：湖南大學，2009年。
- 趙達夫，尹占華：《歷代賦評注》，成都：巴蜀出版社，2010年。
- 趙睿才：《唐代文學隅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第八卷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 楊志玖主編：《中國古代官制講座》，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楊銘：《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關係史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楊承祖：《張九齡年譜附論五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64年。
-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 熊飛：《張九齡年譜新編》，臺北：花木蘭文化，2012年。
- 劉學鈔：《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臺北：致知學術出版，2013年。
- 鄭雅如：《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年3月。
- 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年。
- 簡宗梧，李時銘主編：《全唐賦》，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 顧建國：《張九齡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

顧建國：《張九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二、 期刊論文

于展東：〈論張九齡貶謫洪州期間的心路歷程〉，《殷都學刊》第1期，2011年。

王若楓、肖紅：〈張九齡開鑿大庾嶺心路的政治文化意義〉，《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30卷第10期，2009年10月。

仲紅衛：〈從文化人格看古代世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脫——以張九齡罷相為中心〉，《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1卷第2期，2009年6月。

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釋義〉，《漢學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6月。

朱溢：〈唐至北宋時期的皇帝親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4期，2010年11月。

江秀梅：〈魏晉南北朝詩賦合流現象初探〉，《輔大中研所學刊》5期，1995年9月。

吳元嘉：〈「九齡風度」與張九齡詩之風格〉，《吳鳳學報》，2009年12月。

吳元嘉：〈行旅人筆下的山水——張九齡行旅詩中的情、景關係〉，《臺中教育大學學報》，2009年12月。

吳元嘉：〈張九齡詠懷詩中的自我形象〉，《吳鳳學報》，2008年12月。

吳元嘉：〈張九齡贈答詩與興、觀、群、怨之詩教〉，《吳鳳學報》，2007年12月。

宋社洪：〈相李林甫是唐治亂之分嗎〉，《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5卷第1期，2004年2月。

李芳民：〈張九齡「不協時宰」、「拂衣告歸」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1期，2001年2月。

李英：〈張九齡散文研究綜述〉，《文學界·古典文學》第2期，2011年。

李鴻賓：〈唐玄宗擇相與開元天寶年間中樞政局〉，《文獻》第3期，1995年

12月。

孟修祥：〈張九齡在荊州及其與莊屈文化精神之關係〉，《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4期，2008年8月。

姜朝暉：〈張說與初盛唐政治文化關係考述〉，《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1期，2002年1月。

胡如雷：〈唐「開元之治」時期再向政治探微〉，《歷史研究》第1期，1994年。

胡燕：〈「恩了身退」：張九齡的人生理想模式論——兼論唐代寒族士人心態〉，《社科縱橫》第23卷第9期，2008年9月。

胡燕：〈張九齡隱逸思想探微〉，《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8年。

高莉芬：〈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一考察——賦語言功能之轉變〉，《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語文學報》第4期，1997年6月。

曹鳳前：〈續革新之業 開盛唐之先——論詩人張九齡〉，《商丘師範學院學報》01期，1988年。

許東海：〈唐代詩賦合流及其文類分際之一考察——以白居易詩賦及其花木書寫為例〉，《文與哲》第一期，2002年12月。

許東海：〈論張協、鮑照詩歌之「巧構形似」與辭賦之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第8卷第1期，1997年。

許東海：〈秋聲·諫諍·歸田——歐陽脩〈秋聲賦〉與〈歸田錄〉中的諍臣與困境〉，《文學與文化》第2期，2013年。

許東海：〈開元言路與諍臣辭賦——從《貞觀政要》看張九齡辭賦的諫諍困境及其書寫底蘊〉，《中國文學研究》第4期，2015年。

曹美秀：〈陳澧《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

陳先明：〈張九齡文學思想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9卷第2期，

2008年2月。

陳建森：〈張九齡《曲江集》敕書的文史價值——開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突騎施蘇祿侵犯四鎮個案探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3期，2007年6月。

陳弱水：〈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前期思想〉，《新史學》第19卷第4期，2008年。

陳嬌龍：〈一彎曲江品清醇——張九齡詩歌芻議〉，《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5月。

陳磊：〈李林甫與開天朝局研究〉，《第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2007年。

程宇昂：〈九齡風度：個性風采與道德人格的合鑄〉，《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32卷第7期，2011年7月。

黃志輝：〈試論張九齡的神道觀〉，《韶關學院學報》03期，1988年。

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臨懷古」〉，《幼獅學誌》第17卷第3期，1983年5月。

熊飛：〈王維與宰相張說、張九齡交游考〉，《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31卷第4期，2010年4月。

熊飛：〈張九齡生平若干問題考辨〉，《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一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

熊飛：〈張九齡研究中若干重要問題考辨——兼答顧建國先生〉，《韶關學院學報》10期，2007年。

熊飛：〈張九齡研究相關史料甄辨〉，《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1期，2014年。

趙彩花：〈張九齡的文學感興觀與言象表現觀〉，《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9月。

趙彩花：〈張九齡與唐代儒家文論的佛道特色〉，《理論縱橫》第2期，2011年。

劉占召：〈張九齡對盛唐儒學的承繼與超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1期，2014年1月。

賴井洋：〈張九齡倫理思想淺議〉，《韶關學院學報》01期，1989年。

- 錢志鵬：〈淺論張九齡詩歌的孤獨意識〉，《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5期，2001年。
- 戴紅梅：〈駢散相間·典雅自然——論張九齡散文的審美特徵〉，《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2期，2012年4月。
- 戴紅梅：〈體兼雅頌·浩瀚為文——論張九齡散文之氣盛〉，《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0卷第7期，2012年7月。
- 薛正昌：〈九齡風度與清淡詩宗——相業與詩文並舉的一代名臣張九齡〉，《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9年。
- 薛新萍：〈張說、張九齡「大手筆」考論〉，《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第28卷第2期，2012年4月。
- 簡宗梧：〈從漢到唐貴遊活動的轉型與賦體變化之考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1期，1999年6月。
- 簡宗梧：〈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2期，2006年6月。
- 顧建國：〈張九齡的人生思考與盛唐文人的典型心態——兼論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處世模式〉，《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2期，1999年。
- 顧建國：〈張九齡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商兌——兼答熊飛先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2期，2007年。
- 顧建國：〈張九齡研究百年綜論〉，《淮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期，2000年）。
- 龔靜：〈淺論高力士在溝通君相關係中的作用〉，《安康學院學報》第20卷第3期，2008年6月。

三、學位論文

- 于曉雯：《信息傳遞與帝國統治：唐代朝集使研究》，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2年。

牛海蓉：《走進盛唐——論張九齡的詩歌創作》，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王湖清：《宰相詩人張九齡的文學創作及其影響》，中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2009年。

白承錫：《初唐賦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年。

吳宏哲：《論君相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張九齡罷相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李谷喬：《張九齡詩歌論稿》，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李珠海：《唐代序文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柏雙：《論張說、張九齡為盛唐文學的繁榮所做的準備》，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
2004年。

邱仕冠：《從傳播現象論初唐貴遊文學性質的轉變》，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論文，2013年。

金豔：《張說、張九齡山水詩比較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胡淑貞：《初、盛唐樂府詩與辭賦相互融攝之考察》，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論文，2012年。

徐華中：《張九齡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0年。

戚家源：《張九齡交往詩研究》，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張寧：《張九齡《曲江集》考論》，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張玉娟：《張九齡與初盛唐之交的詩文風尚》，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陳乃宙：《曲江詩「儒境」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黃進華：《變通與創新：宇文融與盛唐時代》，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2007年。

黃濤鈞：《初唐文史二家文學理論及其比較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1996年。

趙君偉：《荔枝題材與意象文學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劉雪峰：《張九齡與盛唐詩歌》，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蔡阿聰：《論盛唐文人的論謫心態》，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蘇雯慧：《勸懲與存史——《大唐新語》研究》，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2007年。

顧建國：《張九齡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

